

中外之通商

中外之通商

## 中午的黑暗

---

作者：〔英〕阿瑟·库斯勒

译者：董乐山

责任编辑：崔艾真

责任校对：李超英 祁斌

装帧设计：张晓光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电话：5005588转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印刷：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经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787×1092 1/32

字数：152千

印张：9.5 插页：2

版次：1988年11月北京第1版第1次

ISBN 7-5063-0138-5/I·137

定价：2.60元

---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 出版说明

《作家参考丛书》是为满足作家和广大读者的需求，以之作为透视世界思潮和文学潮流的一个窗口而推出的一个系列。

《作家参考丛书》将把世界社会科学各种流派有代表性的著作陆续介绍给大家。书中的观点不尽是我们同意的，但它有利于读者管窥各种艺术态势和文学发展的流向，从而得到适当的启迪和借鉴。

作家出版社

凡是建立了独裁政权而不杀布鲁图者，或者建立了共和政权而不杀布鲁图之子者，只能统治一个很短的时候。

马基亚维利：《谈话录》<sup>①</sup>

人啊，人，没有怜悯，一个人是不能生活下去的。

陀斯妥也夫斯基：《罪与罚》<sup>②</sup>

---

① 尼可洛·马基亚维利(1469—1527)，意大利政治家，擅权术政治，著有《君主论》等著作。

②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斯妥也夫斯基(1821—1881)，俄罗斯作家，著有《罪与罚》等小说。

本书中的人物都是虚构的。但是决定他们行动的历史环境则是真实的。尼·萨·鲁巴肖夫这个人的一生是所谓莫斯科审判的许多受害者的一生的综合。作者认识其中好几个人。本书谨献给他们作为纪念。

1938年10月—1940年4月

于巴黎

## 目 录

第一次提审 .....	1
第二次提审 .....	102
第三次提审 .....	179
语法虚构 .....	261
译后记 .....	287

# 第一次提审

无人能毫无内疚地进行统治。

圣-约斯特<sup>①</sup>

—

牢房的门在鲁巴肖夫的身后关上了。

他靠着门站了几秒钟，点燃了一支烟。他右边的铺上放着两条还算干净的毯子，床垫子看来新续了草。左手的水池子没有塞子，不过水管倒没有坏。旁边的便桶刚刚刷洗过，没有气味。两边的墙都是用很厚的砖砌的，传不了敲墙的声音，但是里面有取暖的和排水的管道通过的地方，上面涂了白灰，传声效果很好；而且，取暖管道本身似乎是导声的。窗户齐眼睛般高，因此你不用抓住铁栏杆抬起身子就可以看到外面的院子。到现在为止，一切都不错。

---

<sup>①</sup> 路易·德·圣·约斯特(1767—1794)，法国大革命时期革命家，有“革命大天使”之称，是罗伯斯庇尔的得力助手，后一起上了断头台。

他打了个呵欠，脱掉上衣，把它卷起来放在床垫上当枕头。他向院子里望去。在月光和电灯的同时照耀下，积雪闪闪发黄。在院子四周，沿着墙清出了窄窄的一条道给大家每天做操。东方还没有露出鱼白，尽管有电灯，天上的星星仍旧在晶晶闪烁，清楚而且寒冷。在对着鲁巴肖夫牢房的厚厚外墙顶上，有个士兵背着枪在来回踱步；他每一步都踩得很重，好象是在接受检阅一般。昏黄的灯光在他的刺刀上闪闪发亮。

鲁巴肖夫脱了鞋，仍站在窗前。他掐灭了烟卷，把烟头放在床头的地上，然后在床垫上坐了几分钟。他又回到窗边。院子里一片寂静；哨兵正在转身；他在机关炮塔的顶上看到了一片银河。

鲁巴肖夫在铺上躺下身去，用一条毯子把自己裹起来。现在是五点钟，在这里的冬天大概不用在七点钟以前起身。他很困，心里想，三、四天内大概不会再提审他了。他摘了夹鼻镜，放在石砖铺的地上，就在烟头旁边，然后微笑一下，就闭上了眼睛。身子裹着毯子很暖和，有一种得到保护的感觉；几个月来第一次他不怕做梦了。

几分钟之后，狱卒关了牢房外面的电灯，从窥视孔里往里瞧，这时，前人民委员鲁巴肖夫已经睡着了，他的背对着墙，脑袋枕在伸出的左胳膊上，



那条胳膊直挺挺地伸到了铺外，只有手宽松地垂悬着，在他的睡梦中颤动一下。

## 二

一个小时以前，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两个官员来敲鲁巴肖夫的门要逮捕他，当时鲁巴肖夫正在做他被逮捕的梦。

敲门声越来越响了，鲁巴肖夫挣扎着要想醒过来。他从噩梦中挣扎出来已有训练了，因为第一次被捕的梦境多年来一直定期重现，象时钟发条一样有规律。有时，他以坚强的意志力制止住了发条，用自己的力量从噩梦中挣扎出来，但是这一次他没有成功；前几个星期使他筋疲力尽，他在梦中流着汗，喘着气；发条仍滴嗒地响着，梦继续做下去。

他象以前一样，梦见有人在他屋子外面敲门，外面有三个人等着要逮捕他。他可以透过关着的门看过去，他们三人站在外面，撞击着门框。他们身上穿的是崭新的制服，这是适合德国独裁政权近卫军穿的服装；他们的帽檐上和衣袖上佩有徽章：咄咄逼人的带钩十字章；他们的手里握着大得异常的手枪；他们的皮带还带有新鞣制的气味。如今他们进了他的屋子，站在他的床前。两个是高大的农家孩子，厚厚的嘴唇，鱼一样的眼睛；第三个又矮又胖。他

们站在他床前，手里握着手枪，向他喘着粗气。那个矮胖子象有气喘病，除此以外，一片寂静。这时楼上有人扳了一下抽水马桶，水哗哗地流下了砌在墙里的水管。

发条停下来了。鲁巴肖夫的屋子外面的敲门声更响了；外面的两个来逮捕他的人一边敲门，一边又轮换朝冻僵的手呵气取暖。但是鲁巴肖夫醒不过来，虽然他知道接下来是一个特别难受的场面：三个人仍站在他床前，他想穿上睡袍，但是袖子的里外反了，他的胳膊伸不进去，他挣扎着，但没有用，最后终于感到了瘫痪：他动弹不得，尽管一切取决于他能否及时伸进袖子。这种令人折磨的无能为力状态持续了几秒钟，在这几秒钟里，鲁巴肖夫呻吟着，感到了太阳穴又凉又湿，敲门声象远方的一阵击鼓声刺穿了他的睡梦；他的压在枕头下的胳膊拚命地扭动着想找到睡袍的袖子；这时，他终于被手枪枪把打在耳朵上的狠狠一击从噩梦中解救出来……

这最初的一击后来又重复经历过上百次，他的耳聋就是从此开始的。他往往是在这一击的熟悉的刺激下，从噩梦中醒过来的。醒过来以后他还要哆嗦一阵，他的手臂还压在枕头下，仍继续在找睡袍袖子；作为一种规律，他在完全清醒之前，还有一个最后的也是最糟糕的阶段要经过。这就是一种

昏晕的、无可名状的感觉，以为这醒来才是真正的梦境，实际上，他仍躺在黑暗牢房里的阴冷石板地上，脚的那一边是便桶，头的那一边是一壶水和几片面包……

这一次也是这样，在几秒钟里面，这种昏晕状态继续着，他不知道他的手摸到的是便桶，还是床头灯的开关。这时灯亮了，浓雾散开了。鲁巴肖夫深深地呼吸了几口气，象一个康复的病人一样，他的双手交叉在胸前，享受着令人开怀的自由和安全的感。他用床单擦干了额上和后脑勺光秃部分的汗，以已经恢复的讽刺意识看了一眼墙上挂的党内第一号领袖的彩色肖像，——这肖像不仅挂在他屋子里的墙上，也挂在隔壁所有屋子里的墙上，挂在楼上和楼下所有屋子里的墙上，挂在这幢房子，这个城市，这个广大辽阔的国家的所有的墙上。他曾经为这个国家战斗过，吃过苦，如今这个国家又把他接回到它的巨大的保护的怀抱。他如今完全醒了，可是敲门声仍在继续。

### 三

那两个来逮捕鲁巴肖夫的人站在黑暗的过道里，互相商量了一下。把他们带上楼的看门人瓦西里站在开着的电梯门里，恐惧地喘着气。他是个瘦

老头，他的睡衣外面匆匆地披上了一件军用大衣，破领口上露出一块红色的大疤痕，使他有一副瘰子颈患者的样子。这是内战期间脖子受伤留下的痕迹，他在内战期间一直在鲁巴肖夫领导的游击队里打仗。后来鲁巴肖夫被派出国，瓦西里只偶然在晚上听女儿读报时听到过他。她把鲁巴肖夫在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读给他听；这些发言很长，很难懂，瓦西里无法在中间找到那个留胡子的小个子游击队长的声音，他的骂人的话多好听，就是喀山城的圣母听到了也会微笑。一般瓦西里听着发言就睡着了，但等到他女儿读到最后一句话和掌声而郑重其事提高嗓门时，他就醒了。会议结束时总要喊“国际万岁！革命万岁！第一号万岁！”，瓦西里每次都总加上发自内心的一声“阿门”，不过声音很轻，免得他女儿听到；然后他脱了上衣，偷偷地良心不安地画个十字，上了床。他的床头墙上也挂了第一号的肖像，旁边是一幅鲁巴肖夫当游击队长时的照片。要是发现了这张照片，他大概也会被带走的。

楼道里又冷又暗，十分寂静。内务人民委员会来的两个人中那个年轻的主张用枪击破门上的锁。瓦西里靠在电梯门上，他还没有来得及穿好靴子，因为他的手哆嗦得厉害，系不上鞋带。两个人中年纪大的那个不主张开枪；这次逮捕得谨慎从事。他们

两人都朝自己冻僵了的手呵气，然后又开始敲门。年轻的那个用枪托敲。楼下有个女人尖声地喊叫起来。“叫她闭上嘴”年轻的那个对瓦西里说。“别喊了，”瓦西里叫道，“当局在这里。”女人的叫声马上停止了。年轻的开始改用靴子踢门。踢门声充满了整个楼梯上下；最后门终于给踢开了。

他们三个人站在鲁巴肖夫的床前，年轻的手中握着手枪，年老的站得笔挺，好象立正的姿态，瓦西里站在他们后面几步远，靠着墙。鲁巴肖夫仍在擦后脑勺的汗，他的睡意朦胧的眼睛因为近视而眯着看他们。“鲁巴肖夫公民，尼古拉斯·萨尔曼诺维奇，我们以法律的名义逮捕你，”年轻的说。鲁巴肖夫在枕头下摸他的眼镜，身子稍许支起来一些。如今他戴上了眼镜，他的眼睛有了瓦西里和年纪大的那个官员在旧照片和彩色画片中看到过的表情。年纪大的那个站得更毕恭毕敬了。年轻的那个是在新的英雄人物的教育下成长的，他向床前走近了一步。别的三个人都看到他要说点什么或者做什么粗暴的事来掩饰他的不自在。

“把那支枪放开，同志，”鲁巴肖夫对他说。“你要我干什么呀？”

“你刚才听到你已经被捕了，”那小伙子说。“穿起衣服来，别闹了。”

“你有逮捕证吗？”鲁巴肖夫问。

年纪大的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来，递给鲁巴肖夫，又以立正姿势站着。

鲁巴肖夫仔细地读了一遍：“那末，好吧。”他说，“这种东西看了也没有用；真是见了鬼。”

“穿好衣服，别磨蹭，”年轻的说。这时可以看出他的粗暴态度不再是装的，是天生的。鲁巴肖夫心里想，新的一代已经培养出来了。他想起一些宣传画上总把青年画成一张笑脸。他感到十分疲倦。“别在这里玩弄你的手枪，把睡袍递给我，”他对小伙子说。小伙子脸红了，但没有说话。年纪大的把睡袍递给鲁巴肖夫。鲁巴肖夫把胳膊伸进了袖子。“这一次总算穿了进去，”他勉强笑道。其他三人不懂他这话是什么意思，没有出声。他们看着他慢慢起了床，把团皱了的衣服穿上。

在那女人尖叫一声之后，整所房子寂静无声，但是他们感觉得到，所有住户都醒了，躺在床上屏住呼吸。

这时他们听到楼上有人扳了抽水马桶，水从水管里哗哗地流了下来。

#### 四

大门外停着那两个官员坐着来的汽车，这是一

辆新式的美国车。天还没有亮，司机开了车头灯，街道还在沉睡，或者装着在沉睡。他们进了汽车，先是年轻的，后是鲁巴肖夫，最后是年纪大的。司机也身穿制服，他发动了汽车。开到马路转角，沥青路面就到了头。他们虽然仍在市中心，四周都是九层、十层高的楼房，但路却是农村走大车的土路，车轮压出来的车辙缝中有一层薄雪。司机用走路速度开着车。这辆弹簧很好的汽车象牛拉的大车一样咔吱作响。

“开得快些，”小伙子说，他忍受不了车上的沉默。

司机头也不回，耸一耸肩。鲁巴肖夫上车的时候，他不在意地也不友好地看了一眼。鲁巴肖夫曾经遇到过一次车祸，开急救车的司机也曾经这么看过他一眼。在阒无人迹的街道上一颠一簸地慢慢地开着车，车头灯的灯光在他们前面摇晃，使人吃不消。“多远？”鲁巴肖夫问，连正眼也不看一下同行的人。他几乎加上了一句：到医院？“得开半小时”，年纪大的穿制服的说。鲁巴肖夫从口袋里掏出香烟，放一支在嘴里，机械地把烟盒递给别人。年轻的断然拒绝了，年纪大的取了两支，把其中一支递给司机。司机举手碰一碰帽檐，给每个人都点了火，另外一只手掌着方向盘。鲁巴肖夫的心轻松了一些，同

时也为此而对自己不高兴。他想，这可不是自作多情的时候。但是他还是抗拒不了谈话的诱惑，要想在周围引起一些人情的温暖。“这车可倒了霉。”他说。“外国车，钱可花了不少，可是在咱们这道路上开上半年就报废了。”

“您说得不错。咱们的道路可真落后，”年纪大的官员说。从他的语气可以听出，他也明白自己无能为力。鲁巴肖夫感到自己就象给扔了一根骨头的狗一样，决心不再开口了。但是那个小伙子却声势汹汹地说了起来。

“在资本主义国家马路就好一些？”

鲁巴肖夫不由得感到好笑：“你出过国没有？”他问。

“我还是知道那边是怎么样，”小伙子说。“你不用唬弄我。”

“你把我当作是什么人？”鲁巴肖夫安静地说。但是他不由得加上一句：“你的确需要学习一下党史。”

小伙子缄默了，目不斜视地看着司机的背。没有人再说话。司机第三次熄了发动机，又重新点火，嘴上骂骂咧咧的。他们在郊区颠簸着，从简陋的木房子的外表来看，没有什么变化。在它们的黑影上空，月亮苍白而且寒冷。



## 五

在这新模范监狱的每条过道里，都开着灯，照得铁门、白灰墙、写着姓名的卡片和黑色窥视孔的牢房门显得有些阴惨惨的。惨淡的电灯光，还有他们在石板地上的没有回声的脚步，是这么的熟悉，使鲁巴肖夫在短短的几秒钟里有了一种错觉，以为自己又在做梦了。他尽力想使自己觉得，这一切都不是真的。他想，要是我能使自己相信在做梦，那这一切就真是一场梦了。

他竭力这么想，结果弄得头几乎发晕了。接着他感到一阵羞愧。他想，这一切都得熬过去，一直熬到尽头。他们到了404号牢房门前。窥视孔上面有一张卡片。上面写着他的姓名：尼古拉斯·萨尔曼诺维奇·鲁巴肖夫。他想，他们什么都准备好了，看到自己的姓名在卡片上给他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他想让狱卒添一条毯子，但门已经在他身后关上了。

## 六

狱卒每隔一会儿就来窥视一下鲁巴肖夫。鲁巴肖夫安静地躺在铺上，只是他的手有时在睡梦中颤动一下。铺边地上放着他的夹鼻眼镜和一支烟头。

早上七点钟——他给带到404牢房以后两小

时——鲁巴肖夫给军号声吹醒。他这一觉没有做梦，因此醒来时头脑清醒。军号用同一调子吹了三次。发颤的号声引起了回声，然后消失了，剩下的是一片不祥的沉默。

天还没有大亮。由于光线黯淡，便桶和水盆的轮廓有些模糊。窗户的铁格子是一幅黑色的图案，衬托在灰蒙蒙的玻璃上；左上角有一小块玻璃破了，用一张报纸糊住。鲁巴肖夫坐了起来，伸手摸来了夹鼻眼镜和烟头，又躺了下去。他戴上眼镜，想法燃起烟头。沉寂继续着。在这所钢筋混凝土浇制的蜂房里，每一间涂了白灰的牢房里的人都同时起了床，一边嘟嘟囔囔，一边在地上摸着。但是在单独禁闭的牢房里，却听不到声音——除了过道上偶尔传来的脚步声。鲁巴肖夫知道他关的是单独禁闭室，一直要呆到枪决。他摸着短短的翘胡子，吸着烟头，静静地躺着。

看来我是要给枪毙了，鲁巴肖夫心里想。他眨着眼睛，看在床铺的那头翘起的脚拇指的扭动。他感到暖和，安全，又疲倦，他不在乎昏昏沉沉地睡着死去，就在当时当地，只要他们让他躺在暖和的毯子下面。“看来他们要枪毙你了，”他对自己说。他慢慢地扭动着袜子里的脚拇指，忽然想起了一句把基督的脚比做荆棘丛中一只白色的獐子的诗。他

在袖口上擦一擦眼镜，这姿势是他的部下都看惯了。他在毯子的暖和中感到满足，只担心一件事，就是要他起来离开。“看来他们要把你消灭掉了，”他出声对自己说，又燃了一支烟，虽然只剩下三支了。空腹抽烟有时会引起喝醉酒的感觉；如今他已处于从前濒于死亡边缘时才有的奇特的兴奋状态。他同时又知道，这种状态是应该受到谴责的，从某一观点来看，是不应允许的。但同时他又不想采取这一观点。相反，他看着袜子里脚拇指的扭动。他微笑了。他感到对自己躯体的怜悯，这是他一般所不喜欢有的感觉。眼前即将发生的毁灭使他有了一种自己怜悯自己的愉快感。“老卫兵死了，”他对自己说：“我们是最后一批了。”“我们就要被毁灭。”“因为金色的男女少年象扫烟囱的一样，都要化为灰尘……”他想回忆起“化为灰尘”的调子，但想起的只有歌词。“老卫兵死了。”他重复一遍，想记起他们的脸。他只能记起少数几个。国际的第一任主席被当作叛徒处决了，他只能想起他那微鼓的肚皮上的格子背心。他从来不用背带，总是腰带。革命国家的第二任总理也被处决了，他在危险的时刻爱啃指甲。历史会给你们恢复名誉，鲁巴肖夫心里想，但没有太多的信心。历史知道什么啃指甲呢？他吸着烟，想着死者，想着他们死前遭到的羞辱。尽管

这样，他无法使自己仇恨第一号，这是他应该做的。他常常望着床头墙上挂的第一号的彩色肖像，要想恨他。他们常常偷偷地给第一号起了许多外号，但是最后是“第一号”这个外号流传了下来。第一号所制造的恐怖，首先是在于他可能是正确的，所有被他杀死的人即使后脑勺打进了子弹，都不得不承认，他很可能是正确的。谁也拿不准，只好上诉于他们称之为历史的那个开玩笑的权威，她只有在上诉者的下颚都已化为尘土以后很久才作出判决。

鲁巴肖夫觉得自己受到了窥视孔外的监视。他看也不用看就知道有个瞳孔从窥视孔里向牢房里张望，一会儿以后，锁眼里真的响起了钥匙的转动声。但是过了好久门才打开。狱卒是个穿拖鞋的老头，他站在门里。

“你为什么不起床？”他问。

“我病了，”鲁巴肖夫说。

“什么病？明天才能带你去看大夫。”

“牙痛，”鲁巴肖夫说。

“牙痛？”狱卒说，转身出去，关上了门。

现在我可以静静地躺在这里了，鲁巴肖夫想，但这并没有使他感到好过。毯子的温热使他讨厌，他把它掀掉。他又想看脚拇指的扭动，但他已厌倦了。每只袜底都有个洞。他想补一下，但一想到去

敲门，向狱卒借针线，就不想补了；肯定是不借给他的。他忽然想看报纸了。这个欲望很强烈，使他闻到了油墨的气味，听到翻动报纸的窸窣声。也许昨天晚上爆发了一场革命，有个国家的元首给刺杀了，或者有个美国人发现了抵抗地心吸力的办法。他的被捕不可能已经上了报，但是这消息很快就会走漏，他们会从资料室里找出一张十年前的照片登出来，发表不少关于他和第一号的关系的胡说八道。他现在不想看报了，但是却同样迫切想知道第一号脑子里是怎么想的。他仿佛看到他坐在桌子后面，双肘撑着，脸色阴沉，在向一名速记员慢慢地口授。别的人在口授时都来回踱步，吐烟圈或者玩尺子。只有第一号一动不动，不玩什么东西，也不吐烟圈……鲁巴肖夫突然发现，他自己在过去五分钟里也在来回踱步；他已经从床上起来，却没有意识到。他又陷进了他的老习惯：在石砖铺的地上，决不踩在边线行走，石砖的图型他已记熟了。但是他的心里从来没有把第一号忘掉过一秒钟。第一号坐在办公桌后，一动不动地口授命令，慢慢地化成他的肖像，化成那幅人们熟知的彩色肖像，挂在全国各地的每一张床的床头上或在柜顶上，它的冷冰冰的眼睛盯着人们。

鲁巴肖夫在牢房里来回踱步，从门边走到窗下，

又从窗下走到门边，一边是睡铺，一边是水盆和便桶。朝前走六步半，朝后走六步半。走到门后，向右转，走到窗下，向左转：这是监牢里的老习惯，你要是来回转时不改变方向，你会马上变得晕头转向的。第一号脑袋里是怎样想的？他的想象中出现了那个脑袋的分解图，用灰色的水彩画在一张用图钉按在画板上的纸上。螺旋状的灰白质膨胀成了肠子，肠子又互相绕卷成有肌肉的蛇，象在一幅天文图表上的螺旋上升的星云一样模糊不清了。……在那膨胀的灰白色螺旋形中，在想些什么呢？对于遥远的星云，我们什么都知道，但是对于螺旋形的灰白质，我们什么也不知道。也许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历史更是天启，而不是一门科学。也许在以后，在很久以后，历史会用统计图表来教授，再辅以这种解剖。教师会在黑板上画出一个代数公式代表某一阶段某一国家的群众生活条件：“你们瞧，同学们，这就是限制这个历史过程的客观因素。”他用教鞭指着第一号脑袋中第二脑叶和第三脑叶之间的灰白质的地方说：“你们在这里看到了这些因素的主观反映。就是这个，在二十世纪第二个二十五年中，导致了东欧极权原则的胜利。在还没有到达这个阶段之前，政治仍是流血的业余嗜好，仅仅是迷信和巫术……”

鲁巴肖夫听到好几个人齐步从过道过来。他的

第一个反应是：拷打就要开始了。他停步在牢房中央，听着外面的响动，下巴向前鼓着。步伐声在他隔壁牢房门前停了下来，听到一声命令，钥匙的转动。接着是一片寂静。

鲁巴肖夫僵硬地站在他的睡铺和便桶中间，屏住呼吸，等待第一声尖叫。他记得，第一声尖叫往往最厉害，因为在这当中，恐怖胜过了肉体的痛苦；后来的事就比较容易忍受了，因为你已经习惯，而且过了一阵子以后，你甚至可以根据叫声的调子和节奏得出用的是什么样的刑罚的结论。到了最后，大多数人的行为都是一样的，不论他们的气质和声音有什么不同：叫喊减弱了，变成了呜咽和喘息。一般到这时候就会听到关门声。钥匙又会转动；下一个受害者的第一声尖叫甚至在他们还没有碰他之前，一看到他们出现在门口，就发出来了。

鲁巴肖夫站在牢房中央，等待第一声尖叫。他在袖口擦了一擦眼镜，心中对自己说，不论发生什么，他这一次也不喊叫了。他重复这句话，好象念经似的。他站着等着；尖叫声仍没有传来。接着他听到轻轻的一声碰撞声，有人低声地说了一句，牢房门关上了。步伐声移到了下一个牢房。

鲁巴肖夫到窥视孔前去张望外面的过道。那几个人几乎就站在他对面的那个牢房第407号的门前。

那个老狱卒带着两个勤杂工，提着一壶茶，还有一个勤杂工带着一篮切好片的黑面包，后面跟着两个带手枪的穿制服官员。原来没有拷打，他们是送早饭来……

第407号刚刚接过面包。鲁巴肖夫看不见他。407号大概是按规矩站在门内一步的地方。鲁巴肖夫只能看见他的前臂和手。他的手臂裸在外面，非常瘦，象两根平行的棍子，从门里伸到过道。看不见的407号的手心向上，合成一个碗的形状。他拿到面包以后就把掌心合在一起，缩回到黑暗的牢房里去了。门关上了。

鲁巴肖夫从窥视孔退了回来，恢复来回踱步。他也不再在袖口上擦眼镜，把眼镜戴上，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感到了宽慰。他吹了一声口哨，等待他的早饭。他略带不安的感觉，想着那一双细瘦的手臂和合在一起的掌心；这使他模糊地想起了一件他无法明确的事。这伸着的双手的轮廓，甚至上面的阴影，在他看来都很熟悉——很熟悉，但是象一只老调子，或者一个港口的一条狭隘街道的气味一样，已从他的记忆中消失了。

## 七

这一队人开门又关门，但还没有到他这里。



鲁巴肖夫又到窥视孔那里，张望一下他们是不是终于到他这里来了，他等着想喝热茶。茶壶冒着热气，上面还飘着几片薄薄的柠檬。他取下夹鼻镜，把眼睛贴在窥视孔上。他的视线可以看到对面几个牢房，从401到407。牢房上面是一条狭狭的铁走廊，走廊后面是二层楼的牢房。这一行人刚从过道的右边过来；显然他们先送单号，然后送双号。如今他们站在408号门外；鲁巴肖夫只看见两个带枪的穿制服的人的背影；其余的人站在他的视野以外。门被关上了，如今他们来到了406号。鲁巴肖夫又看见了冒热气的茶壶和提着面包篮子的勤杂工。篮子里只剩下几片面包了。第406号的门开了又马上被关上了，这一间牢房没有住人。这一行人走近过来，经过他的门，停在402号门口。

鲁巴肖夫开始用拳头敲门。他看到那两个推着茶壶车的勤杂工互相看了一眼，又回过头来看他的门。狱卒忙着开402号的锁，假装没有听到。两个穿制服的人背对着鲁巴肖夫的窥视孔站着。如今面包已送进了402号的门。这一行人开始继续往前走。鲁巴肖夫敲门敲得更响了。他脱下一只鞋子，在门上使劲敲。

两个穿制服的人中间一个个子高大一些的转过身来，没有表情地看了一眼鲁巴肖夫的门，又转了回

去。狱卒关上了402号的门。推着茶壶的两个勤杂工犹豫地站在那里，曾经转过身来的那个穿制服的对狱卒说了些什么，狱卒耸耸肩，带着一大束钥匙回到鲁巴肖夫的门。推茶壶的两个勤杂工跟着他，提着面包篮子的勤杂工对着402号的窥视孔说了些什么。

鲁巴肖夫后退一步，等着开门。他身上的紧张情绪突然消失了，他如今根本不在乎给不给茶喝。茶壶里的茶在回程道上已不冒热气了，剩下的浅黄色流汁上的几片柠檬看上去已经软缩、不新鲜了。

钥匙在他的门里转动，接着窥视孔里出现一只盯着瞧的瞳孔，后来又消失了。门被推开。鲁巴肖夫坐在床上把鞋子穿上。狱卒推开门让穿制服的大个子进来。他的圆圆的脑袋剃得光光的，脸上没有表情。他的洗烫得僵硬的制服和皮靴都会发出咔吱的声音。鲁巴肖夫觉得可以嗅到他手枪套的皮革气味。他走到便桶旁边停下，看了牢房一眼，有他进来，牢房显得更小了。

“你还没有收拾好房间，”他对鲁巴肖夫说。“你知道规矩吗？”

“为什么早饭把我给漏掉了？”鲁巴肖夫通过夹鼻眼镜看那军官。

“你要是同我争论，你得站起来。”军官说。

“我一点也不想同你争论，甚至也不想同你谈话。”鲁巴肖夫说，一边系鞋带。

“那末下次别敲门了，否则就得对你采取纪律措施。”那军官说。他又看了一眼牢房：“犯人没有拖地板的拖把，”他对狱卒说。

狱卒对提面包篮的勤杂工说了一句话，勤杂工就马上到过道那一头去了。其他两个勤杂工站在门口，好奇地看着牢房里的一切。第二个军官转过身去，站在过道里，双腿叉开，双手放在背后。

“犯人也没有饭碗，”鲁巴肖夫说，仍在系鞋带。“我想你们是要省得我自己绝食吧。我真钦佩你们的新方法。”

“你弄错了，”那个军官面无表情地看着他说。他的剃光的头颅上有一条很阔的疤痕。他的纽扣孔里挂着革命勋章绶带。因此他参加过内战。鲁巴肖夫想。但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如今已没有关系……

“你弄错了。没有给你早饭是因为你自己说有病。”

“牙痛。”老狱卒说，他靠在门边。他仍穿着拖鞋，制服揉皱，到处是油迹。

“随你的便，”鲁巴肖夫说。他话到嘴边要想问这是不是现政权用强迫绝食来对待病人的最新成

就，但他控制住了自己。他对这一切都感到厌倦。

送面包的勤杂工拿着一块脏布气喘吁吁地跑来。狱卒从他手中接过了那块脏布，扔在便桶边的墙角里。

“你还有别的要求吗？”军官问，一点也没有讥刺的意思。

“请你们走开，别再演这出滑稽戏了，”鲁巴肖夫说。军官转身要走，狱卒手里的钥匙叮当作响。鲁巴肖夫走到窗前，背对着他们。等到门碰上以后他才想起他忘记了重要的事情，便急忙跑到门前。

“纸和笔，”他从窥视孔往外喊。他取下夹鼻镜，把眼睛贴到窥视孔上，看看他们是不是转过身回来了。他的叫声很高，但他们已朝过道那一头走去，仿佛什么也没有听见。他最后看到的是那个剃光头的军官的背影，还有宽阔的皮带，上面有手枪套。

## 八

鲁巴肖夫恢复了在牢房里的来回踱步，六步半到窗前，六步半回来。刚才的场面激动了他；他一边在袖口上擦夹鼻眼镜，一边在脑海中重演刚才这个场面的细节。他要想保持他刚才片刻之间对那军官和疤痕的憎恨；他想这也许能够使他在未来的斗争中坚强起来。但是相反，他又一次进行了熟悉的、

致命的自我节制，把自己设身处地放在对方的地位，通过别人的眼睛来看发生的事。这个叫鲁巴肖夫的家伙坐在那里穿鞋子，态度傲慢，显然是想挑衅找事。当然，这个叫鲁巴肖夫的家伙有他的功劳和光荣的历史，但是在代表大会上看到他站在讲台上是一回事，在牢房里看到他坐在草垫上又是一回事。原来这就是传说中的人物鲁巴肖夫——鲁巴肖夫假设自己是那个面无表情的军官。象个小学生一般吵着要吃早饭，一点也不难为情。牢房没有打扫，袜子有个洞。性好争论的知识分子。阴谋反对法律和秩序：不论是为钱还是为原则都没有区别。我们不是为精神病患者而革命的。不错，他为革命出了力；那时候他是个男子汉；如今他年老固执，自以为是，该加以清算了。也许甚至在那个时候他也是这样的，革命之中总有些肥皂泡，后来破了。如果他还有一些自尊心，他早就把牢房打扫了。

鲁巴肖夫忽然想是不是该把地板拖一下。他犹疑地站在牢房中央，然后又戴上夹鼻镜，站到窗前去。

院子里已是大白天了，天色灰濛濛的，预示还要下雪。大概是八点钟，自从他进牢以后，还只有三个小时。院子四周的墙象军营的墙，所有的窗户外面都有铁栏，牢房里面太暗，看不清什么。甚至

看不清有没有人象他那样站在窗后看院子里的积雪。雪很细，已有些结冰了，走在上面会咯吱咯吱响。离墙根十步的地方有一条道，圈着院子，在这条道的两旁都有雪堆了起来。在对面的墙顶上有个哨兵在来回踱步。有一次转身时他向雪堆吐了一口唾沫，然后低头看是不是落下后就结冰了。

老毛病，鲁巴肖夫想。革命家不可以通过别人的脑子来思考。

还是也许可以这样？还是甚至应该这样？

要是你同所有的人都等同起来，你怎么能改变世界？

你还有什么别的办法改变世界？

能够了解和原谅的人——他从哪里找到行为的动机？

他从哪里找不到？

他们会枪毙我，鲁巴肖夫想。我的动机对他们没有兴趣。他把额角靠在窗户上。外面的院子一片雪白，一片寂静。

他这样站了一会儿，脑子里不想什么，只是额角感到了玻璃的凉意。他慢慢地意识到了牢房里有一种细微然而不断的滴嗒声。

他转过身来听着。敲声很轻，一开始他分不出是从哪一面墙传来的。他留神听时，敲声停了。他

自己也开始敲击起来，先是在便桶那一边墙上，那是406号一边，但没有听得回声。他试敲另一边墙，那是402号一边，就挨着他的铺。这里他听到了回音。鲁巴肖夫在铺上坐好了，这样他可以注意着窥视孔那边，心跳不止。第一次接触总是令人十分兴奋的。

第402号如今有规律地敲了起来；敲三下，然后一顿，接着又敲三下，又是一顿，接着又是三下。鲁巴肖夫照这样子重复一遍，表示他听到了。他很想知道对方是不是知道“方阵字母”——要是不知道，他要把他教会要费不少力气。墙很厚，传声效果不佳，他得把脑袋紧贴着墙，同时又要注意窥视孔那一边。第402号显然很有实践经验，他敲得清楚，不慌不忙，可能是用铅笔之类的硬物。鲁巴肖夫一边记住数字，一边由于缺少实践，得在心目中看到共分25块方格的数字——横的5排，每排5个字母。第402号先敲了5下，这就是说第5排，从V到Z的字母；接着敲了2下，这就是指这一排的第2个字母：W。接着一停顿，再敲2下，这指第2排从F—J；然后3下，指这一排第3个字母：H。接着又是3下和5下，这是指第3排的第5个字母：O。他停下了。

“WHO（谁）？”

真是个讲实际的人，鲁巴肖夫想；他想马上知

道他要与之打交道的人是谁。根据革命的礼仪，他应该先来一句政治套话，然后才提供消息；接着谈食物和烟草，最后（几天后）才介绍自己。但是，鲁巴肖夫的经验迄今为止限于党在那里受迫害的国家，而不是迫害者，至于党员，则因为地下保密关系，只知对方的教名——甚至连教名也改了多次而失去意义了。而这里显然是个不同的情况。鲁巴肖夫犹豫了一会儿，拿不定主意，该不该告诉对方他的真实姓名。第402号不耐烦了，他又敲：“谁？”

嗯，为什么不告诉他呢？鲁巴肖夫想。他敲出了自己的全部姓名：尼古拉斯·萨尔曼诺维奇·鲁巴肖夫，然后等待对方反应。

很久没有回音。鲁巴肖夫微笑了，他可以想象这给他的邻居的震动有多大。他等了足足一分钟，接着又是一分钟，最后他耸一耸肩，从铺上下来，恢复在牢房里的踱步，但每次转身，都停下来听一听墙上有没有回音。墙保持着沉默。他在袖口擦一擦夹鼻镜，慢慢地走到门前，从窥视孔里向外面过道看出去。

过道上空无一人；电灯发出昏黄的光，一点声音也听不到。第402号为什么哑了？

也许是由于恐惧；他不愿因鲁巴肖夫而受到牵连。也许第402号是个不问政治的医生或工程师，一



想到隔壁危险的邻居就吓坏了。肯定是个没有政治经验的人，否则就不会一开始就问人家姓名了。可能因为一桩破坏案件而受牵连的。显然在监牢里已蹲得很久了，学会了敲墙，一心想表明自己是无辜的。仍旧简单地相信，他主观上认为有罪或无罪是起作用的，不知道真正起作用的是什么更加重要的关系。他很有可能坐在自己的铺上，向当局写第100次没有人置理的抗议，或者向妻子写永远收不到的第100封信。在绝望之中留起了胡须——普希金式的黑胡须，已放弃了盥洗的习惯，而染上了咬指甲和白日做春梦的恶习。蹲监牢没有比自认为无辜最糟糕的了；它使你不能适应环境，败坏你的精神……突然敲声又开始了。

鲁巴肖夫马上坐到铺上来；但头两个字母已错过了。第402号现在速度很快，又不清楚，显然他很激动：

“……活该。”

“你活该。”

这是没有意料到的。第402号是个正统派。他憎恨反对派异端邪说，相信历史是按照绝对正确的计划在一个绝对正确的人物——第一号——的指引下循着轨道前进的。他认为他自己的被捕仅仅是误会的结果，前几年的所有灾祸——从中国到西班牙，

从饥荒到消灭老卫兵——都是不幸的意外事故，或者是鲁巴肖夫及其反对派朋友的阴谋诡计所造成的。第402号的普希金式胡须不见了，现在是一张刮得干干净净的狂热的脸，他竭力保持牢房整洁，严格遵守纪律。同他争辩是没有用的；这一种人是无法教育的。但把这个同外界的唯一、也许是最后的联系割断，也是没有意义的。

“谁？”鲁巴肖夫非常清楚而缓慢地敲。

回答却是很激动，时快时慢：

“同你无关。”

“随你的便。”鲁巴肖夫敲道，站起来恢复来回踱步，以为会谈已结束了。但是对方又敲了，这一次很响——第402号显然脱下了一只鞋子在敲，使自己的话更有分量：

“皇帝陛下万岁！”

原来是这样，鲁巴肖夫想。仍旧有货真价实的反革命分子——而我们却以为只存在于第一号的报告中，作为他政策失败的替罪羊。但是那里就有一个，有血有肉，大声叫喊：皇帝万岁……

“阿门。”鲁巴肖夫微笑地敲着。回答马上传来，更大声了。

“蠢猪。”

鲁巴肖夫感到很好玩。为了使声音有些变化，

他摘下夹鼻镜，用金属边敲击着：

“不怎么明白。”

第402号似乎要疯了。他敲出了“狗腿——”但“子”没有敲出来，就突然怒气全消了，改为：

“你为什么给关起来？”

真是简单得感动人……第402号的脸色有了新的变化。它变成了一个年轻近卫兵的脸，英俊然而愚蠢。也许他还戴单片眼镜。鲁巴肖夫用夹鼻镜敲道：

“政治分歧。”

停了一会儿。第402号显然是在绞尽脑汁找个讥讽的答复。答复终于来了：

“好啊！狗咬狗。”

鲁巴肖夫没有回答。这样的消遣已经够了，他又开始想别的了。但402室的那位却谈兴正浓。他敲道：

“鲁巴肖夫……”

啊，这有点儿太亲密了。

“什么？”鲁巴肖夫回答。

第402号似乎有些犹豫，最后来了一个长句：

“上次你同女人睡觉是什么时候？”

第402号肯定戴单片眼镜，很可能就是用它来敲墙的，不戴眼镜的眼睛在神经质地眨巴着。鲁巴肖

夫没有反感。这个人至少暴露了他真实的面目，这比他敲出君主派宣言要令人愉快得多了。鲁巴肖夫想了一想答道：

“三个星期之前。”

回答马上就来：

“把详细情况告诉我。”

啊，这真的有些太过分了。鲁巴肖夫的第一个反应是马上中断谈话。但是他想到此人作为与400号以及那边其他牢房的联系，将来也许有用。左边的牢房显然空着没有人住，中间断了线。鲁巴肖夫苦苦思索着。战前的一支歌忽然在他的记忆中泛起，这是他学生时代在一个夜总会听到的，那里有穿黑色长统丝袜的女人在跳法国的康康舞。他无可奈何地叹口气，又用夹鼻镜敲道：

“雪白的乳房可以嵌进香槟酒玻璃杯……”

他希望这个调子是对头的。显然如此，因为第402号要求：

“说下去，细节。”

这时他一定是在捻胡子。他肯定有一副两头翘的小胡子。此人真该死；他是唯一的联系，必须同他保持好关系。军官们在食堂里说些什么？女人和马匹。鲁巴肖夫在袖口上擦一下夹鼻镜，然后认真地敲道：

“屁股象一头母马。”

他停了下来，精疲力尽。他只能到此为止，不能再下去了。可是402号十分满意。

“好样的！”他热烈地敲道。他肯定是在畅怀大笑，但是你什么也听不到。他拍着屁股，捻着胡子，但是你什么也看不到。无声的墙壁的抽象的淫猥，使鲁巴肖夫感到难堪。

“说下去，”第402号要求。

他不能再说下去。“就此而已，”鲁巴肖夫敲道，但马上后悔了。可不能得罪402号。幸而402号是不容易得罪的。他用他的单片眼镜固执地敲着：

“说下去，请你说下去，请你……”

鲁巴肖夫现在已十分熟练，不需要记数，就能马上演译成字母。他仿佛能听到第402号要听到更多色情细节的恳求声：

“请你，请你……”

第402号显然年纪尚轻，也许是在流放中长大的，出身于旧军人家庭，用假护照混进国内来——他显然自己在作贱自己。他肯定一边在捻胡子，一边把单片眼镜夹上，绝望地看着白灰墙壁。

“请你再说一些，请你……”

……绝望地看着无言的白灰墙壁，看着水印污迹，这污迹多看看就具有了女人的形状，香槟酒杯

一样的乳房，母马的屁股。

“请再给我说一些——请你。”

也许他是跪在铺上，双手合在一起，就象407号的犯人双手合在一起接过面包去一样。

鲁巴肖夫如今终于知道了这个姿态使他想起的经历——瘦削的伸出的双手的哀求姿态。

圣母玛丽亚膝上抱着基督尸体的画像。

## 九

圣母画像……一个星期一下午在德国南部一个小镇的画廊里。那地方一个人影也没有，除了鲁巴肖夫和那个他来会面的青年。他们的谈话是在一间空屋子中央的一片华丽的圆沙发上进行的，四周墙上挂了佛拉芒大师们的许多女性肉体裸像。那是1933年，恐怖时期的头几个月，鲁巴肖夫被捕前不久。运动被击败了，成员都被查禁、追捕、打死。党不再是个政治组织；它不过是一大块流血的肉体，有上千个头颅和手臂。正如一个人死了以后头发和指甲仍继续生长一样，党虽已死去，但它的个别细胞、肌肉和肢体之中，运动仍在发生。全国各地都有小批的人在灾难之后幸存下来，继续地下策划。他们在地下室、树林、火车站、博物馆、体育俱乐部里碰头。他们不断变换住所、姓名、习惯。他们

互相只知道教名，不问对方住址。大家都把生命托付给了对方，但互相又不信任。他们印刷小册子，想让自己和大家都相信他们仍活着。他们夜间悄悄地出现在郊区小巷里，在墙上书写以前的标语，证明他们仍活着。他们在黎明时分爬上工厂的烟囱，挂出以前的旗帜，想证明他们仍活着。只有极少数人看到过小册子，他们一见到就马上扔掉，因为死人的信息使他们打寒战；墙上的标语到天亮就不见了，旗帜也从烟囱上扯下。但是它们总是再次出现。因为在全国各地都有小批的人叫自己是“放假的死人”，一生都要证明他们仍有生命。

他们相互之间没有联系；党的神经系统已经砸烂，每个小组都独立存在。但是它们慢慢地又伸出触角。体面的行商从国外回来，用的是假护照，衣箱中有夹层底；他们是信使。他们通常是被抓到后，严刑拷打，然后砍头；但后继有人。党仍死了，它不再行动，也不再呼吸，但是它的头发和指甲继续生长。国外的领袖在它的僵硬的尸体上通了电流，造成四肢不断的挛动。

圣母画像……鲁巴肖夫忘记了402号，继续在牢房中来回走六步半。他发现自己又在那个画廊里的华丽圆沙发上，那里有灰尘和地板蜡的气味。他是从火车站雇车直接去约会地点的，早到了几分钟。

他相当有把握没有人注意他。他的手提箱放在衣帽间里，里面装的是一家荷兰公司最新牙医器材的样品。他坐在华丽的圆沙发上，通过夹鼻眼镜看着墙上的大块大块松弛的肉，一边等着。

年轻人的名字叫理查德，当时是该市的小组长，他来晚了几分钟。他从来没有见过鲁巴肖夫，鲁巴肖夫也从来没有见过他。他已经走过了两间空画廊，这才看到了鲁巴肖夫坐在圆沙发上。鲁巴肖夫的膝上放着一本歌德的《浮士德》，是李克拉姆出版公司的环球版。年轻人看到了那本书，匆匆地环顾一下四周，就在鲁巴肖夫身旁坐了下来。他有点怕羞，坐在沙发的边缘上，离鲁巴肖夫两尺远，帽子放在膝上。他是个锁匠，穿了一身只在星期天才穿的黑色衣服，他知道穿了工装裤到博物馆去是会招人注意的。

“您好。”他说。“您得原谅我迟到了。”

“很好，”鲁巴肖夫说。“先让咱们把你的人过一遍。你有名单吗？”

名叫理查德的年轻人摇摇头：“我身上不带名单，”他说。“我都记在脑袋里——连他们的地址。”

“很好，”鲁巴肖夫说。“可是要是他们逮到你呢？”



“这个嘛，”理查德说，“我把一份名单给了安妮。您知道，安妮是我妻子。”

他停了下来，咽了一口唾沫，喉结一上一下。接着他第一次正面看着鲁巴肖夫。鲁巴肖夫看到他的眼圈发红，有些鼓突的眼珠上满布血丝，下巴和双颊毛茸茸的，同星期天衣服的黑衣领不相称。“安妮昨天晚上被捕了，您知道，”他说，看着鲁巴肖夫；鲁巴肖夫从他的眼睛里看到了他抱着孩子气的希望，以为鲁巴肖夫既然是中央委员会的信使，一定能制造奇迹帮他。

“真的吗？”鲁巴肖夫说，在袖口上擦擦夹鼻眼镜。“那么全部名单都落在警察手里了。”

“没有，”理查德说，“因为他们来逮她时，我的小姨正好在家，她想法把它递给了她。放在我小姨那里很安全，您知道；她嫁给了一个警察，但是她站在咱们一边。”

“很好，”鲁巴肖夫说。“你妻子被捕时你在哪里？”

“事情是这样的，”理查德说：“我没有睡在家里已有三个月了，您知道。我有个好朋友是放映电影的；我可以到他那里去，电影一放完就可以睡在他的放映室里。可以从救火梯直接从街上到他那里。看电影不花钱……”他歇一口气，咽了一口唾

沫。“我的好朋友常给安妮免票看电影，您知道。灯一黑她就抬头看放映室。她看不见我，但有时银幕上很光亮时我能看到她……”

他停了下来，他的对面挂着一幅“最后的审判”：有着光溜溜屁股的卷发的婴儿吹着小号飞到暴风雨中去。理查德的左面挂着一幅德国大师的钢笔画；鲁巴肖夫只能看到一部分——其余部分给沙发背和理查德的脑袋挡住了：圣母的纤细的手，向上合在一起成了碗状，空旷的天空有几条横线。别的就看不清了，因为理查德在讲话时，脑袋始终不动，牢固地固定于他那稍许弯曲的发红的脖子上面。

“真的？”鲁巴肖夫说。“你妻子多大年纪？”

“她十七岁，”理查德说。

“真的？那末你多大？”

“十九岁，”理查德说。

“有孩子吗？”鲁巴肖夫问，脑袋伸出一点，但仍看不到那幅画的其余部分。

“第一个快要生了，”理查德说。他一动不动地坐着，好象是铅铸的一样。

停顿了一会后儿，鲁巴肖夫要他背一遍党员的名单。大约有30个名字。他问了几个问题，在荷兰公司的牙科器材定货本上记下了几个地址。他是写在从电话本上抄录的本地牙医师和著名人士之间预先

空出来的行距中。完了以后，理查德说：

“我现在想向您简短地报告一下我们的工作，同志。”

“很好，”鲁巴肖夫说。“我听着。”

理查德作了报告。他稍许向前俯着身子坐在华丽的沙发上，离鲁巴肖夫两尺远，发红的双手放在他星期天才穿的一套好衣服的膝上；他说话的时候，这个姿势一点也没有改变。他谈到烟囱上的旗帜，墙上的标语，留在工厂厕所里的小册子，象一个会计一样刻板。在他的对面，吹着小号的天使飞到了暴风雨中去，在他的脑袋后面，看不见的圣母玛丽亚伸出了纤细的双手；四面墙上都是巨大的乳房、屁股、大腿，瞪着他们。

鲁巴肖夫的脑子里想起了可以套进香槟酒杯里去的乳房。他静静地站在离牢房窗户第三块黑石板上，倾听第402号是否仍在敲墙。没有声音。鲁巴肖夫到窥视孔前，看到407号那边，那里曾有双手伸出来接过面包。他看见407号的灰色铁门，上面有个小小的黑色窥视孔。过道里仍开着电灯；惨淡而且寂静；很难相信有人住在这些铁门的里面。

叫理查德的年轻人在作报告时，鲁巴肖夫没有打断他。在大灾难以后，理查德所纠集的三十个男女之中，只剩下了十七个。有两个——一个工厂工

人和他的女朋友——在他们来抓他们时跳了楼。一个逃走了——离开了本市。不见了。两个被怀疑是警察局的探子，但没有把握。三个离开了党，抗议中央委员会的政策；其中两个成立了一个新的反对派，第三个参加了温和派。五个在昨天晚上被捕，其中有安妮。现在已经知道这五个中间已有两个不在人世了。这样就剩下十七个，继续撒传单，在墙上写标语。

理查德十分详细地报告了这些，使得鲁巴肖夫了解特别重要的一些个人关系和原因。他不知道中央委员会有自己人安插在小组里，很早以前就把大部分事实报告给鲁巴肖夫了。他也不知道这个人就是他的好朋友电影放映员，他还在放映室里睡过觉。他也不知道这个人长期以来同他昨夜被捕的妻子安妮关系亲密。这些，理查德都不知道；但是鲁巴肖夫却知道。运动已经崩溃，但是它的情报和监督部门仍在工作。这也许是唯一仍在工作的部门，当时鲁巴肖夫就是这个部门的头头。这个，穿着星期天好衣服的粗脖子的青年也不知道。他只知道安妮已被逮走了，自己仍得继续撒传单，写标语。鲁巴肖夫是党中央委员会派来的同志，象自己的父亲一样可靠可信，但是绝不能露出这个感情来，也不能显出任何弱点。因为软弱的、有感情的人是不能胜任工

作的，得推开一边，推出运动之外去，推到外面的孤独与黑暗中去。

外面过道上的脚步声临近了。鲁巴肖夫到门前，取下眼镜，贴着窥视孔向外瞧。两个系着带手枪套皮带的军官押着一个年轻农民过来，后面跟着手里拿着一串钥匙的老狱卒。农民的一只眼睛给打肿了，上唇有血迹。他走过去时用袖口擦鼻血。他的脸平板没有表情。过道那头，鲁巴肖夫视野以外的地方，有扇牢门给打开，又给关上了。接着那两个军官和狱卒回过来。

鲁巴肖夫在牢房里来回踱步。他看到自己坐在华丽的圆沙发上面，挨着理查德；他又听到了那小伙子作完报告后的寂静。理查德没有移动，双手放在膝上等着，他象一个忏悔以后等待神父宣判的人一样坐着。鲁巴肖夫很久没有作声。最后他说：

“很好。就是这些？”

那小伙子点点头。他的喉结一上一下移动。

“你的报告中有几点不清楚，”鲁巴肖夫说：“你一再谈到你们自己印制的传单和小册子。我们知道这些，其中内容受到严厉批评。有些提法是党所不能接受的。”

理查德惊吓地看着鲁巴肖夫，他的脸刷一下红了，鲁巴肖夫看到他的颧骨上的皮肤发烫，眼球上

的血丝更密了。

“另一方面，”鲁巴肖夫又说：“我们一再送印刷品给你们散发，其中有党的机关刊物的缩印版。你收到了吧？”

理查德点点头。他的脸上仍发烧。

“但是你们没有散发我们的材料；你的报告中提也没有提。相反，你们发了自己印制的材料——未经党的批准。”

“但——但是我们不得不这样做，”理查德费了很大的劲儿才说这么一句。鲁巴肖夫在夹鼻眼镜后注意地看着他。他原先没有注意到这小子患口吃。“奇怪，”他想，“这是两个星期之内遇到的第三个口吃了。咱们党内有缺陷的人真多。不是因为我们工作的条件所造成的结果——就是因为运动本身提倡选用有缺陷的人……”

“你必——必须明白，同——同志，”理查德说起来更费劲了。“你们的宣——宣传材料的调子不对，因——因为……”

“轻声说，”鲁巴肖夫突然严厉说。“别把你的脑袋转到门的那边去。”

一个高大的青年身穿当政的黑卫队制服同他的女朋友一起进来。那个姑娘是个胸脯高耸的金发女郎。他挽着她的腰，她的手搁在他的肩上。他们俩

没有看一眼鲁巴肖夫和他的同伴，站在吹小号的天使前面，背对着沙发。

“继续说下去，”鲁巴肖夫安静地低声说，机械地从口袋里掏出烟盒来。接着他想起博物馆里不准吸烟，又把烟盒放回去。那个小伙子象电震了一样瘫坐在那里，看着刚进来的两个人。“继续说下去，”鲁巴肖夫安静地说。“你从小就口吃吗？回答我，别看那边。”

“有——有的时候，”理查德费很大劲才说出来。

那一对男女沿着一排画往前走。他们在一幅很胖的女人的裸体画前停步了。画中的女人躺在一张缎子卧榻上，看着观众。那个男人低声说了几句话，大概是笑话，因为那个姑娘哧哧地笑了，眼光扫了一下坐在沙发上的两个人。他们继续往前走，到了一幅死禽和水果的静物写生画前面。

“咱——咱们应该走吗？”理查德问。

“不，”鲁巴肖夫回答。他担心他们站起来以后这小子行动会引人注目。“他们就会走的。咱们背光，他们看不清咱们。慢慢地深呼吸几次。这有帮助。”

那姑娘继续哧哧地笑着，一对情人慢慢地向出口处移动。他们过去时，都回头看鲁巴肖夫和理查德一眼。他们正要离开这间陈列室时，那姑娘指了那

张圣母的钢笔画，他们停下来观看。“我——我口吃的时候十——十分讨厌？”理查德轻声说，低头看着地下。

“你得控制自己。”鲁巴肖夫干脆地说。他不能让谈话里有任何亲密的感情流露。

“过——过一会儿就会好的，”理查德说，他的喉结上下移动。“安妮老是笑我，您——您知道。”

只要那一对还在屋子里，鲁巴肖夫无法引导谈话。穿制服的人的背把他钉死在理查德的旁边了。共同的危险克服了那小伙子的怕羞，他甚至向鲁巴肖夫挪近了一些。

“她还是喜欢我，”他继续说，声音很轻，却很激动。“我——我不知道她是怎么一回事儿。她不愿要这个孩子，但——但她又不能打掉它。也——也许她有孕，他们不会对她怎么样。您知道，我弄——弄不明白。您以为他——他们也会拷打孕妇吗？”

他抬一抬下巴，指那穿制服的年轻人。同时那个年轻人突然回过头来看理查德。他们互相看了一眼。那个穿制服的年轻人对姑娘低声说了一句什么，她也转过头来。鲁巴肖夫又去掏烟盒，不过这一次在口袋里就松手了。那姑娘说了一句什么，拉开那年轻人，慢慢地走开了，那男的有些犹疑。可



以听到那姑娘到了外面又在哧哧地笑，他们的脚步声慢慢远去。

理查德眼睛跟着他们转过去。这时鲁巴肖夫看清楚了他脑袋原来遮住的画面。他可以看到圣母的瘦削的手臂一直到肘部。手臂很细，象个小姑娘似的，没有重量地举着，向着看不见的十字架。

鲁巴肖夫看了一眼表。那小伙子往沙发边上挪了一下，离开了他一点。

“咱们必须作出结论。”鲁巴肖夫说：“如果我理解你正确的话，你说你们有意不发我们的材料是因为你们不同意里面的内容。但是我们也不同意你们的传单的内容。你要明白，同志，对此必须承担一定的后果。”

理查德把发红的眼睛对着他。然后他低下了头：“你自己也明白你们送来的材料完全是胡说八道。”他平静地说。他突然不口吃了。

“这个我什么也不知道，”鲁巴肖夫干脆地说。

“你们写得好象什么也没有发生，”理查德仍用疲倦的声音说：“他们把党打垮了，而你们仍写些我们决不屈服的获胜意志的空话——就象大战公报中的谎话一样。我们给谁看谁都会吐唾沫。这个你们自己一定都知道。”

鲁巴肖夫看了一眼这小伙子，他如今俯身向前，

手肘撑在膝上，下巴托在发红的拳头上。他干脆地答道：

“你又一次向我说了我并没有的意见。我必须要求你别再这样。”

理查德的发红的眼睛不相信地看着鲁巴肖夫。鲁巴肖夫继续说。

“党正在经历严重的考验。别的革命政党经过更困难的考验。决定性的因素是我们要有不屈不挠的意志。不论谁心软，就不应留在我们的队伍里。不论谁散布惊慌气氛，都有利于敌人。不论他的动机如何，都没有什么两样。他这态度就成了我们运动的危险，就必须予以适当的处理。”

理查德坐在那里，托着下巴，他的脸转过来。

“这样，我成了对运动的危险，”他说。“我有利于敌人。也许我是因为领了津贴才这样做的。而且安妮也……”

“在你们的小册子里，”鲁巴肖夫继续用干巴巴的语调说：“你承认自己是作者，常常有这样的话：我们遭到了失败，大祸临到党的头上，我们必须重新开始，彻底改变政策。这是失败主义。这是涣散党的战斗力。”

“我只知道，”理查德说：“我们必须向人民说真话，因为反正他们已经知道了。再对他们说假话

是可笑的。”

“上次党的代表大会上，”鲁巴肖夫继续说，“有一个决议说，党没有遭到失败，只是作了战略撤退，没有任何理由改变它原来的政策。”

“可这是胡说八道，”理查德说。

“如果你继续这样，”鲁巴肖夫说：“我觉得咱们不得不中断谈话了。”

理查德沉默了一会儿。屋子里开始暗下来，墙上天使和女人的轮廓更柔和更模糊了。

“对不起，”理查德说：“我的意思是说：党的领导错了。你说什么‘战略撤退’，可是咱们的人死了一半，剩下的人侥幸不死，都成批的投到对方怀抱中去了。你们这些人在国外起草的这些咬文嚼字的决议，这里没有人能理解……”

在逐渐加深的薄雾中，理查德的面容慢慢模糊了。他停了一下又继续说：

“我想安妮昨天晚上也作了一次‘战略撤退’。请您一定要了解，我们这里大家都生活在丛林之中……”

鲁巴肖夫等着看他还有什么要说，可是理查德没有说下去。暮色更深了。鲁巴肖夫摘下夹鼻镜在袖口擦着。

“党是永远不会错的，”鲁巴肖夫说：“你和我

可能犯错误。但党不会。同志，党不仅有你和我，还有成千上万个你和我。党是历史上革命思想的化身。历史不知有什么顾忌和犹豫。它永恒地、不犯错误地流向前面的目标。每次转折都留下它夹带的污泥和淹死的人的尸体。历史知道自己的进程。它不会犯错误。对历史没有绝对信任的人，不配留在党的队伍的。”

理查德没有说什么，双拳托着下巴，他的一动不动的脸仍朝着鲁巴肖夫。他既沉默不语，鲁巴肖夫就继续说下去：

“你不发我们的传单；你抑制了党的声音。你发了有害和虚假的传单。你写什么：‘革命运动的幸存者必须联合起来，一切反对暴政的力量必须联合起来；我们必须停止以前的内部斗争，重新开始共同作战。’这是错的。党不能同温和派联合。他们多少次背叛了运动，他们以后还会这么做，不止一次这么做。谁同他们妥协，谁就埋葬了革命。你还写什么：‘房子着火，先要灭火，如果继续为教条争吵不休，我们都要烧成灰烬。’这也是不对的。我们用水灭火，别人却用油。因此我们必须先决定什么方法才是正确方法，用水还是用油，然后才能把救火的人联合起来。你不能这样来从事政治。热情和绝望不能制定政策。党的路线十分明确，象山上的小

道。走错一步，不论左右，都会跌入深渊。空气稀薄，头晕的要走错路。”

暮霭已深，鲁巴肖夫已看不清画中的手。铃声响了两下，尖锐刺耳，再过一刻钟，博物馆就要关门了。鲁巴肖夫看了一下表，他还有一句决定性的话要说，说了就完了。理查德呆呆不动地坐在他身旁，手肘撑在膝上。

“是的，对于这话，我没有答案，”他最后说，他的声音平板而且疲乏。“你说的肯定是对的。你说的关于山路的话很好。但我只知，我们被打败了。剩下的人背叛了我们。也许，这是因为山路太寒冷。别人，他们有音乐和鲜艳的旗帜，他们都围着暖和的营火。也许他们是因为这样才胜利的。而我们却在牺牲。”

鲁巴肖夫默默地听着。他要听听这个年轻人还有什么要说，然后再宣布决定性的判决。不论理查德说什么，都改变不了这个判决，但是他还是等着。

理查德的魁梧身材在暮色中越来越看不清了。他在圆沙发上又移开了一些。他弯着肩膀，他的脸几乎掩在手中了。鲁巴肖夫挺直了身子等着。他的上颚感到有些酸痛，也许是因为那颗有病的犬牙。等了一会儿，他听见理查德说：

“我现在会遇到什么呢？”

鲁巴肖夫用舌头尖碰一下痛牙。他觉得在宣布决定性的那句话之前有必要用手指摸一摸患牙，但是压制住了自己。他安静地说：

“按照中央委员会的决定，我得通知你，你不再是我党党员了，理查德。”

理查德没有动。鲁巴肖夫又等了一会儿，然后站起来。理查德仍坐着。他只抬起了头看着他，问道：

“这就是您来的目的吗？”

“主要是，”鲁巴肖夫回答。他要走，但是仍站在理查德面前等着。

“那我怎么办呢？”理查德问道。鲁巴肖夫没有说什么。过了一会儿，理查德说：

“如今我想我不能住在我朋友的放映室里了？”

迟疑了一会儿，鲁巴肖夫说：

“最好不。”

他一说出口就对自己不满意，他不知道理查德懂不懂这句话的意思。他低头看着坐着的人：

“我们最好分别离开这里。再见。”

理查德挺一挺身子，但仍坐着。在暮色中鲁巴肖夫只能猜想这双稍稍向外鼓的发炎的眼睛中的表情；然而就是这个笨拙地坐着的人的模糊形象永远

铭刻在他的记忆之中了。

他离开了那间画廊，穿过第二间，那里也是空无一人，黑黝黝的。他的脚步在拚花地板上发出咔咔的声音。他到了外面才想起忘记去看一眼圣母画像那张画了；现在他只知知道双手合在一起的细部，还有那瘦削的手臂，一直到肘部。

在入口处的阶石上他停下了步。他的牙齿更痛了；外面很冷。他把退色的灰色羊毛围巾紧紧地围在脖子上。在画廊前面的寂静的大广场上，街灯已亮；这个时候，四周无人。一辆窄窄的电车在榆树成荫的街上叮当开过。他心里想，在这里不知能不能找到一辆出租车。

在阶石下面，理查德追了上来，气喘吁吁。鲁巴肖夫继续向前走，既不加快也不放慢步子，头也不回。理查德比他高过半个头，身体比他魁梧多了，可是他缩着肩膀，在鲁巴肖夫身旁要显得小一些，而且缩小他的步伐。走了几步，他才说：

“我问您能否再同我的朋友住在一起，您说‘最好不’，这是作为警告吗？”

鲁巴肖夫看见街上有一辆开着灯的出租车过来。他在人行道边停下来等那车子开近。理查德站在他旁边。“我再也没有话要同你说了，理查德，”鲁巴肖夫说，一边挥手叫车。

“同志，但——但是您不能告发我，同志……”理查德说。出租车慢了下来，离他们只有二十步远。理查德缩着肩站在鲁巴肖夫身旁，他拉住鲁巴肖夫的大衣袖口，正对着他的脸说话；鲁巴肖夫感到了他呼吸的热气，额角上有一阵潮湿的感觉。

“我不是党的敌人，”理查德说。“您——您不能把我喂狼，同——同志……”

出租车在道旁停下，司机肯定听到了最后一个字。鲁巴肖夫心里盘算，这时无法打发走理查德，一百码远站着——一个警察。司机是个穿皮甲克的小老头，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们。

“去车站，”鲁巴肖夫说，进了汽车。司机伸出右手把他身后的门关上。理查德站在人行道边上，手中拿着帽子，他的喉结上下迅速移动。汽车启动了，向警察开去，经过了警察身边。鲁巴肖夫不想回头看，但是他知道理查德还站在人行道边上，看着出租车后的红灯。

他们在热闹的道路上开了几分钟，司机不断回头看一眼，好象是要看清楚乘客仍在车上。鲁巴肖夫对这小城市情况不熟，不知道是否朝着车站开去。街道不怎么热闹了，在一条大道的终端有一所大建筑物，顶部有个发光的大钟，他们在车站前停了下来。



鲁巴肖夫下了车；这个城市和出租车还没有装计程器。“多少钱？”他问。

“不用付钱，”司机说。他的脸又老又皱，他从皮甲克口袋里抽出一块红色的脏布，装模作样地擤了一下鼻子。

鲁巴肖夫通过夹鼻镜注意地看他一眼。他相信自己以前没有见到过这张脸。司机把手帕放进口袋里。“象您这样乘客总是免费的，先生，”说完他就忙着要启动车了。突然他伸出手，这是一只老人的手，布满青筋，指甲发黑。“祝您好运，先生，”他说，有些不好意思地向鲁巴肖夫微笑。“要是您的年轻朋友有什么需要——我的出租站就在博物馆门前。您可以把我的号码告诉他，先生。”

鲁巴肖夫看见右边有个脚夫靠在电线杆旁站着看他们。他没有握司机伸出的手，却放了一块硬币在手心里，不说一句话，就进了车站。

他得等一个小时火车才开。他在餐厅里喝了一杯蹩脚咖啡，他的牙齿折磨着他。在车上他瞌睡过去，梦见他跑在机车的前面，理查德和司机站在机车里，他们要压死他，因为他骗了他们车钱。车辆越来越近，他的双腿动弹不得。他一身冷汗醒了过来，额上挂着汗珠。车厢里的别人有些奇怪地看着他。外面是黑夜，火车在黑暗的敌国快速行驶。

理查德的事得结束了。他的牙齿很痛。一个星期以后，他被捕了。

## 十

鲁巴肖夫把额角顶着窗户，看到院子里。他来回踱步，双腿走累了，脑袋转晕了。他看了一下表，十二点差一刻；自从想到圣母画像起，他在牢房里已连续来回走了快四个小时。他不感到奇怪；他对被囚禁时做白日梦是很熟悉的，还有白灰的墙给他带来的醉意。他记得有个年轻同志，理发师助手出身，曾经告诉他，在他第二年也是最糟糕的一年单独禁闭中，他曾连续七小时睁着眼睛做梦；在做梦时他在五步长的牢房里走了28公里，脚上起了泡也没有发现。

这一次却来得很快；第一天就出声自言自语，而按过去经验，这要在几个星期以后。另外一件奇怪的事是，他想起了过去；而牢房白日梦老手梦见的总是将来，梦见的过去总是可能的过去，而不是实际的过去。鲁巴肖夫思量着，他的脑力机器不知还给他准备了一些什么意外的东西。他根据经验知道，死亡的威胁总是会改变思想的机制，引起最意外的反应——好象把指北针移近磁极所产生的运动一样。

天空仍很阴沉，预示就要降雪；在院子里有两个人在放风。其中一个不断地抬头看鲁巴肖夫的窗口——显然他的被捕消息已经传开了。这是个瘦削的人，脸色发黄，长着兔唇，身穿一件薄雨衣，他紧紧地抓着肩部，好象很冷。另一个人年纪大一些，围着一条毯子。他们在绕着院子散步时互相没有说话；十分钟后，他们被一个带着橡皮棍和手枪的制服军官带到里面去了。那个军官等他们时所站立的大门正好对着鲁巴肖夫的窗户，在关上门之前，那个长着兔唇的人又回头看了鲁巴肖夫这边一眼。他当然看不见鲁巴肖夫。从院子里看，窗户里一定很黑，但是他的眼光逡巡了一会儿，在寻找什么。我看到了你，但不认识你；你看不到我，但显然认识我，鲁巴肖夫想。他在床上坐下，向402号敲墙：

“他们是谁？”

他以为402号可能生气了，不回答。但那军官似乎并不生气，马上回答：

“政治犯。”

鲁巴肖夫吃了一惊；他原来以为长着兔唇的瘦子是个刑事犯。

“你的那类？”他问。

“不——你的那类，”402号回答，很可能在满意地微笑。下一句话更响了，也许是用单片眼镜敲

的。

“我的邻居兔唇400号昨天受刑。”

鲁巴肖夫沉默了一会儿，在袖子上擦一擦夹鼻镜，虽然他现在只用它来敲墙。他本来想问“为什么？”但敲时却改为：

“怎样？”

402号挖苦地回答：

“蒸气浴。”

鲁巴肖夫上次被监禁时曾多次遭到拷打，但对这项刑罚，他以前只道听途说过。他知道一切已知的肉体痛苦都是可以忍受的；只要你事先知道他们用什么样的刑罚，你就可以把它当作外科手术，来忍受，比如拔牙。真正糟糕的是不知他们用什么样的刑罚，这就无法准备反应，无法估计自己的抵抗能力。最糟糕的是害怕自己到时候会说了些无法追悔的什么话或做了些无法收回的什么事情。

“为什么？”鲁巴肖夫问。

“政治分歧，”402号讽刺地回答。

鲁巴肖夫戴上夹鼻镜，伸手到口袋里摸烟盒。他只剩下两支了。然后他又敲墙：

“你的情况怎样？”

“谢谢你，很好，”402回答，谈话至此中断。

鲁巴肖夫耸耸肩，他点燃了最后第二支烟，恢

复来回踱步。奇怪的是，等待着他的事却叫他几乎感到高兴。他感到抑郁的情绪已经消失，头脑清醒一些了，神经松弛。他用水盆中的凉水洗了脸、胳膊、胸部，漱了口，用手巾擦干了自己。他吹了几声口哨，微笑起来——他总是走调，几天前还有个人对他说：“如果说第一号懂音乐，他早就会找个借口把你毙了。”

“反正他会这样做的，”他这么回答，心里并不真的相信。

他点燃了最后一支烟，有了清醒的头脑，便开始考虑如果他们带他去审问采取什么方针。他的心中充满了信心，安静而且镇定，就象学生时代准备一次特别困难的考试一样。他想起了他所知道的有关“蒸气浴”的一切细节。他想象如果处在这样的情况，肉体上会有怎么样的感觉，这样就不会感到神秘莫测了。重要的是不能让自己猝不及防。他现在知道他们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别人在那里也是这样，他知道自己不会说不想说的话。他现在只希望他们尽早开始。

他的梦境出现在他的脑海中：理查德和老司机追逐他，因为他们觉得受他欺骗，被他背叛。

我会付我的车钱的，他不自然地微笑着想。

他的最后一支烟快吸完了，烟头燃到了他的指

尖；他让它掉在地上。他想要踩灭它，但后来又止住了；他弯下腰，把它拣起来，把燃着的烟头在手背上慢慢按灭，就在两条青筋之间。他把这个过程拖了半分钟，用表上的秒针来核对。他很高兴，在这30秒钟中，他的手没有缩过一下。接着他又来回踱起步来。

在窥视孔外观察了他好几分钟的眼睛这时离开了窥视孔。

## 十一

送午饭的行列走过了过道；鲁巴肖夫的牢房又给漏掉了。他不想再到窥视孔前去探视，免得受辱，因此他不知道午饭吃什么，但是饭菜味传进了他的牢房，闻起来很香。

他很想抽一支烟。为了要集中思想，他总得弄到香烟；这比吃的还重要。他在分发食物以后又等了半小时，然后开始敲门。又过了一刻钟才见老狱卒姗姗而来。“你要干什么？”他用他一贯厌烦的口气问。

“到小卖部给我弄些烟来，”鲁巴肖夫说。

“你有监牢的代金券吗？”

“我一到就把我的钱搜走了，”鲁巴肖夫说。

“那末你得等着把钱换成代金券。”

“这在你们这个模范监狱里需要多久？”鲁巴肖夫问。

“你有意见可以提嘛，”老头子说。

“你知道我没有纸笔，”鲁巴肖夫说。

“要买文具，你得要有代金券，”狱卒说。

鲁巴肖夫感到火气上升，胸口有压迫的感觉，喉部有噎住的感觉，这都是他生气时经常感到的熟悉的感觉，但他控制住了自己。老头子看见鲁巴肖夫的瞳孔在夹鼻眼镜后闪闪发亮；这使他想起了鲁巴肖夫身穿制服的彩色肖像，从前的日子里到处可以看到。他幸灾乐祸地微笑一下，退后一步。

“你这狗屎堆，”鲁巴肖夫慢慢地说，转过身去，走向窗前。

“我要报告你骂人，”老头子的声音在他背后说，门就砰的关上了。

鲁巴肖夫在袖口上擦了擦夹鼻镜，等到自己能平心静气地呼吸了。他必须弄到香烟，否则他支持不下去。他等了十分钟，然后向402号敲墙：

“有烟吗？”

他等了一会儿才接到答复，清楚而缓慢：

“不是给你的。”

鲁巴肖夫慢慢地回到窗口。他仿佛看到留小胡子的年轻军官，戴着单片镜，呆呆地望着隔开他们

的墙，脸上挂着傻笑；镜片后面的眼睛是混浊的，眼皮发红往外翻。他的脑袋里在想什么？也许他在想，不错，我给了你一枪。但也可能是：暴民啊，我们的人你枪杀了多少？鲁巴肖夫看了一眼白灰墙，他感到对方站在墙的后面，头抬着望他；他感觉听到了对方的气喘呼吸。是啊，我枪杀了多少人？我也不知道。的确，他记不起来了，那是很久很久以前，是在内战时期，大概在70到100之间。那又有什么？这是完全对的，这个问题同理查德的是属于不同的层面，要是在今天，他还会这样做。即使他事先知道革命会把第一号拥上台？即使这样。

同你，鲁巴肖夫想，望着背后站着那个军官的白灰墙——这时他很可能点起一支烟，朝着白灰墙吐口烟——向你，我没有帐要算。对你，我不欠车钱。你和我们之间没有共同的货币，共同的语言……你现在想要什么？

这时402号又在敲了。鲁巴肖夫回到墙边……“……送烟给你。”他听到这几个字。接着他听到402号在敲门想引起狱卒的注意。

鲁巴肖夫屏住呼吸；几分钟后他听到老头子迟缓的脚步走近。狱卒没有打开402号的门，只是通过窥视孔问：

“你要干什么？”



鲁巴肖夫没有听到回答，尽管他很想听到402的声音。接着老头子用鲁巴肖夫也可听到的声音大声说：

“这是不允许的；违反狱规。”

鲁巴肖夫又不能听到回答。接着狱卒说：

“我要去报告你骂人。”他的脚步拖过了过道地板，消失了。

沉默了一会儿，402号又敲了：

“你运气不好。”

鲁巴肖夫没有回答。他来回踱步，喉咙痒痒的要想吸烟。他想到402号。“但是我还会这样做，”他对自己说。“这是必要的，也是正确的。但是我也许仍欠你车钱？干了正确和必要的事，也得付出代价吗？”

他的喉咙更加干燥了。他感到前额有一种压力；他急促地来回踱步，他在思索时，嘴唇不自觉地动着。

正确的行动也得付代价吗？除了理性以外还有别的衡量标准吗？

如果用别的衡量，正确的人会不会负债最重？他的债是不是要加倍的算，因为别人不知道他们自己干了些什么……？

鲁巴肖夫站在距窗口的第三块黑色石板上不

动。

这是什么？一瞬间宗教的疯狂？他意识到他在好几分钟里说出声来在问自己。即使在他注意的时候，他的嘴唇独立于他的意志也在动。

“我应该付出代价。”

鲁巴肖夫被捕后第一次感到惧怕了。他去摸香烟。但他已没有香烟。

接着他又听到床头墙上的轻轻的敲击声。402号有话对他说：

“兔唇向你问候。”

他的脑海中浮现了那个人向上翘的蜡黄的脸，这信息使他不安。他敲问：

“他叫什么名字？”

402号回答：

“他不肯说。但他向你问候。”

## 十二

下午的时候，鲁巴肖夫更难受了。他不时地发颤。他的牙也开始又痛了——右边犬牙连结眼神经窝。他被捕以后就没有吃过东西，但他不觉得饿。他想集中精神，但是一阵阵的寒战袭击他的全身，喉咙又感到发痒，因此无法做到。他的思想在两极之间来回：一方面是极想有一支烟抽，另一方面是

这么一句话：我要付出代价。

记忆不断向他涌现，在他的耳边嗡嗡作响。各种的脸孔和声音涌现在他眼前和耳边，接着又消失了；只要他想抓住它们，它们就刺痛他；他的整个过去是千疮百孔，一碰就痛。运动和党就是他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也属于党，同党的命运不可分离地相连；他的过去就是与它同一的。就是这个过去，如今突然有了问题。党的温暖的呼吸着的躯体，在他看来似乎尽是创伤——腐烂的创伤，流血的瘢痕。历史上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有过这么有缺陷的圣者？哪里有一个正确的事业得到过更坏的代表？如果党是历史意志的体现，那么历史本身就是有缺陷的。

鲁巴肖夫呆视着牢房墙潮湿的痕迹。他把铺上的毯子拿来围着肩膀，他加速了来回的步伐，在门前窗下突然转身，但他的脊梁骨仍一阵阵的发凉。耳边嗡嗡声继续，还杂有含糊的轻声的话语；他分不清这究竟是从过道那边传来的，还是他患了幻听。这是眼神经窝的缘故，他对自己说这是犬牙根发痛的缘故。明天就告诉医生。但在这以前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必须找到党的缺陷的根源。我们的原则都是对的，但是我们的结果却错了。这是一个有病的世纪。我们以显微镜的精确诊断了疾病和起因，但

是不论我们在什么地方应用手术刀，总是有个新伤口出现。我们的意志坚定纯真。我们应该得到人民的爱戴。但是他们却憎恨我们。我们为什么这么令人生厌？

我们为你们带来了真理，但是在我们的口中，它听起来是个谎言。我们为你们带来了自由，但是在我们的手中，它看起来象条鞭子。我们为你们带来了活着的生命，但是在我们的声音可以听到的地方，树枝枯萎，可以听到枯叶嗦嗦地响。我们为你们带来了未来的希望，但是我们的舌头口吃，只会吠叫……

他一阵哆嗦。他的脑海里出现了一幅图象，一幅在木头镜框中的大照片：参加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他们坐在一条长木桌的四周，有的手肘支着桌子，有的手掌放在膝上，他们个个都留着胡须，神情认真地凝视着照相机的镜头。每个人的头上有一个小圈，中间有个数字，同照片下面的姓名前的数字相符。个个都一本正经，只有担任主席的那个老头，他的鞑靼人的吊眼睛中有一种狡猾戏弄的眼光。鲁巴肖夫紧挨着坐在他的右旁，鼻子上夹着眼镜。第一号坐在桌子的一端，体格魁梧，方方正正。他们这些人看上去象是在开外省一个小城市的市议会，却是在准备人类历史上一场最重要的革命。他们当时是一种新型的人，好斗的哲学家。他

们熟悉欧洲各城市的监狱，就象商业推销员熟悉旅馆一样。他们梦想掌握权力，目的是废弃权力；梦想统治人民，目的是要让他们戒掉被统治的习惯。他们的一切思想都变成了行动；一切梦想都正在实现。他们如今在哪里？他们的头脑曾经改变了世界的进程，却都吃了一颗子弹。有的在前额，有的在后脖颈。他们之中只有二、三个人留了下来，分散在世界各地，精疲力尽。另外就是他自己，还有第一号。

他冻僵了，非常想抽一支烟。他又看到自己身在比时的一个港口，在脾气随和的小洛埃的护卫下。洛埃有点驼背，嘴上叼着水手吸的那种烟斗。他又闻到了海港的气味，这是一种腐烂的海藻和汽油的混合气味；他听到古老的行会大厅顶楼上的音乐般的钟声，看到有过街楼的狭窄的街道，港口妓女在窗外晒着她们洗过的衣服。那是理查德的事发生了两年之后。他们无法证明对他不利的东西。他们拷打他时，他缄口不言，他们打掉了他的牙齿，打坏了他的耳朵，打破了他的眼镜，他还是缄口不言。他一直缄口不言，始终否认他们的指控，冷静地周密地用假话来对付他们。他在牢房里来回踱步，躺在黑暗的刑罚室里的冰凉的石板地上。他曾经害怕过，一直在想方设法为自己辩护；当冷水泼在他身

上，他从昏迷中醒过来时，他想的是摸一支香烟，继续编造假话。在那些日子里，他一点也不奇怪那些拷打他的人是那样的憎恨他，也不奇怪他是那么令他们生厌。独裁政权的整个司法机器都转动起来了，但是他们无法证明他有罪。他获释以后，他们用飞机把他送回了他的国家——革命的故乡。举行了招待会，盛大的群众大会和军事检阅。甚至第一号也屡次在公众场合与他一起露面。

他不在本国已有好几年了，发现有了许多变化。照片中留胡须的人中已有一半不在人世了。他们的名字不许提到，只有在咒骂的时候才说到他们的过去——除了那个有鞑靼人吊眼睛的老人，他是以前的领袖，很早就死了。他象上帝一样受到尊敬；而第一号就象上帝的儿子。但是到处低声传说，他为了继承老人的地位而篡改了他的遗嘱。照片中留胡须的人中留下来的几个已经认不出来了。他们的胡须刮得光光的，精神萎顿，幻想破灭，悲观得看透了一切。第一号隔一阵子就在他们中间找一个对象。他们都捶胸痛哭，承认他们的罪恶。过了两个星期，鲁巴肖夫走路还需要拐杖，就要求派他一个国外的新使命。“您好象很焦急，”第一号喷了一口烟雾后看着他说。他们一起在党内担任领导已有二十年了，但相互之间仍很客气。第一号的头上挂

着老人的相片，旁边本来挂的是标出号码的相片，如今已不在那里了。谈话很短，只持续了几分钟，但在告辞时，第一号特别热烈地握了他的手。鲁巴肖夫事后对这次握手的意义想了很久，对第一号在烟雾后看他的心照不宣的奇怪神情也想了很久。鲁巴肖夫撑着拐杖出来，第一号没有送他到门边。第二天他就去了比利时。

在船上他的健康恢复了一些，他开始考虑自己的任务。小洛埃叼着水手吸的烟斗来接他。小洛埃是当地码头工人党支部的领袖。他带着鲁巴肖夫参观码头和港口里的曲折街道，神气相当自傲，好象这些都是他的创造。每家酒馆里他都有熟人，不论是码头工人，船上水手，还是妓女；到处都有人请他喝酒，他则是把烟斗举到耳边致答。甚至市场上的交通警察也向他们眨眼，外国船上下来的水手因为说的话不好懂，就轻轻地拍他的驼背。鲁巴肖夫看到这一切都觉得有些奇怪，小洛埃肯定是不遭人厌的。这个城市的码头工人支部是党在全世界的组织最好的支部。

晚上，鲁巴肖夫和小洛埃以及其他几个人坐在海港的一家酒馆里。其中有一个叫保尔的，他是支部的组织书记。他以前当过摔跤运动员，秃光瓢，大麻脸，招风耳。上衣里面穿的是一件水手穿的黑

毛衣，头上戴着一顶黑色圆顶帽。他有扭动耳朵的本领，能把帽子顶上去又让它落下来。同他一起的是个叫比尔的，以前当过水手，写了一本描写水手生活的小说，出了一年的名，以后就无声无息了。现在他为党报写文章。其他的人都是码头工人，体格魁梧，酒量很大。不断有别人进来，或者坐下，或者站着，请大家喝了一杯酒，就又走开了。酒店老板只要有空就在他们桌边坐一会儿。他能吹口琴。许多人都喝醉了。

小洛埃把鲁巴肖夫介绍为“从那边来的同志。”没有更多的解释。只有小洛埃知道他是什么人。坐在桌旁的人见到鲁巴肖夫不想多说，也就没有提什么问题，即使提的一些问题也是关于“那边”的物质条件，工资多少、土地问题、工业发展等。他们提的问题显出他们对技术细节有惊人的知识，而对于“那边”的一般情况和政治气氛都是同样惊人的无知。他们问到轻工业生产的发展，就象问到上帝赐给亚伯拉罕的乐土上的葡萄究竟有多大一样具体。有一个码头老工人站在柜台前很久一直没有要酒，后来小洛埃把他叫来请他喝一杯，他同鲁巴肖夫握了手以后说：“你很象老鲁巴肖夫。”鲁巴肖夫回答说：“时常有人这样告诉我。”老头儿一饮而尽说：“老鲁——有个人支持你。”不到一个月以前鲁巴肖夫



才获释，而他知道自己能活命下来，也不到六个星期。酒店胖老板吹起了口琴。鲁巴肖夫点燃了一支烟，为大家要了一杯酒。他们为他的健康，为“那边”的人的健康而干杯。组织书记保尔用耳朵把帽子顶起又放落。

后来鲁巴肖夫和小洛埃在一家小饭馆里又呆了一会儿。小饭馆的老板拉下百叶窗帘，把椅子倒放在桌子上，然后靠着柜台打瞌睡。这时小洛埃把他的一生经历告诉鲁巴肖夫。鲁巴肖夫并没有问他，而且马上预见到第二天的麻烦事儿。他无法阻止他们所有的同志都要把自己的一生经历告诉他。他原来是想马上走掉的，但他突然感到疲倦了——他毕竟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体力；因此他留下来听他说。

原来小洛埃不是本国人，尽管他说话象个本国人，而且认识这个地方的所有的人。实际上他生于南德的一个小镇，他学过木匠活，在革命青年俱乐部星期天郊游时弹过吉他，讲过达尔文主义。在独裁政权上台之前的几个月的动乱中，党急需武器，于是这个小镇发生了一件大胆行动：有个星期天的下午，有一辆运家具的货车从该镇最热闹地区的警察局运走了50支步枪、20支手枪、两挺轻机枪，和相应的弹药。货车上的人出示了书面的命令，上面

盖了公章，并有两个身穿制服的警察模样的人押运。后来在另一个城市搜查一个党员的车库时发现了这批武器。这起事件从来没有查清楚过，事件发生后一天，小洛埃从镇上失踪了。党原来答应给他一份护照和身份证件，但这个安排没有实现。那就是说，上面派来的交通员没有带来外出的护照和钱，在预定的时间在预定的地点出现。

“我们总是遇到这样情况，”小洛埃达观地说。鲁巴肖夫没有作声。

尽管如此，小洛埃还是走成了，终于越过了边界。由于有逮捕他的通缉令，他的驼背照片贴在每个警察局里，使他在全国到处流浪了好几个月。当初他去见上面派来的同志时，身边只有能维持三天生活的钱。“我以前总以为只有在书本里才有人啃树皮，”他说。“梧桐树的嫩枝最好吃。”这个记忆使他从柜台那边端来了几支香肠。鲁巴肖夫想起了监狱里的稀汤和绝食，就同他一起吃了起来。

最后，小洛埃偷越过了法国边界。因为他没有护照，给关了几天，便给放了，叫他到别的国家去。“倒不如叫我去攀登月亮，”他说。他寻找党帮助，但这个国家里的党不认识他，告诉他他们先得到他国家去调查。他于是继续流浪，几天后又被捕，判了三个月的监禁。他在服刑期间向狱中同室的牢

友，一个流浪汉，宣讲了一通上次党代表大会上的决议。作为回报，那人告诉了他逮猫剥皮出售的谋生计的诀窍。三个月满后，他被带到比利时边界上的一个树林里。宪兵给了他面包、乳酪和一盒法国香烟。“一直走，”他们说：“半小时之内你就在比利时境内了。要是下次再逮到你，就砍你的脑袋。”

小洛埃在比利时流浪了几个星期。他又找党帮助，但答复同在法国得到的一样。他啃够了树皮，便开始做猫皮生意。逮猫很容易，如果猫龄不大，又无疥疮，那么一张猫皮的价值就可以买半个面包和一袋烟丝。不过在逮到猫和卖出猫皮之间还得干一件不十分愉快的活。要是能够把猫的两只耳朵一手抓住，另外一只手抓住它的尾巴，重重地把猫背摔在你的膝上，这样做最快。但开头几次，叫人恶心想吐。后来就习惯了。不幸的是，小洛埃几星期以后又被捕了，因为在比利时，你也得要身份证。接着又是被逐出境，释放，第二次被捕，蹲监牢。后来有一个夜里，比利时的两个宪兵来把他押到法国边境附近的一个树林里。他们给了他面包，乳酪和一盒比利时香烟。“一直走，”他们说：“半小时以后就到了法国境内。如果你再落在我们手中，小心你的脑袋。”

在下一年里，小洛埃在法国当局和比利时当局

的唆使下来回潜越边境三次，对他那样的人，这种把戏大概已玩了好几百年了。他一再向党求援，因为他主要担心从此与运动断了联系。党却告诉他，“我们没有从你的组织那里把你的关系转过来的通知。我们必须等待查询的结果。如果你是党员，请你遵守党的纪律。”在这期间，小洛埃继续做他的猫皮生意，让他们把他在边界上推来推去。而在这时候，他的本国也出现了独裁政权。再过一年，小洛埃流浪得累了，开始吐血，梦见猫。他患了幻觉，什么东西都有猫腥气，他的食物、烟斗，甚至有时给他一个过夜地方的好心的老妓，都有猫腥气。“我们的查询还没有回音。”党答复说。再过一年，能够对小洛埃身分提供所需情况的所有同志，不是被暗杀，就是被捕了，或者失踪了。“对不起，我们无能为力。”党说。“你当初就不应该没有带身分证就出来。也许你是未经党的许可而擅自出来的。我们怎么知道？有许多间谍和密探都想混到我们队伍中来。党必须提高警惕。”

“你把这些告诉我干什么？”鲁巴肖夫问，他后悔不该留下不走。

小洛埃从啤酒桶那里取回一杯啤酒，用烟斗敬礼。“因为这有教育意义，”他说：“因为这是一个典型例子。我还可以告诉你成百上千个例子。党越来

越象一块化石了。它的每一条肢体都患血管硬化，青筋暴突了。不能这样来进行革命。”

我可以告诉你更多这样的例子，鲁巴肖夫想，但没有说。

不过，小洛埃的故事有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愉快结果。他有一次蹲监牢，同前摔跤选手保尔关在一起。保尔当时是码头工人，他被关监牢是因为有一次罢工发生骚乱时，他记起了以前的职业，对一个警察施了叫做“双料纳尔逊”的一招，从对方身后把胳膊从他腋下伸到前面去，再举手在他颈后合抱，把他脑袋往下扣，直至颈椎断裂。在竞技场上，这一招常常为他赢得阵阵掌声，但是他很遗憾地获悉，在阶级斗争中不能这样干。小洛埃和前摔跤选手成了好朋友。原来保尔是码头工人党支部组织委员。他们出狱以后，他就为小洛埃弄到了证件和工作，让他重新入党。因此小洛埃又能向码头工人讲达尔文主义和最近一次党代表大会了，好象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他很快活，忘掉了猫和自己对党的官僚分子的不满。半年后，他成了当地支部的政治书记，一切万事大吉。

鲁巴肖夫的心尽管老了，而且疲倦了，还是用他的全心希望，一切万事大吉。但是他心里很明白，把他派到这里来的任务是什么。他只有一种革命美

德没有学会，那就是自欺欺人的美德。他在眼镜后面静静地观察小洛埃。小洛埃不懂这种眼光的意义，有些不好意思起来，微笑地举起烟斗敬礼，使鲁巴肖夫想起那些猫。他吃了惊，觉得自己的神经不对头，也许他喝多了，因为他不能去除这样的想法：他要做的就是一手抓住小洛埃的耳朵，一手抓住他的腿，把他在自己的膝上重重地摔断他的脊梁骨，不管他是不是驼背。他感到不舒服，站起来要走。小洛埃送他回去；他以为鲁巴肖夫一时情绪消沉，就很有礼貌，保持沉默。一个星期以后，小洛埃上吊自尽。

在那天晚上和小洛埃自杀之间，党小组开了几次平淡的会。事实很简单。

两年前，党号召全世界工人联合起来，用政治和经济抵制手段，同欧洲心脏新建立的独裁政权作斗争。凡是敌国的货物一概不买，它的军备工业产品一律不允许过境。党的各个支部都热情地执行了这项命令。这个小港的码头工人拒绝装卸该国货物，其他工会也参加了他们的斗争。但罢工很难进行彻底，同警察的冲突造成许多伤亡。斗争的结果还没有分晓的时候，就有一队五艘老式黑货船开进港口，每艘都有一位伟大的革命领袖的名字漆在上面，

用的是“那边”的奇怪的字母，船桅上悬挂着革命的旗帜，罢工工人热烈欢迎，他们开始马上卸货。几小时以后他们才弄清楚，所卸货物是些原料，运往被抵制的国家供军事工业用的。

码头支部马上召开委员会会议，意见分歧，闹得不可开交。这个争端在运动内部蔓延到了全国。反动报纸极尽讽刺揶揄之能事。警察不再试图破坏罢工了，他们宣布中立，让码头工人自己决定为这支奇怪的黑色船队卸货还是不卸货。党的领导宣布停止罢工，下令为这些货船卸货。他们对革命国家的行为提出了合理的解释和狡猾的辩解。但很少人相信。支部分裂了，老党员纷纷脱党。好几个个月来党名存实亡，但慢慢地，随着国内劳资关系日趋紧张，它又恢复了精神和实力。

两年过去了。在南欧又有一个饥饿的独裁政权在非洲进行了一场掠夺和征服的战争。党又号召对它进行抵制。他们得到了甚至比上次更加热烈的响应。因为这一次，全世界所有国家的政府都决定切断侵略国的原料供应来源。

没有原料，特别是没有汽油，侵略就要失败。就在这个时候，那支奇怪的黑色小船队又出现了。最大的一艘的船名用的是一个因反对战争而被暗杀的人的名字；船桅上飘扬着革命的旗帜，船舱里载着的

是运给侵略者的石油。它们离这港口只有一天的航程了，而小洛埃和他的朋友们还一点也不知道它们的临近。鲁巴肖夫的任务就是让他们有思想准备。

第一天他什么也没有说，只是试探了一下情况。第二天上午，在党支部的会议室里开始了讨论。

会议室很大很空，乱七八糟的，就象世界各地党的机关一样。这一半是因为穷，但主要是因为节约的传统。墙上挂着过去的竞选招贴，政治口号，打字的布告。一个角落里有一台肮脏的油印机，另外一个角落放着一堆旧衣服，是准备送给罢工工人的家属的，旁边是一堆发黄的传单和小册子。会议桌是用两块木板放在一只腿架上拼成的。窗户上有油漆的痕迹，就象未完成的房屋一样。桌子上空是一只没有灯罩的光秃秃的电灯泡从屋顶上挂下来，旁边有一张黏苍蝇的纸。桌子四周围坐着小洛埃、前摔交选手保尔、作家比尔和其他三个人。

鲁巴肖夫先发言。周围的环境他很熟悉的。这种环境的传统丑陋使他感到在家里一样自在。在这样的环境下，他又充分地相信他的使命的必要性和有用性，而不能理解为什么头一天晚上在那家喧闹的酒店里他竟会有不安的感觉。他客观地作了解释，而且不是没有热情地说明了事情的真实情况，但还没有提到他此次来的真正目的。全世界抵制侵



略者的运动失败了，这是因为欧洲国家的虚伪和贪婪。它们有的还在表面上装作坚持抵制的样子，有的连样子也不装。侵略者需要汽油。在过去，革命的国家满足了这一需要的大部分。如果它现在马上中断供应，其他国家就会贪婪地填补空缺：的确是，它们正好求之不得，要把革命国家挤出世界市场。那种浪漫的姿态只会妨害“那边”的工业发展，从而妨害世界革命。因此后果是很清楚的。

保尔和三个码头工人点着头。他们脑筋慢，从“那边”来的同志对他们说什么他们都相信；这不过是一场理论探讨，对他们没有眼前的实际意义。他们没有看到他说这番话的目的；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想到那快要驶到他们港口的黑色船队。只有小洛埃和歪脸作家很快交换了一下眼色。鲁巴肖夫注意到了。他讲到最后时，口气更加干巴巴了，一点也没有热情：

“这就是我要告诉你们的原则上的话。希望你们执行中央的决定，把事情的前因后果向政治上不怎么成熟的同志解释清楚，如果他们有什么疑问的话。眼下，我没有别的要说了。”

沉默了一分钟。鲁巴肖夫摘下夹鼻眼镜，点了一支烟。小洛埃语气随便地说：

“我们感谢发言者。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人有问题。过了一会儿，三个码头工人中间有一个笨拙地说：

“我们没有说的。‘那边’的同志一定知道该怎么办。我们当然会继续抵制。您可以相信我们。在我们这港口，没有东西会运给那个王八蛋。”

他的两个同伴点点头。摔交选手保尔证实：“这里决不会，”脸上还作了个凶狠的鬼脸，摇了一摇他那会摆动的耳朵。

鲁巴肖夫还以为自己遇到了一个反对派；他只是后来才慢慢地意识到他们真的是没有领会他的意思。他看一眼小洛埃，希望他会帮助澄清误会。但是小洛埃低垂着双眼，一声不吭。突然，那个作家神经质地发言道：

“这次你们不能另外选个港口作这笔交易吗？每次非得我们吗？”

几个码头工人惊奇地看着他：他们不明白他说的“交易”是什么意思。他们也不知道那黑色的小船队穿过浓雾向他们驶近。但是鲁巴肖夫是预料到会  
有这个问题的。

“这在政治上和地理上都是适当的，”他说：“货物将从这里取道陆路运去。当然我们并没有理由要保密，但是为了避免反动派报纸利用，我们还是谨慎为好。”

作家又与小洛埃交换了一下眼色，几个码头工人则很不理解地望着鲁巴肖夫；可以看出来他们的脑袋里已经在开始转动了。突然，保尔改变了口气，粗声粗气地问：“你究竟是在说什么呀？”

他们都看着他。他的脖子涨得发红，他的鼓出的眼睛则望着鲁巴肖夫。小洛埃克制地说：

“你才知道？”

鲁巴肖夫逐个地看了他们一眼，然后安静地说：

“我刚才没有把详细情况告诉你们。对外贸易人民委员会的五艘货轮如果气候许可明天早上可望到达。”

即使是现在，他们也需要经过好几分钟才弄明白。没有人吭声。他们都看着鲁巴肖夫。然后保尔慢慢地站起来，把帽子扔在地下，就出去了。他的两个同伴回头看他。没有人说话。接着小洛埃清一清喉咙说：

“发言的这位同志刚才把这件事的因果向我们作了解释：如果他们不交货，别人也会交货。还有谁要发言吗？”

已经说过话的那个码头工人挪了一挪屁股说：

“这个调子我们听得多了。在罢工时总是有人说：如果我们不复工，别人就会把工作抢走。我们已经听够了。工贼就是这样说话的。”

又是一阵沉默。可以听到外面的门被保尔撞上的声音。于是鲁巴肖夫说：

“同志们，我们‘那边’的工业发展的利益高于一切。感情用事帮不了我们大忙。好好想一想吧。”

那个码头工人鼓着下巴道：

“我们已经想过了。我们已经听够了。你们‘那边’的人一定要做出榜样来。全世界都望着你们。你们嘴上说什么团结、牺牲、纪律，但是你们的船队却在干破坏抵抗的勾当。”

一听到这话，小洛埃突然抬起了头，他的脸色苍白；他用烟斗向鲁巴肖夫敬个礼，然后飞快地低声说：

“这位同志说的也是我的意见。别人还有要说的吗？没有的话，会议到此结束。”

鲁巴肖夫拄着拐杖出了会议室。事情按照预定的不可避免的进展发展。老式的小船队进港时，鲁巴肖夫和“那边”的有关当局交换了几次电报。三天以后，码头支部的几个领导人都被开除出党，小洛埃在党报上被揭发是“奸细”。再过三天，小洛埃上吊自尽。

### 十三

夜里更是难受。鲁巴肖夫到了天明才入睡。他

隔一阵子就打寒战，牙痛得要命。他有这样的一种感觉：脑袋里所有联接神经的地方都发了炎；但是他还是躺在那里，痛苦地想象着画面和声音。他想到星期天才穿黑色衣服的年轻的理查德，他的发红的眼睛：“同志，你不能把我喂狼……”。他想到矮小畸形的小洛埃：“还有谁想发言？”事实上有许多人想发言。因为运动是不讲情面和顾忌的；它毫不在乎地朝着目标前进，把淹死者的尸体冲到航道的拐弯处。它的航道有许多转折和拐弯，这是它存在的规律。不能跟上它的曲折航道的人就被冲刷上岸，因为这就是它的规律。个人的动机，在它看来并没有关系。他的良心，在它看来也没有关系。它也不关心他的脑袋里和内心里是怎样想的。党只知道一个罪恶：那就是背离它规定的航道；只知道一个惩罚：那就是死亡。在运动里，死亡并不是一件神秘的事；它并没有什么高尚的地方；它是政治分歧的合乎逻辑的解决。

到了清晨的时候，精疲力尽的鲁巴肖夫才在床上睡着了。他马上又被预告新的一天来临的军号吹醒。不久就由那个老狱卒和两个穿制服的官员带去看医生。

鲁巴肖夫原来想在经过的时候看到兔唇和402号牢门上的名片，可是他被带走另一个方向。他右

边的牢房空着。这是过道那一头最后几个牢房之一。这些单独禁闭的牢房有一扇厚厚的水泥门与其他部分隔开，这时老狱卒正在笨手笨脚地打开那扇水泥门。他们如今走进了一条长过道，鲁巴肖夫和老狱卒走在前面，两个穿制服的人走在后面。这里的牢房门上都有好几个人的名字；他听到牢房里传出来说话，笑，甚至唱歌的声音；鲁巴肖夫马上知道他们走在关小刑事犯的部分。他们经过理发室；门开着，一个长着老犯人的警惕的脸的犯人在刮胡子；两个农民在剃头；这三个人都转过脸来好奇地看着鲁巴肖夫和他的护卫人员经过。最后他们走到有红十字记号的门前。狱卒恭敬地敲敲门，他和鲁巴肖夫两人进去，两个穿制服的等在门外。

诊所很小，空气混浊，有股酒精和烟草气味。一只桶和两只盆里丢满了棉花球和绷带。医生坐在桌边，背对着他们，一边在看报，一边在啃面包。报纸放在一堆器械：钳子、针管的上面。狱卒关上门时，医生慢慢地转过身来。他秃头，脑袋特别小，后脑勺只留下一些稀疏的白毛，使鲁巴肖夫想起了鸵鸟。

“他说牙痛，”老狱卒说。

“牙痛？”医生说，眼光并不看鲁巴肖夫。“张开嘴，快些。”

鲁巴肖夫透过眼镜冷冷地看着他。

“我请你注意，”他平静地说，“我是政治犯，有权得到正确的待遇。”

医生转过头问狱卒：

“这家伙是谁？”

狱卒说了鲁巴肖夫的名字。鲁巴肖夫觉得鸵鸟的圆眼睛在看他。过了一会儿，医生说：

“你的脸颊肿了。张开嘴。”

鲁巴肖夫的牙齿这时并不痛，他张开了嘴。

“你的上颚左侧一颗牙也不剩了，”医生说，用手指在鲁巴肖夫口中摸着。突然鲁巴肖夫脸色苍白地靠到了墙上。

“就在这里！”医生说。“右犬牙的牙根断了，仍留在牙床里。”

鲁巴肖夫深呼吸几次。痛从上颚传到了眼睛，直达后脑勺。他可以感觉到一阵阵血液的流过。医生又坐了下来，铺开报纸。“要是你愿意，我可以把你的牙根拔掉，”他说，又咬了一大口面包。“当然，我们这里没有麻药。手术需要半小时到一小时的时间。”

鲁巴肖夫是在迷雾中听到医生的声音的。他靠在墙上深深地呼吸。“谢谢你，”他说：“现在不拔。”他想到兔唇和蒸气浴，想到昨天在手背上揷灭烟头

的滑稽姿态。一切都不会顺利，他想。

他回到牢房后，就躺在铺上，马上睡着了。

中午时分送汤来时，他不再给漏掉了。从此以后，他按时得到了应有的一份。牙痛减轻了，减到在可以忍受的程度之内。鲁巴肖夫希望牙根脓肿已自己破了口。

三天以后，他第一次给带去提审。

#### 十四

他们来带他的时候是上午十一点。从狱卒的严肃神情中，鲁巴肖夫马上猜到了他们到哪儿去。他跟在狱卒后面，沉着镇静，这是他在遇到危险时的本色，也是意想不到的神赐的天赋。

他们走的是三天前去见医生的同一个方向。水泥板的门开了又关上。鲁巴肖夫心里想，真奇怪，一个人适应周围环境有多快，他仿佛呼吸这过道里的空气已有多多年了，仿佛他所呆过的所有监狱的陈腐空气都郁积在这里。

他们经过理发室。诊所的门关着。外面站着三个犯人，由一个睡眠惺忪的狱卒看守着。

诊所再过去，是鲁巴肖夫没有到过的地方。他们经过一个通向下面深处的旋转扶梯。下面是什



么？储藏室？惩罚室？鲁巴肖夫带着专家的兴趣猜。他不喜欢那扶梯的样子。

他们走过一个没有窗户的狭长院子，里面很黑，但上面是高高的天空。院子一边的过道光线较亮，门不再是水泥的，而是油漆过的木板门，有铜把手；忙碌的官员进进出出。有一扇门里还开着无线电收音机。另一扇门后有打字机的声音。他们已到了监狱的管理部门。

他们到过道的最后一扇门前停下。狱卒敲了门。里面有人在打电话；轻声地说了一句“请等一下。”然后又继续对着话筒说，“是啊……很好。”这声音鲁巴肖夫听来觉得很熟，但想不起是谁来。这是一个很悦耳的男性声音，有些粗哑。他以前肯定在什么地方听到过。“进来，”那声音说。狱卒开了门，在鲁巴肖夫进去以后又把门马上关上了。鲁巴肖夫看到了一张办公桌，桌子后面坐着的是他大学时代的老同学，前营长伊凡诺夫。伊凡诺夫把听筒放回到电话机上时正微笑着看着他。“咱们又见面了。”伊凡诺夫说。

鲁巴肖夫仍站在门前。“真是想不到，”他挖苦地说。

“请坐，”伊凡诺夫客气地挥一挥手。他已站了起来，比鲁巴肖夫高出半个脑袋。他微笑地看着他。

他们两人都坐了下来——伊凡诺夫坐在办公桌后，鲁巴肖夫坐在桌前。他们互相看了一会儿，毫不掩饰各自的好奇——伊凡诺夫的笑容几乎是和蔼的，鲁巴肖夫则是带着期望与警惕。他的眼光转到了桌子底下伊凡诺夫的右腿。

“哦，没事，”伊凡诺夫说。“假腿有自动关节，涂了不锈的铬。我能游泳、骑马、开车、跳舞。抽烟吗？”

他递给鲁巴肖夫一只木制的烟盒。

鲁巴肖夫看着香烟，想起了伊凡诺夫锯掉腿后他第一次到军医院去看他时的情景。伊凡诺夫要他给他弄些巴比妥，整个下午的谈话内容就是他想证明人人都有权利自杀。鲁巴肖夫最后要求给他考虑的时间，那天晚上他就被调到了战线的另一部分去了。多年后他才再见到伊凡诺夫。他看着木盒里的香烟。它们是手制的，用一种淡黄色的松松的美国烟草。

“这是非正式的开场白，还是对抗已经开始？”鲁巴肖夫问。“如果是后者，我不想抽。你知道规矩。”

“胡说八道，”伊凡诺夫说。

“那么好吧，就算是胡说八道，”鲁巴肖夫说，一边点燃了伊凡诺夫给他的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

白，但不愿露出他享受的乐趣。“你的肩周炎怎样了？”

“没事，谢谢你。”伊凡诺夫说，“你的烧伤呢？”

他微笑着指一指鲁巴肖夫的左手。在手背上，在青筋之间，三天以前他揷灭烟头的地方，有一块铜板大小的肿疱。两人都看着鲁巴肖夫放在膝上的手。他怎么知道的？鲁巴肖夫想。他有人在监视我。鲁巴肖夫感到的羞耻甚于愤怒。他吸了最后一口烟，把烟头扔了。“就我来说，非正式部分结束了。”

伊凡诺夫喷着烟圈，一边仍带着和蔼的揷揷的笑容看着他：“别挑衅。”

“退一步说，”鲁巴肖夫说：“是我逮捕了你，还是你的人逮捕了我？”

“我们逮捕了你，”伊凡诺夫说。他揷灭了烟头，又点了一支，把烟盒推给鲁巴肖夫，鲁巴肖夫不理。“你真倒霉，”伊凡诺夫说。“还记得巴比妥的事吗？”他俯过身来，把烟吐向鲁巴肖夫的脸。

“我不要你给枪毙掉，”他慢慢地说，靠回到椅背上。“你真倒霉，”他又说，微笑着。

“你的心肠真好，”鲁巴肖夫说：“为什么你们的人要枪毙我？”

伊凡诺夫等了一会儿。他吸了一口烟，在吸墨水纸上画着人像。他似乎在想适当的答复。

“你听着，鲁巴肖夫，”他终于说：“有一点我想向你指出。你一再说‘你们’，指的是党和国家，作为‘我’——你尼古拉斯·萨尔曼诺维奇·鲁巴肖夫的对立面。对于公众来说，当然需要一场审判和合法的理由。对于我们来说，我刚才指出的一点就够了。”

鲁巴肖夫把这话想了一想；他有些吃惊。这好象是伊凡诺夫调了一下琴弦，他的思想就有了反应。在过去四十年里，他所相信的，他所为之战斗的，他所宣传的，象一阵不可阻挡的浪潮，在他的心中翻卷而过。个人算不得什么，党才是一切，树枝若从主干上折断，必然枯萎而死……鲁巴肖夫在袖口上擦了一擦夹鼻眼镜。伊凡诺夫靠在椅背上抽着烟；他不再微笑了。鲁巴肖夫从眼角中突然看到墙上有一块方形的地方比别的地方的墙纸颜色浅一些。他马上知道那地方挂过标有号码的一些留胡须的人的相片——伊凡诺夫眼光跟着他的眼光，脸上表情不变。

“你的论点有点不符合时代了，”鲁巴肖夫说。“你刚才说的不错，我们总习惯用多数的‘我们’，尽可能避免用第一人称单数。我已没有这种正式讲话的习惯；而你仍坚持。可是你今天说的‘我们’是代表谁的名义呢？这需要重新下定义。问题就在这

里。”

“完全是我个人的意见，”伊凡诺夫说：“我很高兴我们这么快就达到了问题的核心。换句话说：你相信‘我们’——那就是说党、国家、和它们后面的群众——已不再代表革命的利益。”

“我想最好把群众排除在外，”鲁巴肖夫说。

“你从什么时候起这么蔑视群众？”伊凡诺夫问。“这同改用第一人称单数的语法变化有关系吗？”

他带着嘲弄的宽容态度向前俯过身来。他的脑袋如今挡住了墙上那块颜色浅的地方，突然，鲁巴肖夫想起了在画廊里的场面，理查德的脑袋挡在他和圣母画像中的合抱的双手之间。与此同时，一阵剧痛从他上颚穿刺到了他的前额和耳部。他闭上了眼睛。“现在我得付出代价，”他想。顷刻之间，他不知道是不是大声说了出来。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伊凡诺夫的声音问。这声音距他耳边很近，带着嘲弄的意思，还有点儿奇怪。

痛消退了；他的心中一片平静。“把群众排除在外，”他重复说，“你们对他们一点也不了解。我大概也不了解了。以前，当伟大的‘我们’还存在的时候，我们了解他们，而以前从来没有人了解他们。我们打进了他们的心坎，我们是用历史本身的无形

材料工作的……”

他不知不觉地从伊凡诺夫仍放在桌上的打开的烟盒中取了一支烟。伊凡诺夫向前俯过身来为他点燃。

“那时，”鲁巴肖夫说：“我们叫无产者政党。别人知道什么历史？消失的涟漪，旋涡，浪花。他们对表面的形状的变化不理解，无法加以解释。但是我们钻到了深处，进到了无形无名的群众中间，他们始终构成历史的实质。我们第一个发现历史的运动规律。我们发现了惰性规律，它的分子结构的缓慢变化的规律，它的突然爆发的规律。这就是我们的主义的伟大之处。雅各宾派是道德派，我们是经验派。我们挖进历史的原始淤泥，找到了它的规律。我们知道了以前人们所不知道的关于人类的真相；我们的革命因此成功。现在你们又要把它埋葬掉……”

伊凡诺夫向后靠在椅背上，双腿伸展，一边听着，一边在吸墨水纸上画人物。

“继续说吧，”他说：“我很想知道你要说明什么。”

鲁巴肖夫津津有味地吸着烟。他感觉到尼古丁在断烟很久以后使他感到有些头晕。

“你瞧，我自己也不知道说到这里去了，”他说，

抬头微笑，看着墙上原来挂老卫兵们照片的地方。这次伊凡诺夫没有跟着他的眼光。“好吧，”鲁巴肖夫说，“再来一次也无妨。什么都埋葬掉了；人，他们的智慧，他们的希望。你们扼杀了‘我们’，你们毁掉了‘我们’。你们真的认为群众仍支持你们？欧洲的其他篡权者象你们一样自以为是……”

他又取了一支烟，这次是自己点燃的，伊凡诺夫没有动。

“请原谅我讲空话，”他继续说：“但是你们以为人民仍支持你们吗？他们容忍了你们，一声不吭，无可奈何，就象他们在其他国家容忍别人一样，但是在他们内心深处，他们没有反应。群众再一次又聋又哑，这是历史的伟大的沉默的 X，象大海对飘浮在海面上的船一样不闻不问。所有路过的灯光都反映在海面上，但下面是漆黑和沉默。很久以前，我们搅动了深处，但如今这已过去了。换句话说，”——他停下来，戴上夹鼻眼镜——“在那时候，我们制造了历史；但是如今，你们制造了政治。这就是全部的不同。”

伊凡诺夫靠在椅背上坐着，嘴里吐着烟圈。“对不起，不过这不同我有点不清楚，如果你愿意，请解释一下。”

“当然愿意，”鲁巴肖夫说。“有位数学家曾经说

过，代数是懒人的科学，你并不是把 X 算出来，而是用 X 来运算，好象你知道它代表什么。在‘我们’这个问题上，X 代表无名的群众，人民。政治意味着用这 X 来运算，而不问它实际的内涵。制造历史，则是承认 X 在方程式中代表什么。”

“真漂亮，”伊凡诺夫说：“但遗憾的是太抽象。回到比较实际的问题：因此你认为‘我们’——即党和国家——不再代表革命的利益，群众的利益，或者人类的进步？”

“这次你理解了，”鲁巴肖夫微笑道。伊凡诺夫没有以微笑作答。

“你什么时候得出这个见解的？”

“是逐步得出的：在过去几年中，”鲁巴肖夫答。

“你能更确切地告诉我吗？一年？两年？三年？”

“这是个傻问题，”鲁巴肖夫说：“你什么年纪才长大成人的？17岁？18岁半？19岁？”

“是你自己在装傻，”伊凡诺夫说：“一个人的精神成长中每一步都是一定经验的结果。如果你真正要知道：我是17岁成人的，那是我第一次被送去流放的时候。”

“那时你是个相当正派的人，”鲁巴肖夫说：“算了吧，”他又在看墙纸发淡的那块地方，丢了烟头。



“我重复我的问题，”伊凡诺夫说，稍许向前俯着身子。“你属于有组织的反对派有多久了？”

这时电话铃响了。伊凡诺夫拿起话筒说：“我现在很忙，”又挂断了。他靠回到椅背上，双腿伸直，等待鲁巴肖夫的答复。

“你同我一样明白，”鲁巴肖夫说：“我从来没有参加过有组织的反对派。”

“听你的便，”伊凡诺夫说：“你把我放到了不得不扮演官僚分子的角色痛苦地位。”他伸出一只手到抽屉里，取出一摞档案。

“让我们从1933年开始，”他说，把文件在面前摊开。“在革命最有成功希望的国家里出现了独裁政权，摧毁了党。你被秘密派到那里，任务是对党员队伍进行一次清洗和改组……”。

鲁巴肖夫向后一靠，听着自己的经历。他想到理查德，想到博物馆前马路上的黄昏，他在那里停下来叫出租车……

“……三个月后，你被捕了。两年监禁。表现良好，无法证明对你有不利的证据。释放和胜利归来……。”

伊凡诺夫停顿了一下，很快看他一眼，又继续下去：

“你回来以后受到热烈的欢迎。我们当时没有见

面，你大概太忙了……我并不在乎。毕竟，我们不能要求你去找每一个老朋友。但是我在大会上见了你两次，坐在主席台上。你仍拄着拐棍，看上去十分疲劳。合乎逻辑的事情是送你到疗养院去休息几个月，然后担任政府职位——在国外服务四年之后。但是过了两星期，你却申请再次出国服务……”

他突然俯身向前，脸挨近了一些。

“为什么？”他问道，他的嗓门第一次尖锐了。大概是，“你在这里不自在？在你离国的时候，这里发生了一些变化，显然你并不赞成。”

他等待鲁巴肖夫开口说些什么；但是鲁巴肖夫安静地坐在椅子上，用袖口擦着夹鼻眼镜，没有回答。

“那是第一批反对派被判刑处决以后。他们中间有你的亲密战友。全国人民知道反对派堕落到什么程度以后，全都感到愤慨。你却什么也不说。两个星期以后，你出了国，尽管你不拄拐棍走不了路……。”

鲁巴肖夫觉得他又闻到了那个小港的码头气味，一种海草和汽油的混合气味：摔交选手保尔在扭动他的耳朵；小洛埃用烟斗行礼……他在他住的小阁楼里悬梁自尽了。那所破败的老房子在电车每次开过的时候都会震摇；他们告诉鲁巴肖夫，发现小洛

埃尸体的那个早上，他的身躯绕着自己的轴心在转，他们以为他还在动……

“使命胜利结束后，你被派担任我驻B国的贸易代表团团长。这次你又无可指摘地完成了任务。与B国新签的商业条约肯定是个成功。在表面上，你的表现仍是完美无缺的。但你接过这个职务六个月后，你的两个最紧密的合作者，其中一个是你的秘书阿洛娃，因为参与反对派的阴谋的嫌疑，必须召回来。经过调查，怀疑被证实。等着你公开谴责他们，但是你却保持沉默……”

“再过六个月，你自己也被召回了。第二次审判反对派的准备工作正在进步。审讯时你的名字屡次出现；阿洛娃为自己开脱提到了你。在这样情况下，保持沉默就是承认有罪。这个道理你明白，但是你拒绝公开声明，一直到党向你发出最后警告。只有到了那时，到你自己脑袋不保的时候，你才愿意表示忠诚，这就结果了阿洛娃。她的下场你是知道的……”

鲁巴肖夫沉默不语，他感到牙痛又开始了。他知道她的下场。也知道理查德的下场。也知道小洛埃的下场。也知道自己的下场。他看着墙上发淡的地方，标有号码的人们所留下的唯一痕迹。他们的下场，他也是知道的。历史终于有了一次机会，终

于答应人类有一个比较尊严的生活方式，现在这个机会已经完蛋了。再谈论，再装腔，又有什么意思呢？如果人的身上有什么东西可以经受毁坏而仍存在下来的话，那么阿洛娃就躺在虚无之中，她的大眼睛仍凝视着鲁巴肖夫同志，他是她的偶像，却把她送了死……鲁巴肖夫的牙齿越来越痛了。

“要我念一下你当时发表的公开声明吗？”伊凡诺夫问。

“不用了，谢谢你，”鲁巴肖夫说，发觉自己的嗓子有些哑了。

“你总还记得，你的声明，也可叫口供，结束时严厉地谴责了反对派，而且宣称无条件拥护党的政策和第一号本人。”

“别说了。”鲁巴肖夫平板地说：“你很清楚这种声明是怎样做出来的。如果你不知，那对你更好。看在老天爷份上，别演这出滑稽戏了。”

“我们快结束了，”伊凡诺夫说：“我们离现在只差两年了。在这两年里，你是国家铝专卖局的局长。一年前，在第三次审判反对派时，主犯在有些不怎么清楚的情况下连续提到你的名字，没有具体证据，但党内对你的怀疑增加了。你又作了一次公开声明，重新表示效忠于领导的政策。用更尖锐的话谴责反对派的罪行……这是六个月以前。今天你承认

多年来你一直认为领导的政策是错误有害的……。”

他停了下来，舒服地向背后一靠。

“因此，”他继续说：“你第一次的忠诚宣言只不过是為了一个具体的目的。我请你注意，我不是在同你讲大道理。我们两人都是在一个传统中长大的，在这些问题上有同样的看法。你认为我们的政策是错误的，你自己的是正确的。你要是在那时就这样说，就意味着开除出党，结果是不能按照你自己的想法继续做你的工作。因此你得抛掉负担，必须能够为你自己认为唯一正确的政策服务。换了我，也会这样做的。到此为止，一切正常。”

“那么后来呢？”鲁巴肖夫问。

伊凡诺夫又恢复了以前和蔼的笑容。

“我不懂的，”他说：“是这个：你如今公开承认多年来你一直相信我们在毁掉革命；同时你又否认自己属于反对派，否认阴谋策划反对我们。你真的想，我会相信你一直是袖着手在看我们——这是你的看法——把国家和党引向毁灭？”

鲁巴肖夫耸耸肩。“也许我的年纪太大，没有用了……可是你愿意怎样相信都行，”他说。

伊凡诺夫又点了一支烟。他的声音平静但是深入：

“你真的要我相信，你牺牲阿洛娃和否认这些”

——他的下巴向墙上发白的地方一劈——“只是为了保全你自己的脑袋？”

鲁巴肖夫沉默不语。过去了很长一段时间。伊凡诺夫俯在办公桌上的头更低了。

“我不明白你，”他说：“半个小时以前，你向我说了一通攻击我们政策的极其激动的话，随便哪一句都可以把你送命。如今你又否认这样一个简单的逻辑推论，就是说你属于一个反对派，对此，我们是有证据的。”

“真的？”鲁巴肖夫说：“要是你有证据，为什么还需要我的口供？请问，是什么事情的证据？”

“其中有，”伊凡诺夫缓慢地说：“妄图暗杀第一号的证据。”

又是一片沉默。鲁巴肖夫戴上夹鼻眼镜。

“请允许我反过来向你提一个问题，”他说：“你是真的相信这胡话，还是假装相信？”

伊凡诺夫的眼角里又露出原来那种近乎和蔼的笑意。

“我告诉过你。我们有证据。确切地说：口供。再确切地说：在你的唆使下要犯这罪行的人的口供。”

“祝贺你，”鲁巴肖夫说：“他叫什么名字？”

伊凡诺夫继续微笑。

“不该问的问题。”

“我可以看看他的口供吗？还是与那个人对质？”

伊凡诺夫笑了一下。他把口中的烟向鲁巴肖夫开玩笑地吹去。鲁巴肖夫很讨厌，但他没有动他的脑袋。

“你还记得巴比妥吗？”伊凡诺夫慢慢地问：“我想我已问过你这一点。现在两人的角色倒了个：今天是你跳下悬崖峭壁。但是我不会帮你跳。你当时说服了我，自杀是小资产阶级的冲动。我一定要做到你自杀不会成功。咱们俩就谁也不欠谁了。”

鲁巴肖夫不吭声。他在思量，伊凡诺夫究竟是在说谎，还是说真话——同时他又有这样奇怪的希望，几乎是肉体上的冲动，要想去摸一摸墙上发白的地方。“神经，”他想，“妄想。只站在黑色的石砖上，轻轻地自言自语，在袖口上擦擦眼镜——瞧，我又在这样做了……”

“我很想知道，”他大声说：“你对拯救我有什么方案？到现在为止，你审理我的方式似乎只能达到相反的目的。”

伊凡诺夫的笑容更展开了。“你这个老笨蛋，”他说，越过办公桌，伸手抓住鲁巴肖夫上衣的钮扣。“我有义务让你发一次火，免得你发的不是时候。你难道没有注意到我没有让速记员在场？”

他从烟盒里取了一支烟，塞进鲁巴肖夫的嘴里，另一只手仍没有放松他的钮扣。“你象一个孩子。象一个浪漫的孩子。现在让我们开始，炮制一份口供，今天的事就完了。”

鲁巴肖夫挣脱了伊凡诺夫。他在夹鼻镜后目光尖利地看他。“口供里说些什么呢？”他问。

伊凡诺夫笑容满面。“口供里写的是，你承认从某年某月开始，你参加了这样那样的一个反对派组织；但是你坚决否认组织或策划暗杀；相反，你一知反对派的罪恶的恐怖活动计划，你就退出该组织了。”

他们谈话以来第一次，鲁巴肖夫微笑了。

“要是这次谈话的目的就是这个，”他说：“我们可以马上中断。”

“让我说完要说的话，”伊凡诺夫说，一点也没有不耐烦。“我当然知道你会拖延。我们先来考虑一下这个问题的道德方面，或者说感情方面。你招认以后，并不出卖什么人。这帮人早已在你之前被捕了，其中一半已被清算掉了。这个你自己也明白。从其余人身上，我们可以弄到比这无害的东西更多的口供，事实上，我们可以弄到我们要的任何口供……我想你明白我的意思，我的坦率应该使你相信。”



“换句话说：你自己也不相信这个阴谋暗杀第一号的故事。”鲁巴肖夫说：“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要向我提出这个神秘的某人，作了这个口供的人呢？”

“请你想一想，”伊凡诺夫说。“把你放在我的地位——说实话，我们的地位可能是倒过来的——你就会自己得出答案来了。”

鲁巴肖夫想了一会儿：“你从上面得到了具体的指示，要怎样处理我的案子，”他说。

伊凡诺夫微笑道：“这说得太尖锐了。实际上，还没有决定你的案子究竟属于A类，还是P类。你知道这名词吗？”

鲁巴肖夫点点头；他知道。

“你现在开始明白了，”伊凡诺夫说：“A类指行政案件。P类指公开审判。极大多数政治案件是作为行政案件审理的，那就是说，公开审判没有好处……。如果你归为A类，就不归我管了。行政委员会的审理是秘密的，而且，你知道，有些是即决的。没有对质等这样的事情。想一想……”伊凡诺夫举了三、四个人的名字，偷偷地看了一眼墙上发白的地方。当他回过头来时，鲁巴肖夫第一次看到他脸上有痛苦的神色，目光迟钝，仿佛他不是在看鲁巴肖夫，而是在看鲁巴肖夫身后某个距离的地方。

伊凡诺夫轻轻地重复了一遍他们以前的朋友的名字：“我和你一样认识他们。”他继续说，“但是，你必须承认，我们象你们一样，反过来相信你和他们都会葬送革命。方法是用逻辑的推理。我们不能陷于司法细节之中。你们到那时候不也这样？”

鲁巴肖夫不说什么。

“这一切取决于，”伊凡诺夫继续说：“你归在P类，取决于你的案件在我手中。你知道从什么观点选择这些案件进行公开审判。我得证明你这方面有一定的意愿。因此，我需要你提出部分口供。如果你要充好汉，坚持认为你没有妥协的余地，单是某人的口供就可以把你结果掉。相反，要是你作了部分口供，就有基础进行更彻底的调查。在这基础上，我可以采取对质；我们可以否定掉最严重的控告，而在仔细划定的范围内承认有罪。即使这样，我们也不能弄到比二十年更轻的；事实上这是说二、三年后遇上大赦，五年之内你就又回到圈子里来了。现在请你好好地想一想，别忙着答复。”

“我已经想过了，”鲁巴肖夫说：“我拒绝你的建议。从逻辑上说，你可能是对的。但是这种逻辑我已领教得够多了。我厌倦了，我不想再玩这游戏了。请你把我送回牢房里去吧。”

“随你的便，”伊凡诺夫说：“我并没有想你会马

上同意的。这种谈话常常推迟产生效果。你有两个星期的时间。你想好了以后，叫他们带你来看我，或者给我一份书面声明也行。我相信你会送一份来的。”

鲁巴肖夫站了起来；伊凡诺夫也站了起来。他又高出鲁巴肖夫半个脑袋。他按了一下桌旁的电铃。他们在等狱卒来把鲁巴肖夫带回牢房去时，伊凡诺夫说：

“几个月以前你在一篇文章中说，今后十年将决定我们这一时代的世界的命运。你不想活着看到它？”

他俯着头微笑地看着鲁巴肖夫。外面过道上脚步声近了。门打开了。两个狱卒进来敬礼。不说一句话，鲁巴肖夫站到了他们两人的中间，就一起开步走向他的牢房。过道上的闹声如今已消失了；从有些牢房传来了打鼾声，听起来象呻吟。在整个楼里，亮着昏黄的灯光。

## 第二次提审

在教会的存在遭到威胁时，它就可以不受道德戒律的约束。为了统一的目的，一切手段均可以使用，甚至包括诡诈，背信，暴力，购买，监狱、死亡。因为一切秩序都是为了群体，个人必须为共同的利益作出牺牲。

凡尔登主教

狄特里希·冯·尼海姆

公元1411年

—

下面是尼·萨·鲁巴肖夫人狱后第五天日记的部分摘录：

“……最终的真理在最终之前总是谎言。最终证明是正确的人在最终之前显得是错误的和有害的。”

“但是谁会证明是正确的呢？只有后来才能知道。但在此之前他必须根据信用来采取行动，向魔鬼出卖灵魂，以期历史的救免。

“据说第一号有马基亚维利的《君主论》为他永久同榻共枕。他理该如此；从此之后，关于政治伦理的规则就再也没有人说过真正重要的话。我们是第一个以20世纪的革命伦理来取代19世纪自由主义的‘费厄泼赖’〔光明正大〕伦理的人。在这一点上，我们也是正确的。根据打板球规则进行的革命是荒谬的。在历史的喘息时间里，政治可以是相对的光明正大；但是在历史的重要转折关头，除了以前的规则外就不可能有别的规则，那就是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我们在这个国家里实行了新马基亚维利主义；别人，反革命独裁政权，拙劣地进行了仿效。我们是以普遍真理的名义实行新马基亚维利主义者——那就是我们的伟大之处；别人是以民族浪漫主义的名义，那是他们的时代错误。这就是为

什么我们最后会得到历史的赦免，而他们却不会……

“然而，在当前，我们是靠信用来思考和行动的。由于我们抛弃了板球道德的所有惯例和规则，我们唯一的指导原则是必然的逻辑的原则。我们受到可怕的强制力，必须把我们的思想推演到最后的結果，而且按此行动。我们是在没有压舱物的情况下航駛；因此船舱的每一摆动都是一件生死攸关的事。

“不久以前，我们著名的农学家B同他的三十个同案犯一起被枪决了，因为他坚持这样的看法：人造硝酸肥料比钾碱优越。第一号赞成钾碱，因此B和他的三十个同案犯必须作为破坏分子加以清算掉。在一种全国都集权化的农业中，以钾碱代替硝酸非常重要；它可以决定下次战争的胜负。如果第一号是对的，历史将会赦免他；而处决三十一个人只不过是小事一桩而已。如果他错了……

“就凭这一点，对谁在客观上是正确

的这一问题就很重要。板球-道德派是因为完全是另外的一个问题才激动的：B提出硝酸在主观上是不是出于诚意。如果不是，根据他们的伦理，理应枪毙，即使后来有事实表明，硝酸的确比较好。如果他出于诚意，应该宣布他无罪，允许他继续宣传硝酸的好处，即使国家因此受灾……

“这，当然完全是胡说八道。对我们来说，主观诚意问题是无关重要的。凡是错误的人都必须付出代价；凡是正确的人都可以得到赦免。这是历史信用的法则。这是我们的法则。

“历史教导我们，谎言常常比真理对它更有用；因为人类是懒散的，在他成长的每一步之前得牵着穿行沙漠四十年。得用威胁利诱、用幻想的恐怖和幻想的安慰来驱使他穿过沙漠，这样他才不会过早地坐下来休息，因崇拜金色的小牛而分心。①

---

① 典出《圣经》中摩西率众出埃及去迦南的故事。

“我们比别人更加彻底地学习了历史。我们与别人不同在于我们的逻辑的一贯性。我们知道美德与历史无关，罪恶仍旧不受惩罚，但是每一个错误都有它的后果，一直报复到第七代。因此我们集中全部精力要防止出错误，消灭它的一切种子。在历史上对于人类的前途从来没有象我们那样把这么多的权力集中在这么少数人的手里。我们遵循的每一错误思想都是对后代的犯罪。因此，我们必须惩罚错误的思想，就象别人惩罚罪行一样：用死亡。我们被视为疯子，因为我们把什么思想都推演到最后结果，据此行动。我们被人比作宗教迫害，因为，我们象他们一样不断地在我们的身上感到超个人的生命来临的负责任的全部重量。我们同宗教迫害者相似的地方在于，我们不仅迫害人们行为中的邪恶的种子，我们也迫害他们思想中的邪恶的种子。我们不允许有隐私，甚至一个人的脑袋里也不允许有。我们生活在要把什么事情都做到最后结果这种强制力之下。我们



的头脑受到了强烈的充电，稍有碰撞就会造成致命的短路。因此，我们命运注定要遭到互相的毁灭。

“我是其中之一。我的思想和行动是由于我必须如此；我毁了我喜欢的人，把权力交给我不喜欢的人。历史把我放到了我所处的地位；我已经用尽了历史给我的信用；如果我是正确的，我没有什么可以后悔的；如果我错了，我愿付出代价。

“但是‘现在’怎么能够决定将来判定什么是真理呢？我们是在做预言的先知的事，却没有他们先知的天才。我们用逻辑推理来代替远见。虽然我们大家都从同一个出发点出发，我们得到的结果却不一样。证据否定了证据，最后我们不得不求助于信仰——求助于不言自明的对自己的判断推理能力的正确性的信仰。这是至关重要的一点。我们把所有压舱物都抛掉了，只有一只锚维系着我们：对自己的信仰。几何学是人类推理的最纯正的实现；但欧几里德的定理无法证明。凡是不相信他的

定理的人，骤然看到整个建筑物的倒塌。

“不。我对他本人是有信仰的，他强硬、缓慢、阴沉、不可动摇。他有着最坚固的锚链。我自己的，在过去几年中已经磨细了……”

“事实是：我已不再相信自己的绝对正确。这就是我迷失的原因。”

## 二

鲁巴肖夫被第一次提审的第二天，预审官伊凡诺夫和他的同事格列金在晚饭后坐在食堂里。伊凡诺夫累了，他把他那假腿支在一张空椅子上，解开了制服的领口。他倒了一些食堂供应的廉价酒，默默地看着格列金。格列金穿着浆洗得笔挺会发出咯吱声的制服，正襟危坐在椅上。他甚至连手枪皮带也没有解下，尽管他也很累了。格列金一口喝干了杯中的酒；他的剃得光光的脑袋上触目的伤疤开始有些发红。除了他们两人以外，食堂里只有三个别的军官坐在远处的一张桌边；其中两个在玩象棋，第三个在旁作壁上观。

“鲁巴肖夫会有什么结果？”格列金问。

“他的处境不妙，”伊凡诺夫回答道：“但是他仍象以前那样讲逻辑。因此他会屈服的。”

“这个我可不信，”格列金说。

“他会有的，”伊凡诺夫说：“他把一切都想了一个透彻，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后，他就会屈服的。因此，重要的是随他去，不去打扰他。我答应给他纸、笔、香烟——加速他的思考过程。”

“我认为那样是错的，”格列金说。

“你不喜欢他，”伊凡诺夫说：“我想，几天前你同他吵了一架是不是？”

格列金想起了鲁巴肖夫坐在床上穿鞋的场面。“那没有关系，”他说：“他的个性没有关系。我认为错误的是方法。这不会使他屈服的。”

“鲁巴肖夫屈服的时候，”伊凡诺夫说：“这不是由于怯懦，而是出于逻辑。跟他来硬的没有用。他是这样一种材料制成的，你越敲，它越硬。”

“这完全是说说而已，”格列金说：“能够在肉体上抵抗任何压力的人是不存在的。我还没有看到过一个。经验告诉我，被大自然限制了的人的神经系统有多大抵抗力。”

“我可不想落到你的手中，”伊凡诺夫微笑道，但是微露不安的痕迹。“不过，你是你自己理论的

活生生的否定。”

他的微笑的眼光落在格列金脑袋的伤疤上，虽然只是一瞬间。那个伤疤的故事是人人都听说过的。在内战期间，格列金落到了敌人的手中，他们在他剃光的脑壳上烧蜡烛，要从他口中榨取某个情况。几个小时以后，他的自己人收复了阵地，发现他已失去了知觉。蜡烛烧到了头；格列金守口如瓶。

他的没有表情的眼睛看了伊凡诺夫一眼。

“那也是说说而已，”他说：“我没有屈服是因为我昏过去了。要是我再保持清醒一分钟，我就会开口的。这是个体质问题。”

他以一种坚决的姿态把酒一饮而尽。他把酒杯放回到桌上时，衣服窸窣作响。“我醒过来时以为自己已经开了口。但是同我一起获释的两个军士说情况不是如此。因此我得到了奖章。这完全是体质问题，别的都是传说。”

伊凡诺夫也喝了一口酒。他已经喝了不少廉价酒。他耸一耸肩膀。

“你从什么时候起开始有这种体质理论的？毕竟，在头几年里并不存在这种方法。那时候我们仍旧充满了幻想。废除对犯罪的惩罚和报复；对社会不合群的分子提供花园式的疗养院。这都是骗人

的空话。”

“我不相信这是空话，”格列金说：“你成了一个犬儒派。一百年后我们将有这一切。但是首先要熬过这一百年。越快越好。如果认为时间已经到了，那才是幻想。我当初刚调到这里来时，我也有这幻想。我们大多数人事实上都有，一直到最上层的整个机器。我们想马上开始修建花园。这是一个错误。在一百年内我们才会有能力让罪犯知道道理，具有社会意识。今天，我们仍须在他的体质上做工作，下功夫，如果有必要，从肉体上和精神上击溃他。”

伊凡诺夫心里想，格列金是不是喝醉了。但是他从格列金的安静的没有表情的眼光中看出，他没有喝醉。伊凡诺夫有些暧昧地看着他微笑。“换句话说，我是犬儒派，你是道德派。”

格列金没有说话。他僵硬地坐着，一身浆洗过的制服；他的手枪皮带有新鞣制的皮革味。

“几年以前，”格列金过一会儿说：“有个农民给带到我这里来审讯。那是在外省，当时我们仍相信花园理论，按照你的叫法。审讯是十分和颜悦色地进行的。那个农民把粮食都埋掉了，那是在土地集体化刚开始的时候。我严格遵守既定的规矩。我友好地向他解释，我们需要粮食来养活越来越增长

的城市人口和供出口之用，这是为了建设我们的工业。因此请他告诉我他的粮食藏在哪里。那个农民刚带进来的时候缩着脑袋，以为要揍他一顿。我知道他这一号人；我自己也是在农村长大的。我不但没有打他，反而同他讲道理，平等对待他，还叫他是‘公民’，他以为我是傻瓜。这，我可以从他的眼光中看出来。我同他谈话，说了半个小时。他从来没有开过口，不是挖鼻子就是掏耳朵。我继续谈话，不过我可以看出他把这件事看做是一出滑稽戏，根本不在听。道理，他的耳朵就是听不进去。他的耳朵被几百年家长制思想麻痹的耳垢堵死了。我严格遵守规则；我当时没有想到还有别的办法……

“那个时候，我一天有二、三十起这样的案件。我的同事也是这样。在这些吃得胖胖的农民身上，革命有翻船的危险。工人营养不良，整片整片的地方因为饥饿而伤寒流行，我们没有经费建设我们的军备工业，而我们却有随时遭到进攻的危险。两亿金块藏在这些家伙的羊毛袜里，一半粮食被埋在地下。我们在审讯他们时叫他们是‘公民’，而他们的又狡猾又愚蠢的眼睛却向我们眨巴，把这当作是一场滑稽戏，一边看着一边挖鼻子。

“第三次提审那个人是在夜里两点钟；在这以前我已连续工作了十八个小时。把他叫醒了以后，他

睡意未消，十分惊恐，终于泄了底。从此以后，我总是，在午夜提审……有一次有个妇女诉怨说，他们让她通宵站在我的门外，等轮到叫她。她的双腿站立不住，她完全累倒了；提审中途她睡着了。我把她推醒；她继续说下去，用梦呓似的声音，一点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说着说着又睡着了。我又把她推醒，她什么都招认了，看也不看就在口供上签了字，好让我放她去睡觉。她的丈夫在谷仓里藏了两挺机枪，并且劝说村里的人一起把粮食烧掉，因为‘反基督’在梦中向他显了灵。她之所以一整夜站在我门外是因为我的副官的疏忽；从此以后，我怂恿这种疏忽；有些顽固分子得让他在原地站上四十八小时，这样他们耳朵里的耳垢才会掉出来；我们同他们说话就听得进去了……”

在食堂那边一个角落下棋的两个人重新布局再下一盘。第三个人已经走了。格列金说话的时候，伊凡诺夫看着他。他的声音一如既往，是那么清醒，没有感情的表露。

“我的同事有同样的经验。这是取得成效的唯一办法。规则遵守不误；没有碰一个犯人。但是安排了他们去观看——可以说是偶然——他们同狱犯人的处决。这样的场面所造成的效果一部分是精神上的，一部分是肉体上的。另外一个例子：为了卫

生的缘故给他们洗澡。在冬天，暖气和热水管不是总是运行良好的，这是由于技术上的困难；洗澡时间的长短决定于看管澡堂的工人。有时，暖气和热水管道运行情况太好了，这也决定于管理澡堂的工人。他们都是老同志；不需要给他们下具体的指示，他们了解这里面的文章。”

“行了，行了，”伊凡诺夫说。

“你问我怎么会发现我的理论的，我是在向你解释，”格列金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记住这一切的逻辑必要性；否则，我们就是犬儒派，象你那样。时间不早了，我该走了。”

伊凡诺夫喝干了杯中的酒，把假腿在椅上放得舒服一些；他的半截腿又有了关节痛。他怪自己不该惹起这场谈话。

格列金付了钱。食堂服务员走后，他问：

“对鲁巴肖夫打算怎么办？”

“我已经把我的看法告诉你，”伊凡诺夫说：“不要去打扰他。”

格列金站起来。他的皮靴咯吱作响。他站在伊凡诺夫搁腿的那张椅子旁。

“我承认他过去的功劳，”他说：“但是他今天已同我的胖农民一样有害；只有更危险。”

伊凡诺夫抬头看格列金没有表情的眼睛。



“我给他两个星期的时间反省，”他说：“在这以前我不去打扰他。”

伊凡诺夫是用打官腔的调子说的。格列金是他的部下。他敬了礼，穿着皮靴咯吱咯吱地离开了食堂。

伊凡诺夫仍坐着。他又喝了一杯，点了一支烟，向前吐烟。过了一会儿，他站了起来，一瘸一拐地走到另外两个军官那里去看他们下棋。

### 三

第一次提审以后，鲁巴肖夫的生活水平象出现奇迹般提高了。第二天早晨老狱卒就给他送来了纸、笔、肥皂、毛巾。同时他给了鲁巴肖夫监狱代金券，相当于他被捕时身边带的现金数额，并且向他解释，他如今有权利从监狱小卖部买烟和吃的。

鲁巴肖夫要了些香烟和吃的。那个老头仍象原来那样态度阴沉，一问才一答，但是他马上送来了鲁巴肖夫买的東西。鲁巴肖夫本来想要求从监外请个医生来，但后来又算了。他的牙齿暂时不痛了，他盥洗过后，吃了一些东西，感到好受了。

院子里的积雪已经清除，犯人成群地绕着院子走，作为每日的锻炼。原来由于下雪而中断过。那时只允许兔唇和他的同伴每天走十分钟，也许是出

于医生的特别许可。他们每次进出院子，兔唇总是抬头看望鲁巴肖夫的窗户。这个姿态十分明显，没有怀疑的余地。

鲁巴肖夫不在作笔记或来回踱步的时候，就站在窗前，前额顶着窗格玻璃，看着犯人在院子里放风。他们往往十二个人一组，两人一行，相隔十步，绕着院子走。院子中央站着四个穿制服的官员，监视犯人互相不得说话。他们成了圈着转的圆圈的轴心，圆圈转得很慢，十足转了二十分钟。然后犯人们被带着从右边的门进去，与此同时左边门内就出来另外一组犯人，继续单调的转圈，一直到下次换班。

在头几天，鲁巴肖夫还在找这里面有没有熟悉的脸孔，结果却没有找到。这使他感到放心：因为在目前他想避免见到任何可能提醒他外面世界的东西，任何可能使他分心离开目前任务的东西。他的任务是把他的思想推理到一个结果，同过去和现在求得一致，同生者和死者求得一致。根据伊凡诺夫的规定期限，他还有十天工夫。

他只有把思想记下来才能继续思考；但是，写笔记十分累人，他一天只能强迫自己干一、二小时。在其余的时间里，他的大脑在自发地工作着。

鲁巴肖夫总是相信，他很了解自己。由于没有

道德上的偏见，他对于所谓“第一人称单数”这个现象并没有幻想，而且并不带什么情感地，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个现象是有一定冲动的，而人们一般都不肯承认这一点。现在，当他用额角顶着窗户，或在突然在第三块黑色石砖上止步的时候，他有了意想不到的发现。他发现一般错误地叫做“独白”的行为，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对话”。在这种对话中，对话的一方保持缄默，而另一方违反语法规律，不叫他为“你”，而叫他为“我”，目的是骗得他的信任，想象他的意图；但是缄默的一方只是保持缄默，避免说话，甚至拒绝被限制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内。

不过，如今，在鲁巴肖夫看来，习惯上保持缄默的一方有时候也说话，并不是问他才说话，也没有任何可见的借口；他的声音在鲁巴肖夫听来是完全不熟悉的；他听着真的十分吃惊，而且发现自己的嘴唇在蠕动。这些经验并无神奇或神秘之处；它们是属于一种具体的性质；鲁巴肖夫根据自己的观察逐渐相信，在这个第一人称单数身上，有一个彻底具体成形的构成部分，这些年来一直保持缄默，现在却开始张口说话了。

这个发现比他与伊凡诺夫谈话的细节更加强烈地占据着鲁巴肖夫的脑海。他认为不接受伊凡诺夫

的建议已成定局，他将拒绝继续玩这个把戏。因此，他只有很有限的时间可以活了。这个信念构成了他的反省的基础。

他根本没有去多想图谋刺杀第一号的荒谬的故事。他对伊凡诺夫本人的人格更有兴趣。伊凡诺夫说，他们两人的地位很可能颠倒过来。在这一点上，他无疑是对的。他本人和伊凡诺夫是他们成长发展上的孪生子；他们不是来自同一卵细胞，可是是从共同信念的同一脐带得到营养的。党的激烈的环境在他们的成长发展的决定性年代中刻铸了他们两人的性格。他们两人有同样的道德标准，同样的人生观，用同样的方式思想。他们目前的地位很可能颠倒过来。鲁巴肖夫坐在办公桌后面，伊凡诺夫坐在办公桌前面；鲁巴肖夫从那个地位很可能用伊凡诺夫用过的同样论点。游戏的规则是固定的，只允许有细节的变化。

要想通过别人的脑中进行思考的冲动，如今又支配了他；他坐在伊凡诺夫的位置上，通过伊凡诺夫的眼睛来看处于被告地位的自己，就象以前他看理查德和小洛埃一样。他看到这个被贬黜的鲁巴肖夫已成了以前的一个影子，他懂得了伊凡诺夫为什么用又怜悯又轻视的复杂心情对待他了。在他们谈话时，他曾一再询问自己，伊凡诺夫究竟是有诚意

的，还是虚伪的；他是在对他布置陷阱，还是真的要给他指引一条逃避的出路。如今，他把自己放在伊凡诺夫的地位，他就认识到伊凡诺夫是有诚意的——就象他自己对理查德或小洛埃那样一样有诚意，或者一样没有诚意。

这种反省也具有独白的形式，但是是按照常见的方式；新发现的那个存在，那个缄默的一方并没有参加进来。虽然所有的独白的谈话对象都是他，他仍一声不吭，他的存在限于叫做“第一人称单数”这个语法抽象概念。直接的问话和逻辑的沉思都没有引得他说话；他却在没有明显的原因时说出声来，而且，奇怪的是，总是伴随着剧烈的牙痛。他的精神领域似乎是这样不同和无关的东西组成的，如圣母画像的合抱的手，小洛埃的猫，那支反复唱“化为灰烬”的歌曲的调子，阿洛娃有一次在一个特殊场合说过的一句话等等。他的表达手段也同样是零碎的：例如，要在袖口上擦夹鼻眼镜的冲动，要去摸一摸伊凡诺夫房间里的墙上发白的地方的冲动，不可控制的嘴唇的蠕动，老是在说“我将付出代价”这样没有意义的话，以及白天做梦见到过去一生中的片断而造成的晕眩状态。

鲁巴肖夫要想在牢房的踱步中十分彻底地研究一下这个新发现的存在。由于在党内一向不好意思

强调第一人称单数 他给起了一个名字叫“语法虚构”。他大概只有一、两个星期好活了，他感到有一种紧迫的要求来澄清这个问题，“把它一直想到逻辑的结果”。但是“语法虚构”的领域似乎正好是在“想到逻辑的结果”结束的地方开始的。始终处于逻辑思维所及的范围之外，然后又象伏击一般乘人不备，用白日梦和牙痛来袭击，这显然是“语法虚构”的存在的一个重要部分。这样，鲁巴肖夫把他入狱以后的第七天，第一次提审后的第三天，都花在重新活一遍他生活中过去的一个时期了——那就是他同那个已被枪决的姑娘阿洛娃的关系。

他倒底是在什么时候——尽管他下了坚定决心——陷入白日梦的，事后是很难确定确切的时间的，正如很难确定你什么时候入睡的一样。在这第七天的上午，他做了一会儿笔记，然后，大概是想宽松宽松一下腿，就站立起来。只有听到锁眼里的钥匙转动声，他才醒悟过来，已是中午了，他在牢房里已来回走了不知多少时间了。他甚至在肩膀上围了毯子，因为——大概也有好几个小时了——他不断地打寒颤，太阳穴感到牙神经的跳动。他心不在焉地用勺子掏着碗里的东西，一边继续来回踱步。狱卒隔一阵子就来窥视孔中看一看，看到他全身哆嗦，耸起双肩，嘴唇蠕动。

鲁巴肖夫又一次在呼吸他以前的贸易代表团办公室里的空气了。这办公室里弥漫着阿洛娃的体态动人的高大身体的气味。他再一次看到她在他口授时低头伏在笔记本上露在白衬衫上面的颈部的曲线，她的眼光跟着他在句子顿歇时在屋子里来回踱步。她总是穿白衬衫，与鲁巴肖夫的姊妹们在家里穿的相同，高高的领口上绣着小花，总是戴着那副廉价的耳环，她低头做笔记时就垂到脸颊上来了。她动作缓慢稳妥，好象是天生做这工作的，在鲁巴肖夫工作过度而劳累时，对他的神经有一种缓和作用。他是在小洛埃的事件发生后不久就马上承担了驻在B国的贸易代表团团长的的工作的，一接任就全心投入工作，他很感谢中央给他从事这种官样文章工作的机会。国际的领导人调去做外交工作是很少见的。第一号显然对他有特别的寄托，因为这两个系统一般是严格分开的，不允许互相接触，有时甚至执行相反的政策。只有从第一号身旁的较高角度来看，这表面上的矛盾就解决了，动机也就清楚了。

鲁巴肖夫需要一些时间来适应他新的生活方式；他觉得很好玩，他如今居然有了一份外交护照，而且这是真护照，不是假护照，用的是他自己的名字。他还得穿着正式礼服参加招待会。警察看

到他马上立正，还有穿着不显眼的戴着呢帽的人有时跟着他，这完全出于对他安全的考虑。

起初，他对于贸易代表团的办公室的气氛有点不习惯。代表团附设在使馆里。他明白，在资产阶级世界里，你得象个代表的样子，得入境随俗，但是他认为这种入境随俗有些太过分了，因此很难分清表面与现实的区别。使馆的一等秘书——在革命之前为了党他曾经制造过伪币——提醒鲁巴肖夫注意在服饰上和生活气派中必需有所改变的时候，他并不是以一种同志式的善意提出来的，考虑和方式有些过分，这就弄得场面很尴尬，使鲁巴肖夫感到不快。

鲁巴肖夫有十二名下属，每人都有明确的级别；有一等和二等助理，一等和二等会计，秘书，助理秘书。鲁巴肖夫有这样的感觉，他们这帮子人都把他看成既是民族英雄，又是强盗头子。他们对他毕恭毕敬，近乎做作，但是又象大人对小孩那样宽厚纵容。使馆的秘书有事汇报时，用了一种只对小孩或野蛮不开化的人才用的简单的话来解释文件。只有鲁巴肖夫的私人秘书阿洛娃没有使他不自在；只是他不能理解她为什么穿那种高得异常的漆皮高跟鞋来配她简单、舒服的衣裙。

过了几乎一个月他才第一次用闲聊的口气同她



说话。他来回踱步口授文件已经累了，突然发现屋子里寂静无声。“你为什么老不出声，阿洛娃同志？”他问道，在办公桌后舒服的转椅上坐下。

“要是你愿意，”她用睡意朦胧的口气说：“我以后就把句子的最后一个字重复一遍。”

她每天穿着绣花衬衫，坐在办公桌前面的椅子上，形态动人的胸脯俯在笔记本上，低着头，耳环平行地垂到了双颊。唯一不协调的因素是她的高跟漆皮鞋，不过她从来不交叉双腿，象鲁巴肖夫所认识的大多数女人那样。由于他在口授时总是来回踱步，他往往是在背后看到她的时候居多，或者是侧影，他记得最清楚的是她弯着的脖子的曲线。她的后脖子没有绒毛，不象是剃去的，皮肤白皙，绷紧在颈椎上，下面就是她的白衬衫的绣花衣领。

鲁巴肖夫年轻的时候同女人很少来往；她们总是同志的身份，几乎每次发生关系都是因为讨论什么问题，不知不觉已到深夜，不论哪一方是客人，都错过了末班车回家。

在那次想聊几句的尝试失败以后，又过了两个星期。起初阿洛娃真的用她瞌睡的声音重复口授句子的最后一个字。后来她放弃了这个做法，等到鲁巴肖夫口授吸一口气时，屋子里又充满了沉默和她的姊妹式的香水味。有一天下午，鲁巴肖夫自己也

觉得奇怪，居然在她背后站立下来，把双手轻轻地按在她的肩上，问她愿不愿意晚上同他一起出去。她没有猛的转身，在他的接触下，她的双肩没有动；她无声地点一点头，连转也不转过来。鲁巴肖夫没有开轻浮的玩笑的习惯；但后来在那天晚上，他禁不住微笑说：“别人还以为你在继续速记口授呢。”在屋子里的暮色中，她的形态动人的大乳房的轮廓似乎很熟悉，好象她一直在那里一样。只有耳环如今平躺在枕头上。这时她突然说了一句话，这句话象圣母画像的合抱的双手和那个海港的海草气味一样留在鲁巴肖夫的记忆中。她说话的时候她的眼睛的表情就象平时一样：

“你愿意怎么样待我都行。”

“但是为什么？”鲁巴肖夫问，感到奇怪，甚至有点吃惊。

她没有回答。也许她已经睡着了。她睡着的时候，呼吸象醒着一样无声无息。鲁巴肖夫从来没有注意到她的呼吸。他从来没有看到过她合上眼睛的样子。这使她的脸有些陌生；她的脸部在眼睛合上的时候比张开着更有表情。同样使他感到陌生的是她腋窝的黑影。她的下巴平时垂在胸前，如今抬着象死人的下巴。但是她身上的轻微的姊妹般的气味，甚至在睡着的时候，他也觉得是熟悉的。

第二天以及以后的所有的日子里，她又穿着白衬衫坐在那里伏在桌子上。第二天晚上和以后的所有晚上，她的胸脯的白色影子都衬在卧室的暗色窗帘上。鲁巴肖夫不论白天还是夜晚都生活在她的丰满慵懒的肉体的气氛中。她在工作时间的态度仍没有改变，她的声音依旧，她的眼睛依然没有表情，从来没有流露过任何暗示。鲁巴肖夫常常感到口授累了的时候，就站在她的椅后，把双手靠在她的肩上；他什么话也没说，她的衬衫下的温暖的肩膀也不动；这时他就找到了他要找的辞语，恢复在屋子里来回踱步，继续口授。

有时他对自己口授的内容加上一些讽刺的评语，这时她就停下来等着，手中执着铅笔，一直到他说完。但是她从来不对他的讽刺的话露出笑容，鲁巴肖夫从来不知道她的反应。只有一次，在鲁巴肖夫说了一句涉及第一号个人习惯的特别危险的笑话以后，她突然用充满睡意的声音说：“在别人前面你千万别说这种话。你得小心些……”但是他常常感到，尤其是在上级的指示和传阅文件下达时，他感到有需要发泄一下他的离经叛道的机智。

那是准备第二次反对派大审判的时候。使馆里的空气特别紧张。墙上的照片和肖像一夜之间不见了。它们挂在那里已有多多年，本来谁都不瞧一眼，

如今墙上发白的地方跳进了你的眼帘。工作人员的交谈只限于工作本身；互相之间保持着谨慎矜持的客气态度。在使馆食堂吃饭的时候，交谈不可避免，他们就只用些正式辞令中的一些陈词滥调，这在熟悉亲切的气氛中，显得滑稽可笑，甚至令人不安，就好象一边说请你递过盐瓶或芥末缸给我，一边却向对方呼喊党代表大会最新宣言中的口号。常常有人抗议对他刚才说的话作了曲解，并且请邻座的人作证，急忙忙地声称“我没有说过这话”，或者“我的意思不是这样。”这种情况使鲁巴肖夫有一种观看木偶剧的奇怪印象，角色都是在人操纵下行动的，说的是固定的套话。只有阿洛娃一个人似乎没有改变，仍保持着她的沉默不语、睡意朦胧的态度。

不仅是墙上的肖像，就是图书馆书架上的书也减少了。有些书籍和小册子的消失是不声不响的，往往是在接到上面新指示的那一天。鲁巴肖夫在向阿洛娃作口授时对此发表了讥讽的意见，她只默默地听着。大多数关于对外贸易和货币的著作都从书架上消失了，因为它们的作者，财政人民委员刚刚被捕。同时消失的还有以前党代表大会关于这个问题的报告，关于革命前期历史的大多数书籍和参考书，活着的作家的关于法学和哲学的大多数著作，

关于节制生育问题的一切小册子，关于人民军编制的典籍，关于工联主义和人民国家中有权罢工的文章，凡是两年以前的关于政治体制问题的所有讨论和研究，最后甚至还有科学院出版的成卷的《百科全书》——据说不久就要出修订新版。

新的书也来了。社会科学的经典著作添了新的注脚和评论，新版历史书代替了老版，已故革命领袖的新回忆录代替了老回忆录。鲁巴肖夫开玩笑地对阿洛娃说，唯一没有做的事情就是把以前所有的报纸重新出修订新版了。

在这期间，几星期以前，从上面下来一道命令，要任命一个图书馆主任来负责使馆图书馆书籍的内容的政治责任。大家都推荐阿洛娃。开始，鲁巴肖夫还把这件事情看做是胡闹，说这又不是“幼儿园”之类的话，直至后来一个晚上，在使馆党支部的每周例会上，阿洛娃受到了各方面严厉的攻击。三、四个发言者，其中有一等秘书，站起来说，在图书馆找不到第一号的一些最重要的讲话，而另一方面直至最近仍充斥着许多反对派的著作，以及一些已被揭露是间谍、卖国贼、外国代理人的政治家的著作，因此人们不得不怀疑这是有意示威。发言的人都毫无表情，例行公事，用词谨慎。仿佛是互相提示预先准备好的发言稿。所有发言最

后都说党的主要责任是保持警惕，无情揭露错误，不论是谁，若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就成了可恶的奸细的同谋犯。最后让阿洛娃表态，她象往常一样镇静地说，她绝没有邪恶用意，她遵守一切指示。她在用深沉的语音说话时，眼光久久地停在鲁巴肖夫的身上，在平时，在别人面前，她是从来不这样做的。会议结束时通过了给予阿洛娃一次“严重警告”的决定。

鲁巴肖夫对于最近党内使用的方法非常熟悉，因此感到不安。他猜想阿洛娃会遇到更严重的困难，但是感到无能为力，因为没有什么具体的东西可以抓到同之斗争。

使馆里的空气更加紧张了。鲁巴肖夫在作口授时不再发表个人意见，这给了他一种特别的负疚感。他同阿洛娃的关系在表面上没有什么变化，但这种负疚感——这完全是因为他在口授时再没有能力作机智的评语了——使他不再象往常的那样，站在阿洛娃的椅后，把双手按在她的肩上。一个星期以后，阿洛娃有一个晚上没有来到他屋子过夜，以后的晚上也没有来。再过了三天，鲁巴肖夫才有勇气问她什么原因。她的低沉的声音说是因为头痛什么的，鲁巴肖夫也就不再追问下去了。从此以后她就不再来了，只有一次例外。

那是支部开会宣布“严重警告”后三个星期，也是她不再来他的地方后两个星期。她的行为几乎如常，但整个晚上鲁巴肖夫感到她是在等他说一句决定性的话。但是他只说，他很高兴她又回来了，又说自己工作过度，感到疲倦——这是实际情况。在半夜里，他几次发现她没有睡着，双目呆呆地望着黑暗。他不能去掉这种令人痛苦的负疚感；而且他的牙痛又开始了。这是她最后一次来看他。

第二天，在阿洛娃到他办公室来之前，一等秘书象讲秘密话的样子告诉鲁巴肖夫，其实每句话的用词十分谨慎：一个星期以前，“那边”逮捕了阿洛娃的哥哥和嫂子。阿洛娃的哥哥娶了一个外国人；他们俩都被控与她的祖籍国家有叛国勾结，为反对派服务。

几分钟以后，阿洛娃前来工作。她象往常一样坐在办公桌前面，身上仍穿绣花白衬衫，稍微向前俯着。鲁巴肖夫在她身后来回踱步，他的眼睛一直看着她的后脖，白皙的皮肤包着弯曲的颈椎骨。他的眼光无法离开这一块皮肤，他心中感到不安，达到了身体不舒服的程度。他始终抛弃不了这样的想法：在“那边”，被告就是在这后脖子上挨一枪的。

党小组的下一次会议上，在一等秘书动议下，阿洛娃被撤除了图书馆主任的职务，因为政治不可

靠。会上没有人发表意见，也没有举行讨论。鲁巴肖夫正碰上牙痛难熬，请了病假没有参加会议。几天以后，阿洛娃和另外一个工作人员奉召回国。以前的同事们从此不再提到她们的名字；但是在他本人奉召回国之前留在使馆的几个月中，她的丰腴慵懒的肉体的姊妹般气味黏住了他屋子的四壁，久久不散。

#### 四

“起来，你这人世间的可怜虫。”

从鲁巴肖夫被捕后第十天的早晨起，他左边的邻居，406号犯人每隔一段时间就敲出这同样的句子，而且总把“起来”一词拼错。鲁巴肖夫有好几次要同他谈话，但鲁巴肖夫一敲墙，对方就听着不作答；鲁巴肖夫得到的唯一答复是一列互不相关的字母，最后总是这句话：

“起来，你这人世间的可怜虫。”

这位新邻居是前一天晚上关进去的。鲁巴肖夫从睡梦中醒来，听到一些响动和406号牢门锁上的声音。早上吹过起床号以后，406号马上开始敲墙：“起来，你这人世间可怜虫。”他敲得很快，很技术，很熟练，因此，他的拼写错误和他的其他通话的没有意义，显然不是由于技术上的原因，而是精神上的原



因。也许这个新邻居的神精是错乱的。

早饭以后，402号里的年轻军官发出信号表示要通话。在鲁巴肖夫和402号之间已产生了友谊。戴眼镜、留胡子的军官一定生活在长期的无聊之中，因为只要鲁巴肖夫肯同他通话，不论如何简短，他总是感激的。一天之中有五六次，他会卑躬屈膝地求鲁巴肖夫：

“请同我谈话……”

鲁巴肖夫很少有此心情，他也不知道同402号谈什么好。一般情况下，402号谈的都是军官食堂的典型故事。点出意思之后，便是一片沉默。这些故事都老掉了牙，内容猥亵；你可以想象，402号在敲完以后，一定是在等待对方捧腹大笑，但面对的却是一道无言的白灰墙。完全是出于同情和礼貌，鲁巴肖夫有时敲出一句高声的“哈，哈”，用夹鼻眼镜来代替笑。这么一来，402号就没有完了，他对着墙拳打脚踢，敲出“哈—哈！哈—哈！”来表示高兴，有时还停下来看看鲁巴肖夫是不是也一起在笑。如果鲁巴肖夫没有反应，他就会责备：“你没有笑……”。有时鲁巴肖夫为了太平一些，敷衍一、两个“哈—哈”，402号就会对他说：“咱们笑得真痛快。”

有时他嘲弄鲁巴肖夫。如果他没有得到回音，

就会敲出一整支军歌，歌词连续不断。有时正好鲁巴肖夫在来回踱步，或者沉溺在白日梦中，或者在沉思，他就会开始哼一只旧进行曲，这说明他的耳朵已不自觉地听熟了。

但是402号还是很有用的。他在那里已有两年了；他熟悉门道，他同好几个邻居都通讯，听到各种各样的传说，似乎监牢里的什么事情他都知道。

406号到达后的第二天早晨，402号开始日常的交谈，鲁巴肖夫问他知不知道他的新邻居是谁。对此，402号回答：

“里普·凡·温克尔。”<sup>①</sup>

402号喜欢说话打哑谜，目的是为了使交谈有一些刺激因素。鲁巴肖夫从记忆中找寻。他想起了有个人睡了二十五年后醒来发现世事已大变，人间面目已全非的故事。

“他已失去了记忆？”鲁巴肖夫问。

402号对于自己的哑谜所产生的效果感到满意。把自己所知道的统统都告诉了鲁巴肖夫。406号原来是东南欧一个小国的社会学教员。上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他参加了他的国家爆发的革命，当时欧洲许多国家都发生了革命。他们建立了一个“公社”，存在了

---

<sup>①</sup> 美作家华盛顿·欧文(1783—1859)同名短篇小说中的人物，山间一觉醒来，人间已过二十年。

几个星期，遭到了不可避免的血腥镇压。革命的领袖们都是业余生手，而镇压却有职业行家的彻底性。406号被公社封给了一个“人民教化国务秘书”的好听头衔，因此被判绞刑处死。他等处决等了一年，后来成为终身监禁。他服刑一共服了二十年。

二十年的大部分时间是单独禁闭，不得与外界联系，不许阅读报纸。他是完全被遗忘了，那个东南欧国家的司法制度仍是家长制性质。一个月以前，他被突然大赦，——成了经过二十年黑暗生活和昏睡以后又回到人间来的里普·凡·温克尔。

他搭上第一辆火车到他梦想中的国度去。他到达后十四天就被逮捕了。也许，经过了二十年单独禁闭，他已变得太饶舌了。也许他把他在牢房里日夜梦寐的“那边”应该有怎样的生活告诉了别人。也许他打听了老朋友的地址，他们是革命的英雄，但是他不知道他们不过是叛徒和间谍。也许他在不该放花圈的坟上献了一个花圈，或者想去拜访他的著名邻居——鲁巴肖夫同志。

现在他可以问自己，究竟哪一种情况更好一些：在一个黑牢的草席上做二十年的梦，还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过两星期的现实生活。也许他的神志已经不再清醒了。这就是里普·凡·温克尔的故事……

402号敲完他的长篇报告以后不久，里普·凡·

温克尔又开始了，他把被他阉割了的诗句“起来，你这人世间的可怜虫”敲了四、五次，然后又沉默了。

鲁巴肖夫躺在床上，闭着眼睛。“语法虚构”又出现了；它没有用语言来表达，只是用一种隐隐约约的不安的感觉。它的意思是：

“为此，你也必须付出代价，对此，你也是有责任的；因为在他做梦的时候你在行动。”

同一个下午，鲁巴肖夫给带去刮胡须。

这次的行列只包括老狱卒和一个穿制服的警卫。老头走在前面脚步趑趄着，那个警卫在鲁巴肖夫后面两步。他们走过406号牢房，但门上还没有放上名片。在理发室有两个犯人当理发员，如今只有一个在场，这显然是为了不让鲁巴肖夫同太多的人接触。

他坐落在理发椅上。理发室相当干净，甚至还有一面镜子。他摘下夹鼻眼镜，对着镜子看自己的脸；他看到没有什么变化，除了双颊长的胡须茬儿。

理发员一声不吭地干起来，动作迅速而小心。理发室的门开着。狱卒已经走开了。穿制服的警卫靠在门框上站着，看理发员干活。刷在脸上的温热的肥皂沫使鲁巴肖夫感到愉快。他感到有些被诱惑，

要想享受人生中的小小乐趣。他很想同理发员聊上几句，但他知道这是不允许的，他不愿给理发员惹来麻烦，他喜欢他宽阔开放的脸。从他的体格来看，鲁巴肖夫认为他该是个车工或者机工。肥皂沫涂完以后，剃刀试了一下，理发员便问刀刃扎不扎脸，叫他“鲁巴肖夫公民”。

这是鲁巴肖夫进屋以后他说的第一句话，虽然理发员用的是就事论事的口气，它有一种特殊的意义。接着又是沉默。门口的警卫点了一支烟。理发员修剪了鲁巴肖夫的山羊胡须和头发，动作迅速、精确。他俯在鲁巴肖夫身上干活的时候，鲁巴肖夫接触到了他的眼光一下，就在这个时候，理发员把两个手指插进鲁巴肖夫的领口，好象是为了好剃去他脖子上的头发。当他把手指拔出来时，鲁巴肖夫感到有一小纸球夹在他的领口下面。几分钟后活干完了，鲁巴肖夫又被带回他的牢房。他坐下在床上，一只眼看看窥视孔那边，看到没有人在监视他，就把那小纸球取了出来，摊平了读它。上面只有五个字，显然是在极匆忙的情况下书写的：

“默默地去死。”

鲁巴肖夫把纸团扔进便桶里，又开始胡思乱想了。这是从外面传来的第一次信息。在敌人的国家

里，常常有信息偷偷地送到他的监狱里。这些信息都是号召他<sup>们</sup>高声抗议；把罪名奉还给起诉他的人。历史上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時候，革命者必须保持沉默？历史上是不是有这样的转折点，对他只有一个要求，只有一件事是对的：默默地去死？

鲁巴肖夫的思路给402号打断了，他一回来，他就开始敲墙。他充满好奇，要想知道鲁巴肖夫刚才给带到哪里去了。

“去刮胡须，”鲁巴肖夫解释。

“我以为发生了最糟糕的事，”402号带着感情说。

“随君之后，”鲁巴肖夫答。

象往常一样，402号只要听到回答就很感激。

“哈——哈！”他表示：“你真是个硬汉子。”

很奇怪，这句古老的奉承话使鲁巴肖夫感到高兴。他羡慕402号，他的社会身份有一套严格的规矩，怎样活，怎样死。你可以有个依据。但他自己这种人，却没有教科书，一切得自己解决。

甚至死亡也没有规矩。哪一种死法更光荣：默默地去死——还是公开辱骂自己，为了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他已牺牲了阿洛娃，因为他自己的存在对革命更有价值。那是他的朋友们用来说服他的决定性论据。为了以后保存自己，这个责任比小资产阶级道德观的戒律更加重要。对于那些改变了历史

面貌的人来说，除了留在世上准备待命以外没有其他责任了。“你愿意怎么样待我都行，”阿洛娃说过这话，他也这样做了。为什么他要以更多的考虑来对待自己呢？“未来的十年将决定我们时代的命运，”伊凡诺夫引用过这句话。他能不能仅仅出于个人的厌恶和疲倦和虚荣而潜逃呢？要是，万一第一号是正确的呢？要是，尽管发生了过去的一切，未来的宏伟基础就是在这里——在污泥、血泊、谎言之中奠下的呢？历史不是经常是一个不讲人情，不择手段的把谎言、血泊和污泥当作灰泥来搅拌的建筑者吗？

默默地去死——消失在黑暗之中——这说起来容易……

鲁巴肖夫突然在距窗户的第三块黑石砖上停下步来。他发现自己已大声重复“默默地去死”几次了，用的是讥刺的不赞成的口气，好象是要强调这话的绝对荒谬……

只有到现在他才意识到他拒绝伊凡诺夫建议的决定并不如他所以为的那样不可动摇。现在他觉得更成问题了，他究竟是不是真的打算过拒绝这个建议而不发一言地退出舞台。

## 五

鲁巴肖夫的生活条件继续改善。第十一天早晨，

他第一次被带到院子里锻炼。

老狱卒在早点以后不久就来带他，同行的还有那个押解他去理发室的警卫。狱卒告诉鲁巴肖夫，从今天起他可以在院子里每天锻炼二十分钟。鲁巴肖夫编入“第一轮”，早餐后就开始。接着狱卒一一交代了规则：在散步期间禁止与旁边的人或任何其他犯人说话，或打手势记号、交换纸条、越队离开。凡有违反者一律马上取消锻炼权利，严重者在黑牢里关四星期禁闭。然后狱卒从外面砰的关上了鲁巴肖夫的牢门，三个人就一起开步走了。刚走几步，狱卒又开了406号的门。

鲁巴肖夫跟穿制服的警卫一起站在离门稍远的地方，他看到了牢房里躺在床上的里普·凡·温克尔的双腿。他穿的是黑皮靴。方格裤子，裤角已成毛边了，但仍给人以熨洗干净的感觉。狱卒再次一一交代规则：方格裤腿摇摇晃晃地下了地，门口出现了一个小老头，眨巴着眼睛。他的脸上尽是灰白的胡茬。配着他的漂亮的方格裤子，上身穿一件黑色背心，挂着金属的表链，外面是一件黑色上衣。他站在门口，极其好奇地打量着鲁巴肖夫，然后他友好地点了一点头，四个人就一起出发了。鲁巴肖夫原来以为会遇到一个神志不清的人，如今他改变了看法。尽管他的眉毛常常神经性抽搐，大概是因



多年蹲黑牢引起的，里普·凡·温克尔的眼光明亮，而且有一种小孩子般的友善神色。他走路很吃力，步子短促然而坚定，不时地向鲁巴肖夫投来友善的眼光。下楼的时候，那小老头忽然绊了一交，几乎倒地，幸而有警卫及时扶了他一把。里普·凡·温克尔喃喃地说了几句话，声音太轻，鲁巴肖夫听不清，但显然是客气地表示感激的话，那警卫傻笑一下。接着他们穿过一扇开着的门到了院子里，其他犯人已两人一排成行了。院子中央警卫站着的地方一吹哨，转圈就开始了。

天空晴朗，蓝得发白，空气之中充满了雪花的结晶味。鲁巴肖夫忘记带来毯子，身上发冷。里普·凡·温克尔肩上披着一条灰色旧毯子，那是他进院子时狱卒扔给他的。他在鲁巴肖夫身边沉默地走着，步子短而坚定，有时向他们头上的淡蓝色天空眨巴一下眼睛。灰毯子长可及膝，把他包起来象一口钟似的。鲁巴肖夫张望哪扇窗户是他的牢房的；它黑暗肮脏，同别的窗户一样，看不见里面什么东西。他看了402号窗户一会儿，但是看到的也只是黑黝黝的铁窗。402号不准参加锻炼，也没有带他去理发或检查身体。鲁巴肖夫从来没有听到过他给带出牢房。

他们慢慢地绕着院子无声走着。在灰白的胡茬

中间，里普·凡·温克尔的嘴唇蠕动是一点也看不出来的。他在自言自语，鲁巴肖夫开始听不懂。后来他发现那老头在哼“起来，你这人世间的可怜虫”的曲调。他肯定没有发疯，但是经过了七千昼夜的监禁，他显然有些古怪了。鲁巴肖夫从眼角看他，要想象一下二十年与世界隔绝是什么滋味。二十年前，汽车很少，形状古怪；没有无线电，今天政治领袖的名字大家都不知道。没有人预见到新的群众运动，重大的政治变革，也没有预见到道路的曲折，革命国家要经历的令人糊涂的各个阶段，当时大家以为乌托邦的大门已经洞开，人类已站在它的门口了……

鲁巴肖夫发现，他怎么想象也无法想象出他的邻居的思想状态，尽管他在“通过别人头脑进行思索”的艺术颇有实践经验。但是在伊凡诺夫身上，他不费什么力气就做到了，在第一号，或甚至在带单镜片的军官身上，也是这样。但是在里普·凡·温克尔身上，他失败了。他从眼角里看他，那老头正好向他转过头来，他正在微笑，双手捏紧了包在肩膀上的毯子，踩着短促的步子走在他身边，几乎不出声地在哼着“起来，你这人世间的可怜虫。”

他们被带回到监狱大楼里去的时候，老头在他的牢房门口又转过身来向鲁巴肖夫点一点头。他的

眼睛在眨巴时突然换了一种表情，恐惧，绝望。鲁巴肖夫以为他要向他叫出声来。但是狱卒已经推上了406号的门。鲁巴肖夫回到自己牢房以后，就马上到墙边去，但是里普·凡·温克尔没有出声，对他的敲墙没有答复。

而402号原来站在窗口看着他们，倒想要鲁巴肖夫告诉，他这次散步的一切情况，直至细节。鲁巴肖夫得告诉他空气里的气味，冷还是不太冷，在过道上有没有遇见别的犯人，有没有机会同里普·凡·温克尔交换一两句话。鲁巴肖夫耐心地回答了他的所有问题。与不能外出的402号比起来，他觉得自己是个特权人士，他为他感到难过，甚至有负疚感。

第二天和以后一天，鲁巴肖夫总是在早餐后同一时间给带出去散步的。在转圈的时候，里普·凡·温克尔总是他的同伴。他们并肩慢慢地转着圈，各人都用一条毯子裹身。两人都沉默不语。鲁巴肖夫陷于沉思之中，偶尔看一眼别的犯人或牢房的窗户，那老头胡须越长越长，带着孩子般的温和微笑，低声地哼着他那支百唱不厌的歌。

到他们第三次一起散步时，他们还没有交换过片言只语。尽管鲁巴肖夫看到警卫们并不严格执行

关于保持缄默的规定，转圈的其他成双成对的犯人几乎都在不停地交谈。他们眼光一本正经地看着前方，说话很少动嘴唇，这是鲁巴肖夫所熟悉的监狱中的技术。

第三天，鲁巴肖夫带了笔记本和铅笔。笔记本露出在他外衣左边口袋上。十分钟以后，老头注意到了，他的眼睛一亮。他偷偷地望了圈子中央的警卫一眼，他们正在热烈交谈，并不怎么注意犯人。于是他马上从鲁巴肖夫的口袋里抽出了铅笔和笔记本，在一口钟似的毯子的掩蔽下匆匆地写了几个字。他很快就写完了，撕下那一张，塞在鲁巴肖夫的手中，但是他没有还笔记本和笔，继续书写。鲁巴肖夫看到警卫没有在注意他们，就看那张纸。上面没有写什么字，只有一张图，画的是他们所在国家的地理草图，笔法十分准确。上面有主要的城市、山脉、河流，中间一面旗，上有革命的标志。

他们走了半圈，406号又撕下一张，塞在鲁巴肖夫的手里。这是同样的一张图，革命国家的地图。406号看着他，微笑地等待他的反应。鲁巴肖夫在他的注视下有点不自在，喃喃说了声表示赞赏的话。老头向他眨巴眼睛：

“我能闭着眼睛画，”他说。

鲁巴肖夫点一点头。

“你不相信我，”老头微笑说：“可我已练习了二十年。”

他很快地看了警卫一眼，闭上眼睛，步子一点也不放松，开始在毯子的遮掩下又画了一张。他的眼睛紧闭，下巴抬起，象一个瞎子。鲁巴肖夫担心地看一眼警卫，他担心老头会摔交或者走出行列。但还没有走上半圈，他就画完了，比其他几次稍为乱一些，但同样准确。只有国家中央的旗上标志大得不合比例。

“你现在相信我了吧？”406号低语，高兴地向他微笑。鲁巴肖夫点一点头。这时老头的脸沉了下来，鲁巴肖夫看出那是恐惧的表情，他每次关进监牢都有这种恐惧。

“没有办法，”他向鲁巴肖夫低语：“我给送错了火车。”

“你这是什么意思？”鲁巴肖夫问。

里普·凡·温克尔向他微笑，和蔼而悲哀。“我走的时候他们把我送错了火车站，”他说，“他们以为我没有注意到。别告诉别人我已知道了，”他低声说，眼睛向警卫那边眨巴一下。

鲁巴肖夫点一点头。不久就吹响了转圈结束的哨子。

经过大楼的门的时候，他们又有片刻无人注意

到。406号的眼睛又清晰又友好：

“也许你也遇到了同样的事？”他同情地问鲁巴肖夫。

鲁巴肖夫点一点头。

“我们不能放弃希望。我们终有一天会到那里的——”里普·凡·温克尔说，指一指鲁巴肖夫手中捏成一团的地图。

这时他把鲁巴肖夫的笔记本和铅笔塞回到鲁巴肖夫的口袋里。上楼梯时他又在哼他哼不厌的歌。

## 六

在伊凡诺夫规定的限期期满前一天，发晚饭的时候，鲁巴肖夫有一种感觉，空气中似乎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他说不清楚是为什么。食物是按常规分发的，悲怆的军号按规定时间吹响。但是鲁巴肖夫觉得空气有点紧张。也许是因为有个勤杂工看他一眼时表情比平时特别一些，也许是因为老狱卒的声音中有一种奇怪调子。鲁巴肖夫弄不清楚，但是他不能安心工作了。他感到自己的神经紧张起来，就象患关节炎的人预知风暴来临一样。

在熄灯号吹过以后，鲁巴肖夫从窥视孔中偷看外面的过道。由于电压低，电灯泡发的光不死不活的；过道里似乎比以前更加死寂。鲁巴肖夫躺倒在

铺上，又站了起来，强迫自己再写几行，撇灭了香烟，又点了一支。他看窗外的院子里：雪在化，又脏又软，天空阴沉。在对面，持步枪的哨兵在墙顶上来回走着。鲁巴肖夫再到窥视孔那里去看外面：寂静、荒凉、电灯光。

他违反一向的习惯，尽管时间很晚了，开始与402号交谈：“你睡了吗？”

有一阵子没有答复，鲁巴肖夫失望地等着。这时答复来了——比平常轻而慢。

“没有。你也感觉到了？”

“感觉到——什么？”鲁巴肖夫问。他呼吸很粗，躺在床上，用夹鼻眼镜敲墙。

402号又迟疑了一会儿。接着他轻轻地敲墙，仿佛是用一种很轻的声音说话似的。

“你最好还是睡觉吧……”

鲁巴肖夫躺在铺上，很不高兴，因为402号用这样倚老卖老的口气同他说话。他在黑暗中躺着，看着手中拿着要敲墙的夹鼻眼镜，外面如此沉寂，使他听到自己的耳鸣。突然墙上又传来了声音：

“奇怪——你马上感觉到了……”

“感觉什么？解释？”鲁巴肖夫坐了起来。

402号似乎在考虑。稍有犹豫后他敲道：

“今夜政治分歧要清算了……”

鲁巴肖夫明白了。他在黑暗中靠墙坐着，等待更多的消息。但402号不说了。过了一会儿，鲁巴肖夫敲道：

“处决？”

“是的，”402号简单地回答。

“你怎么知道的？”鲁巴肖夫问。

“从兔唇那里。”

“什么时候？”

“不知道。”过了一会儿：“很快。”

“知道名字吗？”鲁巴肖夫问。

“不，”402号回答。停了一会儿又敲：“你的同类。政治分歧。”

鲁巴肖夫又躺下等着。过了一会儿，他戴上眼镜，一只手支在脑后一动不动地躺着。外面听不到什么声音。监狱大楼里什么都停滞了，同黑暗冻结在一起了。

鲁巴肖夫从来没有看到过处决——除了有一次几乎看到了自己的处决。但那是在内战期间。他不能想象在正常情况下这种事情是怎样的，象例行公事一样。他隐约地知道，处决是在深夜的地窖里进行的，受刑者是在后脖上进一枪致死的。但其中细节他都不知道。在党内，死并不是一件什么神秘的事，没有浪漫味道。这是一种逻辑结果，大家都认



识这个因素，它具有有一种抽象的性质。死也是大家很少谈到的，从来不用“处决”这个字眼，常用的辞汇是“肉体清算。”这个字眼又只引起一个具体的想法：政治活动的停止。死亡这件事本身是个技术细节，引不起兴趣。死亡作为在逻辑方程式中的一个因数已经失去了任何身体上的特点。

鲁巴肖夫呆呆地望着黑暗。起诉已经开始了？还是尚在准备之中？他脱光了鞋袜，他的光脚丫在毯子另一头苍白地翘着。沉寂更加不自然了。这不是平常那种令人感到舒服的没有噪音的沉寂，这是一种吞噬一切声音和窒息一切声音的沉寂，象绷紧的鼓面那样震颤的沉寂。鲁巴肖夫看着自己的赤脚，慢慢地扭动脚拇指。看上去很古怪阴森，好象他的苍白的脚自己有生命似的。他格外具体地感到了自己的身体，感到毯子给他双腿带来的温暖，和他的手放在后脑的压力。“肉体清算”在哪儿执行？他隐约地觉得这一定是在下面执行，在理发室那边的楼梯下面。他闻到了格列金的手枪套子的皮革味，听到了他的制服窸窣作响。他对他要枪毙的人怎么说？“对着墙站好”？他有没有添上个“请”？还是说：“别忙。这不痛……”？也许他不加警告就开枪，在他们一边走的时候从背后开枪——不过被枪毙的人会不时回头瞧。也许他把手枪藏在衣袖里，象牙科

医生藏着钳子一样。也许还有别的人在场。他们是什么样子？那个人往前面倒还是往后面倒？他叫不叫出声？也许需要再补上一枪才能把他结果掉。

鲁巴肖夫抽着烟，看着他的脚丫子。周围是那么静，可以听到烟纸燃烧的嘶嘶声。他深深地抽了一口烟。胡思乱想，他对自己说。廉价小说。实际上，他从来不相信“肉体清算”的技术现实。死亡是个抽象，特别是自己的死亡。也许这已经结束了。过去的事情是没有现实性的。屋子里很黑很静。402号早已停止了敲墙。

他真希望外面有谁尖叫一下来撕破这不自然的沉寂。他用鼻子嗅一嗅，发现他鼻孔里已经有了阿洛娃的气味。甚至香烟也有她的气味；她的手提包里有一只皮制烟盒子，其中的每一支香烟都有她的香水味……沉寂继续着。只有他移动身子的时候，铺板才咯吱作响。

鲁巴肖夫正想起来再燃一支烟，这时墙又响了：“他们来了。”

鲁巴肖夫倾听着。他听到太阳穴里的血管中血液流过的脉冲，除此之外，没有听到别的。他等待着。沉寂加深了。他摘下夹鼻镜敲墙：“我没有听到什么……”

402号过了很久没有回答。突然他迅速大声地敲

道：

“380号。往下传。”

鲁巴肖夫马上坐了起来。他明白了：这消息是由380号的邻室难友通过一共十一间牢房传递过来的。在380到402之间的牢房里的囚徒在黑夜中和寂静中组成了传声的接力。他们被关在自己的牢房里，没有防御能力，但这却是他们的团结方式。鲁巴肖夫一跃而起，光着脚丫子啪哒到对面墙边，站在便桶旁边就向406号敲起墙来：

“请注意。380号就要枪决。往下传。”

他倾听着。便桶发臭；它的臭气已代替了阿洛娃的香气。没有回答。鲁巴肖夫又啪哒回到床边。这次他不是用夹鼻镜，而是用手指关节敲墙了：

“380号是谁？”

又没有回答。鲁巴肖夫猜想，402号象自己一样在他牢房的两道墙之间象钟摆一样来回奔跑。在他那一边的十一个牢房中，囚徒们都在无声地忙个不停，光着脚丫子在两道墙之间跑来跑去。如今402号又回到他这一边墙边，他宣布：

“他们在向他宣读判决书。传下去。”

鲁巴肖夫重复原来的问题：

“他是谁？”

但是402号又走开了。把消息传给里普·凡·温

克尔是没有用的，但是鲁巴肖夫还是啪哒啪哒到便桶一边，把消息敲墙传过去。他是出于一种模糊的责任感，不想让联络的锁链中断。便桶这么近，臭得他恶心。他又啪哒回床边等着。外面仍一点也没有动静。只是墙上继续在滴得地敲着：

“他在高叫呼救。”

“他在高叫呼救，”鲁巴肖夫传给406号。他倾听着。什么也听不到。鲁巴肖夫担心下次再到便桶旁边他就忍不住要吐了。

“他们正在把他带过来。叫喊、挣扎。传下去。”

“他叫什么名字？”鲁巴肖夫在402号结束之前马上问。这次他得到了一个答复：

“鲍格罗夫。反对派。传下去。”

鲁巴肖夫的双腿突然感到沉重了。他靠在墙上，向406号敲：

“米海依尔·鲍格罗夫，前波将金号战舰水兵，东方舰队司令，一等革命勋章获得者，如今被带去处决。”

他擦去额角上的冷汗，向便桶里呕吐，一边结束这次通讯：

“传下去。”

他已记不起鲍格罗夫的视觉形象，但他看到他魁梧体魄的轮廓，他的硕长的手臂，宽阔脸上的

雀斑，和微微上翘的鼻子。在1905年之后，他们在流放期间住在同屋。是鲁巴肖夫教他读书写字和一些基本历史观点的。从此之后，鲁巴肖夫不论到哪里，一年总两次收到一封手书的信，落款是：“您忠实至死直到坟墓的同志，鲍格罗夫。”

“他们来了，”402号匆忙地敲墙，声音很响，鲁巴肖夫站在便桶那边，头靠着那边墙，也可以隔着牢房听到身后面的墙。“请站在窥视孔前。打鼓。传下去。”

鲁巴肖夫身体僵住了。他把信息敲墙传给406号：“站在窥视孔前。打鼓。传下去。”他啪哒啪哒地走到牢房门前等着。一切如前，沉寂一片。

几秒钟内又传来了敲墙声：“来了。”

过道上传来了低低的、空洞的击鼓声。那不是拍墙或者敲墙的声音：而是380号到402号牢房里的囚徒站在他们牢房门后，象在黑暗中的一队仪仗队在门上敲出闷雷一般庄严的鼓声，形成了一条传声的锁链，从远处隆隆地传过来。鲁巴肖夫站在那里，眼睛紧贴窥视孔，双手有节奏地敲击铁门，参加了大家的齐奏。使他感到奇怪的是，闷雷一般的声浪传过了右边，传过了406号，一直传了过去。里普·凡·温克尔一定明白了；他也在击鼓。同时鲁巴肖夫听到他的左边，在他视野以外的远处，铁门给

推开了，沿着滑槽忽啦啦地响。他左边的鼓声比原来响了一些；鲁巴肖夫知道那扇把单独禁闭牢房和普通牢房隔开的铁门被打开了。一串钥匙叮当作响，如今铁门又关上了。他听到了脚步声在走近：左边的鼓声象波涛一样升高，逐渐加强。鲁巴肖夫的视野受到对面401到407的遮挡，仍然看不见什么。拖拉的脚步声临近了，如今他也能辨别出其中还夹杂着呻吟声，象一个孩子的哼唧。步伐加快了，左边的鼓声稍弱，右边的却加强了。

鲁巴肖夫敲着鼓。他逐渐失去了时空感，他只听到丛林鞞鼓一样的空洞敲击声。这很象是站在铁牢笼中的人猿，怒击他们的胸部发出的隆隆声。他把眼睛贴在窥视孔上，一边击鼓，一边有节奏地垫起脚跟。象刚才一样，他只看到过道上昏黄的灯光，除了401到407号的铁门，什么也看不到。但是鼓声又起，脚步声和呻吟声已近。突然，影子般的身子进了他的视野：他们来了。鲁巴肖夫停止击鼓，呆呆地看着。一秒钟后，他们过去了。

他在这几秒中看到的東西，此后牢牢地烙在鲁巴肖夫的记忆里。两个昏暗中看不太清楚的穿制服的人，身体魁梧，没有特色，从两边抓着一个人的夹肢窝，夹在他们中间拖过去。中间那个人软弱无力，但在他们的铁爪的掌握中，象玩偶娃娃一样，

身子僵硬。他的脸朝地，全身伸直，肚子朝下凸出，双脚拖在后面，鞋尖在地面上滑过去，造成了鲁巴肖夫原先从远处听到的吱吱声。白色长发从他脸上垂下来，他的嘴巴张着，汗滴挂在脸上，口沫流在下巴下面。当他们把他拖出鲁巴肖夫的视野，拖到过道右面一头时，呻吟和哼唧声慢慢消失了，听起来象远处传来的回声，只有三个元音：“U—A—O”。他们在过道尽头理发室旁拐弯之前，鲍格罗夫大声地叫了两声，这次鲁巴肖夫不仅听到了元音，而且也听到了整个字，这是他自己的名字，他听得很清楚：鲁—巴—肖—夫。

接着，就象有了一个信号似的，又是寂然无声了。电灯象往常一样开着，过道象往常一样阒无一人。只有406号的墙上在敲着：

“起来，你这人世间的可怜虫。”

鲁巴肖夫又回到床上躺下，不知道他是怎么回去的。他的耳中仍响着鼓声，但如今这沉寂是真正的沉寂，空虚，松弛。402号大概睡着了，鲍格罗夫，或者说昔日的鲍格罗夫的残骸，如今大概也已死了。

“鲁巴肖夫，鲁巴肖夫……”这最后的呼喊永久不可磨灭地烙在他的声觉的记忆里了。视觉的形象

不这么分明。现在他仍很难把在那几秒钟之内拖过他视野的那个汗流满面、双腿挺直的玩偶娃娃般的人体与鲍格罗夫等同起来。只有到现在，他才想起了那白发。他们对鲍格罗夫干了什么？他们对这个强悍的海军军人干了什么，使他从喉咙里发出孩子般的呻吟？阿洛娃在被拖过去时也曾发出这样的呻吟吗？

鲁巴肖夫坐了起来，前额靠着402号那边的墙，他担心又要恶心呕吐。到现在为止，他还没有想象过阿洛娃的死的这样的细节。在他的心目中，这是一件抽象的事。这使他有一种极为不安的感觉，但他从来没有怀疑过他自己行为的逻辑正确性。现在，他感到反胃，额上汗如雨下，在这种恶心状态下，他过去的思维方式似乎荒谬之极。鲍格罗夫的呻吟打破了逻辑方程式的平衡。到现在为止，阿洛娃是这个方程式中的一个因素，从这个方程式所涉及的意义来说，这是一个很小的因素。但这个方程式不再成立了。阿洛娃的穿着高跟鞋的脚给拖过过道的图景打破了数学平衡。不重要的因素增长到了不可衡量的程度，绝对的程度。鲍格罗夫的呻吟，叫呼他的名字时那不象人的声音，空洞的击鼓声，在他耳边响着，窒息了微弱的理性的声音，就象浪花盖过了将要淹死的人的喉咙的格格声一样，盖过了理性



的声音。

鲁巴肖夫筋疲力尽，这样坐着就睡着了，他的头靠在墙上，夹鼻眼镜仍在鼻上，眼睛却已闭上了。

## 七

他在睡梦中呻吟。他第一次被捕的梦境又回来了。他的手无力地垂在床边，找睡袍的袖子。他等待对他的打击，但没有打击下来。

相反，他醒了过来，因为他牢房里的电灯突然亮了。有个人站在他床前，看着他。鲁巴肖夫睡了还不到一刻钟，但是在做过了那个梦以后，他需要好几分钟才能神志清醒过来。他对亮光眨巴着眼睛，他的脑子吃力地作着种种习惯的假设，好象这是一件下意识的惯性动作。他是在牢房里，但在不是敌人的国家——那只是梦境。因此他是自由的——但床头没有第一号的彩色肖像，那边还有一只便桶。而且还有伊凡诺夫站在他的床边，对着他的脸吐烟。难道这也是梦境？不，伊凡诺夫是真实的，便桶是真实的。他是在自己的国家内，但它已变成了一个敌人的国家。而且伊凡诺夫原本是他的朋友，如今也成了敌人。而且阿洛娃的呻吟也不是梦境。不，不是阿洛娃，是鲍格罗夫，象蜡制玩偶般给拖了过

去。鲍格罗夫同志，忠实至死，直到坟墓。他叫出了他的名字。这不是梦。另一方面，阿洛娃说过：“你愿意怎么样待我都行……”

“你不好过？”伊凡诺夫问。

鲁巴肖夫因灯光耀眼，向他眨着眼睛：“把睡袍给我，”他说。

伊凡诺夫看着他。鲁巴肖夫右边的脸肿了。“你想喝些白兰地吗？”伊凡诺夫问。他不待鲁巴肖夫答复就回到窥视孔前向过道里叫喊什么。鲁巴肖夫眨巴着眼睛，眼光跟着他。他仍感到头昏目眩。他已醒了，但他看、听、想都象是在五里雾中。

“你也被捕了吗？”他问。

“没有，”伊凡诺夫安详地说：“我是来看你的，你象是发烧了。”

“给我一支烟，”鲁巴肖夫说。他深深地吸了一、两口，视力清楚了一些。他又躺了下去吸烟，眼睛看着天花板。牢门打开了，狱卒送来了一瓶白兰地和一只玻璃杯。这次不是那个老狱卒，而是一个穿制服的瘦削青年，戴银丝眼镜。他向伊凡诺夫敬了礼，把酒和酒杯递给他，出去时又把门关上。可以听到他的脚步在过道上走远的声音。

伊凡诺夫在鲁巴肖夫的床边坐下，往杯中倒了酒。“喝罢，”他说。鲁巴肖夫一饮而尽。他脑中的

雾消散了。事件和人物——他的第一次和第二次监禁，阿洛娃，鲍格罗夫，伊凡诺夫——都在时空中各就各位。

“你哪儿痛吗？”伊凡诺夫问。

“不痛，”鲁巴肖夫说。他唯一不解的事是伊凡诺夫在他的牢房中干什么。

“你的脸颊很肿。你可能有烧。”

鲁巴肖夫从床上下来，从窥视孔往外望，过道里是空的，他又在牢房里来回踱了几步，头脑才清醒了。然后他在伊凡诺夫前面停步，后者坐在铺上，耐心地吐烟圈。

“你在这里干什么？”他问。

“我想同你谈话，”伊凡诺夫说：“躺下来，再喝几口白兰地。”

鲁巴肖夫在夹鼻眼镜后讽刺地向他眨巴眼睛。“到现在为止，”他说：“我一直想相信你是出于诚意。如今我看透了，你是个王八蛋。滚出去。”

伊凡诺夫不动。“请你讲讲这么说的理由，”他说。

鲁巴肖夫身子靠在406号那一边墙上，看着伊凡诺夫。伊凡诺夫继续安详地抽烟。

“第一，”鲁巴肖夫说。“你知道我同鲍格罗夫的友谊。因此你让鲍格罗夫——其实已给你们折磨得

不成人样了——在送去处死以前带过我的牢房前面，作为一个警告。为了使我不至错过这一场面，你们有意在事前宣布鲍格罗夫的处决，使得这消息能够通过我的邻室难友敲墙告诉我，结果果然如此。炮制这一切的监制人更巧妙的一着是让鲍格罗夫知道我在这里，就在他被拖出去之前，这又是假定这最后的震惊能使他吐几句让人听得见的话。这也做到了。这整个安排是为了使我处于消沉颓唐状态。在这最黑暗的时刻，伊凡诺夫同志象救星一样出现了，腋下还带着一瓶白兰地。在感人的和解的场面以后，我们投入相互的怀抱，交换了战时的记忆，附带地签了我的口供。随后犯人昏昏入睡，伊凡诺夫同志蹑手蹑脚地离去，口袋里装着口供，几天之后得到了提升……现在你滚出去吧。”

伊凡诺夫不动。他把烟吐入空中，微笑着，露出了一口金牙。“你真的以为我有这样原始的头脑？”他问：“或者，更确切地说，你真的以为我是那样蹩脚的心理学家？”

鲁巴肖夫耸耸肩。“你的诡计叫我恶心，”他说：“我没法撵你出去。如果你还有一丝一毫的羞耻心，请你马上离开我。你无法想象你叫我有恶多恶心。”

伊凡诺夫从地上提起酒瓶，斟了一杯酒喝了。“我向你提出如下协议，”他说：“你让我讲五分钟的

话，不打破我，用清醒的头脑，听我说。要是在这以后你仍要我走，我就走。”

“我听着，”鲁巴肖夫说。他靠在伊凡诺夫对面的墙上站着，看一眼手表。

“首先，”伊凡诺夫说：“为了消除你可能有的任何怀疑或幻想，我想告诉你鲍格罗夫的确已被枪决了。其次，他在牢里关了好几个月，最后几天受到了拷打。如果你在公开审讯时提到这一点，或者甚至敲墙告诉你的邻居，那我就完了。至于为什么那样对待鲍格罗夫，咱们以后再说。第三，把他带过你的牢房的确是有意的，告诉他你在这里也是有意的。第四，你叫做卑鄙的诡计不是我安排的，而是我的同事格列金违背我的明确的指示安排的。”

他停了一下。鲁巴肖夫靠墙站着不说话。

“我是决不会犯这种错误的，”伊凡诺夫继续说：“这不是因为我尊重你的感情，而是由于这违反我的策略，违反我对你心理的了解。你最近表现了一种人道主义原则和其他类似情感的倾向。此外，阿洛娃的故事仍在你的心中。鲍格罗夫的形象一定只有加强你的消沉和道德倾向——这是可以预见的。只有象格列金那样的心理学外行才会犯这种错误。格列金在过去十天里一直在我身边灌输我们应该对你采取“硬办法”。例如，他不喜欢你，是因为你给他

看到了你袜子上的破洞。另外，他对付惯了农民……鲍格罗夫的事就解释到这里。当然，白兰地是我要来的，这是因为我进来时你的神志还不十分清醒。把你灌醉不是我的用意。让你在精神上受到刺激也不是我的用意。这只有使你更加趋于道德升华。我需要你保持清醒和理性。我唯一的意图是你应该能够冷静思考你的案件，得出一个结论。因为，如果你能把整个事情思考出一个结论——那时，只有那时，你才会屈服……”

鲁巴肖夫耸一耸肩。但他还没有来得及说什么，伊凡诺夫又插进来：

“我知道你相信自己决不会屈服。我只要你回答一个问题：如果你相信屈服的逻辑的必要性和客观的正确性——你会屈服吗？”

鲁巴肖夫没有马上回答。他模糊地感到谈话有了一种他不应该让它发生的转折。五分钟过去了，他没有把伊凡诺夫撵出去。在他看来，仅仅这一点也是背叛了鲍格罗夫——背叛了阿洛娃；背叛了理查德和小洛埃。

“走吧，”他对伊凡诺夫说：“这没有用。”他如今才发现自己在伊凡诺夫前面在牢房里来回踱步已有相当时候了。

伊凡诺夫坐在床边。“从你谈话的声调，我可以

看出，”他说：“你已经认识到你关于我在鲍格罗夫事情上的看法是错误的。那末你为什么还要我走呢？你为什么不回答我提的问题？”他向前一点儿，揶揄地看着鲁巴肖夫，然后他慢慢地说，强调每一个字：“因为你怕我。因为我的思想方法和辩论方式就是你的方法，你是害怕自己头脑起了共鸣。一会儿你就会叫出来：站到我的背后来，撒旦……”

鲁巴肖夫没有回答。他在伊凡诺夫面前来回踱步。他感到无能为力，想不出清楚的论点。他的负疚感——伊凡诺夫称为“道德升华”，无法用逻辑公式表达出来，它属于“语法虚构”的领域。同时，伊凡诺夫说的每句话的确在他心中引起了共鸣。他想他不应该给拖进这场谈话的。他觉得自己好象是在一个光滑的斜面上不可抗拒地往下滑。

“来吧，撒旦！”伊凡诺夫重复说，又给自己倒了一杯。“在从前，诱惑是肉欲上的。如今采取了纯粹理性的形式。价值观改变了。我倒想写一个宗教受难剧，其中上帝和魔鬼争夺圣徒鲁巴肖夫的灵魂。过了一辈子有罪的生活，他转向上帝——那个有着工业自由主义和救世军施粥站的双下巴的上帝。而撒旦却是个瘦削的、禁欲的、狂热的逻辑迷。他读马基亚维利、罗耀拉的伊格纳修斯、马克思和黑格尔；他对人类是冷酷的，无情的，这是出诸于一种

数学上的同情慈悲。他注定要做他最不愿做的事：做屠夫，目的是取消屠宰，牺牲羊羔，目的是为了不再有羊羔受到屠宰，用鞭子抽打人，目的是为了让他们知道不要再受鞭打，以更高原则的名义使自己丧尽一切原则，向仇视人类的情绪挑战，因为他爱人类这是一种抽象的几何学的爱。来吧，撒旦！鲁巴肖夫同志愿意做个殉难者。自由派的报纸的专栏作家恨了他一辈子，如今要在他死后把他神圣化。他发现了良心，这个良心使他象一个双下巴一样不适宜于革命。良心象癌细胞一样噬食脑子，一直到全部灰细胞给吃光。撒旦给打败，后撤了——但是不要以为他在愤怒中咬牙切齿。他耸耸肩膀。他是瘦削、禁欲的。他看到过许多人软化了，用冠冕堂皇的口实，退出了他的队伍……”

伊凡诺夫停了下来，又为自己倒了一杯白兰地。鲁巴肖夫在窗户前面来回踱步。过一会儿他说：

“你们为什么处决鲍格罗夫？”

“为什么？是因为潜水艇问题，”伊凡诺夫说。“这牵涉到吨位问题——一场很老的争论，你应该知道它的由来。”

“鲍格罗夫主张建造大吨位、远航程的潜水艇。党主张小吨位、近距离。同样的钱，可以造比大潜水艇多三倍的小潜水艇。双方在技术上都有言之有



理的论据。专家们大肆宣扬地展出了技术草图和代数公式。但实际问题是在另外一个不同的领域里。大潜水艇意味着：侵略政策，促进世界革命。小潜水艇意味着：海岸防御——这就是说，自卫和推迟世界革命。后者是第一号和党的观点。

“鲍格罗夫在海军部和元老派军官里面有很大的势力。把他处置掉还不够，还得把他弄得声誉扫地。本来要开庭揭露大吨位派是奸细和卖国贼。我们已经把几个小工程师弄来，他们快要愿意公开招认我们要他们招认什么就招认什么。但是鲍格罗夫不愿合作。他到最后还是主张大吨位和世界革命。他落后于时代二十年。他不了解时间对我们不利，欧洲正在经历反动阶段，我们正处在大浪的间歇，我们必须等待到下一次大浪把我们冲起。举行公开审讯，他只会在人民中间制造混乱。除了采取行政手段把他清算之外，没有别的办法。要是你处在我们的地位，你不是也会做同样的事吗？”

鲁巴肖夫没有回答。他停止踱步，仍靠在便桶旁边406号那边墙上。便桶发出一股恶臭。他取下来夹鼻眼镜，他的眼眶发红的眼睛看着伊凡诺夫。

“你没有听到他的呻吟。”他说。

伊凡诺夫用烟头又接着燃了一支烟。他也发现便桶的恶臭熏人。

“不，”他说：“我没有听到。但我听到过，看到过同样的事。那怎么样？”

鲁巴肖夫沉默不语。要想解释是没有用的。呻吟声和闪雷般的鼓声又在耳边响起，象回声一样。很难表示。阿洛娃温热的胸脯上翘起的乳头也是如此。你无法表示。“默默地去死”，这是理发员给他的条子上的话。

“那怎么样？”伊凡诺夫重复说。他伸一伸腿等待着。没有等到答复，他又说下去：

“要是我对你还有一点怜悯心，”他说：“我现在就放下你不管了。但是我没有一点怜悯心。我喝酒；有一段时间，你也知道，我吸毒；但是怜悯心这个毛病，我至今总算给躲开了。只要有一点点，你就完了。为了人类而哭泣，为了自己而哭泣——你知道我们的民族特别有这种病态倾向。我们的最伟大诗人就因这种毒素毁了自己。到四十、五十岁以前，他们是革命者，后来却受到了怜悯心的毒害，而全世界都宣称他们是圣人。你似乎也有同样的雄心，相信这是个人的事，属于你自己，某种空前未有的事……”他的声音高了起来，吐了一口烟。“留神这种幸福感，”他说：“每瓶酒都有一定数量的幸福感。不幸的是，只有很少的人，特别是在我们同胞中间，认识到谦恭和受苦的幸福感象化学制造成的一样廉

价。我麻醉以后醒来的时候，发现我的身体到左膝盖为止了，我也有了一种不幸的绝对幸福感。你还记得那时你给我们上的课吗？”他倒了一杯，一饮而尽。

“我的意思是，”他说：“我们不要把世界看做是一种感情的形而上学的妓院。这是我们的第一条戒律。同情、良心、憎恶、绝望、悔恨、赎罪对我们来说都是令人厌恶的放纵。坐下来受到自己肚脐的催眠，或者抬起眼睛来，把自己的后脑勺谦恭地交给格列金的手枪支配——这是个简易的解决办法。我们这种人最大的诱惑是：放弃暴力、追悔、求得自己良心的平安。大多数伟大的革命家都在这一诱惑面前屈服了，从斯巴达克斯到丹东和陀思妥也夫斯基。他们是背叛事业的典型形式。上帝的诱惑对人类来说总是比撒旦的诱惑更危险。只要世界上存在着混乱，上帝就是个时代错误。同自己良心的任何妥协都是背叛。当不幸者的内心声音向你说话的时候，举手堵住你的耳朵……”

他去摸身后的酒瓶，又倒了一杯。鲁巴肖夫看到酒瓶已空了一半。你也可以借酒麻醉一下，他想。

“历史上最大的罪犯，”伊凡诺夫继续说：“不是

尼禄和富歇<sup>①</sup>那种类型，而是甘地和托尔斯泰那种类型。阻止印度的解放，甘地的内心声音比英国的大炮起的作用还要大。为了三十块银币出卖自己是一桩诚实的买卖。但把自己卖给自己的良心，那是丢弃人类。历史是不讲什么道德不道德的，它没有良心。要按照主日学校的教导指导历史意味着让什么东西都按照它本来面目。你同我一样明白这一点。你知道这件事所牵涉到的是什么，而你却来说什么鲍格罗夫的呻吟……”

他喝干了杯中的酒又说：

“或者是因为你的胖阿洛娃而受到良心的刺激。”

鲁巴肖夫以前就知道，伊凡诺夫很有耐心。你发觉不出他的行为有什么变化，除了讲话口气比平时更强调了一些。鲁巴肖夫想，你确实需要安慰，也许甚于我的需要。他在伊凡诺夫前面的凳子上坐下听着。这一切对他来说都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他用同样或者类似的话已为同样的观点辩护了多年。不同的是，在那时他把伊凡诺夫这么轻蔑地谈到的内省过程看作是一种抽象；从此之后，他经历

---

<sup>①</sup> 尼禄(37—68)，古罗马暴君。

约瑟夫·富歇(1759—1820)。法大革命时期警察头子，政治投机派。

了“语法虚构”，这是他自己身体里的肉体现实。但是如果说这种非理性的过程比较容易接受的话，这仅仅是因为他如今同这过程有了个人交往？是不是这就没有多大必要同“神秘的陶醉”斗争，仅仅因为你受到了它的陶醉？一年之前，他把阿洛娃送去处死，他当时没有足够的想象力来设想处决的细节。他如今是不是会采取了不同的态度仅仅因为他知道了处决的一些情况？牺牲理查德、阿洛娃、小洛埃，要么是对的，要么是错的。但是理查德的口吃、阿洛娃的胸脯形态、或者鲍格罗夫的呻吟同这措施的客观正确性或错误性又有什么关系呢？

鲁巴肖夫又开始在牢房里来回踱起步来。他觉得他被捕以后所经历的一切都只是前奏曲。他的思考把他引进了一个死胡同——引导到了伊凡诺夫称之为“形而上学的妓院”的门口上，他如今得重头来过。但是还剩下多少时间呢？他停下步来，从伊凡诺夫手中拿过酒杯来喝干。伊凡诺夫看着他。

“那样好一些，”他笑一笑说：“以对话形式进行独白是一种有用的办法。我希望我有效地仿造了诱惑者的声音。可惜的是对手不在场。但这是诡计的一部分，它从来不让自己被拖入理性的讨论。它总是在对方毫无防御的时候攻击对方，在他单独的时候。在某种有效的自然环境之中，从燃烧的灌木丛

中，从云雾弥漫的山顶上，而且特别喜欢对方是个睡着的人。这个伟大的道德家的方法是相当不公平的和戏剧化的……”

鲁巴肖夫已不在听他的了。他一边来回踱步，一边在想，要是在今天阿洛娃还活着，他会不会再牺牲她。这个问题使他着迷，这似乎包含了对所有问题的答案……他在伊凡诺夫面前站住问他：

“你记得‘拉斯科尔尼科夫’吗？”

伊凡诺夫讽刺地看着他。“早就预料到迟早你会提出这个问题的。《罪与罚》……你真是变得孩子气了，或者老糊涂了……”

“等一等。等一等，”鲁巴肖夫说，激动地来回踱步。“所有这一切都是空谈，现在我们比较接近问题的所在了。据我记得，问题是，学生拉斯科尔尼科夫有没有权利杀死那个老妇人？他年轻有才华，就象远大前程仿佛是他囊中之物一样；而她却是个年纪衰老，对世界没有用处的人。但是方程式不能成立。首先，客观情况迫使他杀了另外一个人，这是一个表面简单的和逻辑的行动所产生的不可预见和不合逻辑的后果。其次，方程式反正是要垮台的，因为拉斯科尔尼科夫发现，在数学单位是人的时候，二乘二不是四……”

“真的，”伊凡诺夫说：“如果你要听我的意见，

每本书都应该烧掉。请考虑一下，如果我们按字面来了解这种人道主义的模糊哲学，如果我们坚持认为个人是神圣的，我们不能按照算术的规则来对待人类，这种哲学会导向何方？这会意味着，一个营长为了挽救本团而不能牺牲侦察队。意味着我们不能牺牲鲍格罗夫那样的笨蛋，而冒我国沿海城市在一两年之内遭到炮轰毁灭的风险……”

鲁巴肖夫摇着他的脑袋：

“你的例子都引自战争中——这就是说，引自不正常状态。”

“自从发明蒸气机以来，”伊凡诺夫说：“世界就一直处于不正常状态。战争和革命不过是这种不正常状态的看得见的表现。但是，你的拉斯科尔尼科夫是个傻瓜和罪犯。这不是因为他杀死老妇人的行为是合乎逻辑的，而是因为他为了个人利益而这样做的。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这一原则仍是政治伦理中的唯一法则。所有其他的东​​西都是模糊的空谈，在你手指缝里会化掉的……如果拉斯科尔尼科夫在党的命令下干掉老妇人，例如，为了增加罢工经费，或者创办一张非法报纸——那么方程式就可成立，这部小说以及它的令人误解的问题就根本不会写出来，对人类来说那就只有更好。”

鲁巴肖夫没有回答。他仍在想着那个问题：在

今天，在有了过去几个月和几天的经历以后，他是否仍会把阿洛娃去送死。他不知道。从逻辑上来说，伊凡诺夫说的一切都是对的。看不见的对手保持着缄默，只有用迟钝的不安感觉，表示了它的存在。而且在这一点上，伊凡诺夫也是对的，那就是，这个“看不见的对手”从来不参与辩论，只在人家没有防备的时候发动攻击，这种行为使它极为可疑……

“我不赞成把各种意识形态混淆起来，”伊凡诺夫继续说：“人的伦理观念只有两种，它们处于两个相反的极端。一个是基督教的和人道的，它宣布个人神圣，并且声称算术的规则不适用于人的单位。另一个从这样一个基本原则出发，那就是，为了一个集体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不仅允许，而且要求，个人在各方面从属于和牺牲于社会——社会可以把他当作一只试验用的兔子或者牺牲用的羔羊一样处理掉。前一种观念可以叫做反活体解剖道德观，第二种，是活体解剖道德观。骗子和外行总是企图混淆这两种观念，在实践上，这是不可能的。不论是谁，凡是拥有权力和负有责任的人，都会一开始就发现，他必须两者选一，而且他是命中注定要选择第二种的。自从基督教成为国教以来，有哪一个国家真正执行基督教的政策？你能够举出一个例子来吗？你举不出一个。在需要的时候——而政治是



长期处于需要的时候的——统治者总是能够以‘情况特殊’为由，要求采取特殊的防卫措施。自从有国家和阶级以来，他们生活在一种永久的互相防卫状态，迫使他们把人道主义的实践推迟到另外一个时候……”

鲁巴肖夫看向窗外。融化掉的雪又结了冰，闪闪发光，这是一种黄白色水晶体的不规则表面。墙顶上的哨兵背着枪在来回踱步。天空晴朗，但没有月亮。在机关炮楼上，银河一泻千里。

鲁巴肖夫耸耸肩。“承认，”他说：“人道主义和政治，对个人的尊重和社会进步，是互相不能容忍的。承认甘地是印度的灾难。承认在选择手段上守身如玉会导致政治上的无能。在负的方面，我们是一致的。但是请看，别的选择已引导我们……”

“很好，你说吧。”伊凡诺夫说：“到哪里？”

鲁巴肖夫在衣袖上擦一擦夹鼻眼镜，近视地看着他。“多么糟糕，”他说：“我们把我们的黄金时代弄得多么糟糕。”

伊凡诺夫微笑了：“也许，”他高兴地说：“请看葛拉基兄弟<sup>①</sup>和圣-约斯特和巴黎公社。到现在为止，所有的革命都是讲道德的外行干的。他们总是

---

<sup>①</sup> 葛拉基兄弟(分别死于公元前133和121年)，罗马政治改革家。

有诚意，但是败在外行。我们第一次是讲结果的……”

“是啊，”鲁巴肖夫说：“这么讲结果，为了公平分配土地，我们有意在一年之内让五百万农民和他们的家属饿死。在把人类从工业剥削的桎梏下解放出来时，我们把一千万人送到北极圈和东方丛林中去强迫劳动，其条件与古代划艇奴隶的条件相似。为了解决意见分歧，我们只知道一个论据：死亡，不论这是潜艇问题，肥料问题，还是党在印度支那的政策问题。我们的工程师一边工作一边时刻意识到，在计算上的一个错误，可能送他们进监狱或断头台。我们政府机关中的高级官员可以随便毁了下属，因为他们知道，稍有差错，唯他们是问，他们自己也有给毁掉的危险。我们的诗人解决风格问题的讨论的方法是向国家警察告密，因为表现主义派认为自然主义派的风格是反革命的，反过来也是如此。为了未来一代的利益，我们对现在一代进行这么可怕的剥夺，以至他们的寿命缩短了四分之一，这也是在行动上讲结果。为了保卫国家的存在，我们得采取特殊措施，规定过渡时期法律，这些法律不论在哪一方面都是同革命目标相违背的。人民的生活水准比革命前要低，劳动条件要差，纪律更不讲人情，计件苦活比殖民国家对待土著苦力还差，我们

的两性关系法律比英国的还要古板，我们的领袖崇拜比反动独裁政权还要拜占庭式。我们的报纸学校都提倡沙文主义，军国主义，教条主义，盲目服从和愚昧无知。政府的专断权力是无限的，是历史上没有先例的。新闻自由，舆论自由，迁移自由被彻底取缔，好象从来没有过人权宣言似的。我们建设了最庞大的警察机器，告密成了全国性的制度，肉体和精神苦刑拷打成了最先进的科学方法。我们鞭策全国呻吟中的民众驱向一个理论上幸福的将来，这只有我们才能看到。因为这一代的精力已经耗尽，这些精力已消耗在革命中。因为这一代已精疲力尽，流血过多，留下的只有一堆用作牺牲的、呻吟的、麻木不仁的肉……这就是我们讲结果所造成的结果。你叫它是活体解剖道德观。在我看来这有时仿佛是试验者剥去受害者的皮，让它把组织、肌肉、神经等暴露在外面……”

“那又怎么样呢？”伊凡诺夫高兴地说：“你不觉得这很好吗？历史上发生过比这更好的事吗？我们把人类的旧皮剥掉，让它长上新皮。这不是神经衰弱的人能做的工作。但是以前曾经有个时期，曾使你热情饱满。是什么东西改变了你，使你现在象老姑娘似的吹毛求疵？”

鲁巴肖夫想回答：“自从那时以后我听到鲍格罗

夫叫喊我的名字。”但是他知道这个答复没有意义。

因此他另外回答：

“仍旧用同一隐喻：我看到这一代人的剥了皮的肉体，但我没有见到新皮的影子。我们都认为，你能够象作物理试验一样对待历史。不同的是，在物理学中，你可以上千次地作同一试验，但在历史中只能作一次。丹东和圣-约斯特只能送上断头台一次，要是将来证明大潜水艇方案是正确的，鲍格罗夫却不能再生了。”

“那末后来呢？”伊凡诺夫问：“我们是不是应该袖手旁观，因为一件行动的后果总是很难预料，因此一切行动都是坏的？我们用我们的脑袋担保了每一个行动——你还能要求我们什么？任何一个白痴将军都能够把成千上万的活人身体当试验，如果他错了，他至多退休而已。反动和反革命力量没有原则或伦理问题。很难想象苏拉，或加利费，或哥尔楚克<sup>①</sup>阅读拉斯科尔尼科夫。象你这样的怪鸟只有在革命的树林里才能找到。至于别人，那就容易多了……”

---

① 苏拉(公元前138—78)，罗马将军，参议院保守派领袖。在内战中曾屠杀8千战俘。

加利费(生卒年月不详)

哥尔楚克(1874—1920)，帝俄海军将领，革命后在西伯利亚叛乱。

他看了一下手表。牢房的窗户显露了一些灰色；破玻璃上糊的那张报纸在晨风中给吹鼓了，窸窣作响。对面的墙顶上，哨兵仍在来回踱步。

“对于一个有你这样经历的人，”伊凡诺夫继续说：“这种对试验突然产生厌恶是很天真的。每年都有好几百万人因为瘟疫和其他自然灾害而无缘无故地死去，我们不应该为历史上最有希望的试验牺牲一、二十万人？且不谈成批成批由于营养不良和肺结核而在煤田、银矿、稻田、棉花种植园中死去的人。没有人对之加以注意，没有人问为什么，但是如果我们在这里枪毙几千个客观上有害的人，全世界的人道主义者就满嘴吐沫地叫喊起来。是的，我们消灭了农民中的寄生部分，让他们饿死。这是一种外科手术，总是非动不可的。但在革命以前的好时光里，随便哪个饥荒之年就有同样数目的人死去，只是毫无意义、毫无目标的。中国黄河水灾的牺牲者有时达好几十万。大自然在对人类进行无意义的试验时，手面是很大的。为什么人类不能对自己进行试验？”

他停了下来。鲁巴肖夫没有回答。他继续说：

“你有没有看到反活体解剖协会的宣传品？它们真是令人震惊、心碎。当你读到有些野狗的肝被摘除时一边汪汪叫，一边舔动刀的人的手，你也会象

今天晚上这样感到恶心要吐。但是如果这些人的主张得逞的话，我们今天就不会有防治霍乱、伤寒或白喉的疫苗了……”

他喝干了瓶中的剩酒，打了一口呵欠，伸一伸脚，站了起来。他一拐一拐地走到窗前的鲁巴肖夫那里，向外望去。

“天快亮了，”他说：“别犯傻，鲁巴肖夫。我今天晚上说的一切都是基本知识，你同我一样明白。你原来处在精神消沉的状态，如今已过去了。”他在窗前站在鲁巴肖夫旁边，一只胳膊搂着鲁巴肖夫。他的声音十分温柔。“现在去睡一觉吧，老伙计。明天就到期了，我们俩都需要清醒的头脑来炮制你的口供。别耸肩膀——你自己至少已有一半相信你会签字的。如果你否认，这不过是道德上的怯懦。道德上的怯懦曾经使不少人殉难。”

鲁巴肖夫向窗外看灰色的曙光。哨兵正在向右转。在机关炮楼上，天空是淡灰色的，有一点点发红。“我会再考虑一遍的，”鲁巴肖夫过一会儿说。

客人走后门关上时，鲁巴肖夫知道他已经屈服了一半。他投身到床上，筋疲力尽，但仍奇怪地松了一口气。他感到全身空虚，被吸得干干的，同时又觉得卸下了重压。鲍格罗夫的病态的呼吁在他的记忆中已失去了一些声觉上的尖锐。要是你对活人

抱信心，而不是对死人抱信心，谁能说这是背叛呢？

鲁巴肖夫安静地睡了一觉，没有做梦，牙痛也好一些了。伊凡诺夫在回到自己的屋子去时，顺路去见了格列金。格列金全副制服坐在桌后在处理档案。他多年来有了每星期通宵工作三、四次的习惯。伊凡诺夫进来时，格列金站起立正。

“算了，”伊凡诺夫说：“明天他会签字。但是我费了好大劲才补救了你干的蠢事。”

格列金没有回答，他僵直地站在桌后。伊凡诺夫记起了他在去鲁巴肖夫牢房前与格列金的争论，知道格列金是轻易不会忘记对他的申斥的，便耸耸肩，向他吐一口烟。“别傻了，”他说：“你仍耿耿于怀。处在他的地位，你会更顽固。”

“我有脊梁骨，而他没有，”格列金说。

“但你是个傻瓜，”伊凡诺夫说：“为了刚才那个答复，你应该在他之前给枪毙掉。”

他走到门外，把门砰的关上了。

格列金又坐下来。他不相信伊凡诺夫会成功，同时他又怕他成功。伊凡诺夫最后一句话听起来象是威胁，谁都弄不清他是开玩笑还是认真的。也许他自己也不知道——象所有那些知识分子犬儒派那

样……

格列金耸耸肩，把领口和袖口弄整齐，又继续在那堆文件上工作起来。



## 第三次提审

有时，言语必须用来掩饰事实。但这必须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的，那就是没有人发觉，或者，如果有人注意到的话，也要有现成的借口，可以马上提出来。

马基亚维利写给拉菲洛·吉罗拉米的指示

你们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再多说便是出于那邪恶者。

《马太福音》，第37节

—

尼·萨·鲁巴肖夫人狱第20天日记的摘录：

“……弗拉吉米尔·鲍格罗夫已从秋

千上掉了下来。一百五十年以前，攻打巴士底监狱的那一天，欧洲长期静止不动的秋千这时又动起来了。它有力地<sup>！</sup>从暴政那里推开来，显然是用无限的动力，荡向自由的蓝天。一百年来，它起荡愈高，荡到了自由主义和民主政治的领域。但是，看啊，它的速度逐渐地放慢了，秋千已到了它的最高处和折回点了。接着，在暂停一刹那之后，它又向回荡了，速度越来越快。它的动力就象当初向上荡的动力一样，秋千把它的乘客从自由又带回到了暴政。凡是向上凝视而没有拽住的，都头晕目眩，掉了下来。

“不论是谁，若要避免头晕，必须设法找出秋千的运动规律。我们似乎面临着历史上的一个摇摆运动，从绝对专制摇摆到民主政治，从民主政治又摇摆回到绝对独裁。

“一国人民必须获得和保持的个人自由量视其政治成熟的程度而定。上述钟摆运动似乎表明群众的政治成熟并不是不断上

升的，象一个人的成长那样，而受制于更加复杂的规律。

“群众的成熟在于他们有能力认识自己的利益。但是，这就必须有个先决条件，那就是对生产过程和产品分配有一定的了解。因此一国人民民主自治的能力与其对整个社会的结构和运行的了解程度成正比。

“如今，每一个技术上的改进都对经济机器造成一种新的复杂性，引起新的因素和关系的出现，这是群众一时所不能透彻理解的。技术进步的每一跳跃都把群众的相对智力发展摔在后面一步，这就造成政治成熟温度表的下降。有时需要几十年，有时需要好几代，才能使一国人民的理解水平逐步适应情况的变化，一直到最后恢复以前在较低文明阶段已掌握的组织能力。因此，群众政治成熟是不能用一种绝对数字来衡量的，只能是相对的，即同当时文明阶段作比较。

“只有群众觉悟水平赶上客观状态时，

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民主政体的胜利，或者是和平地，或者是用武力。直到下一次技术发明的跳跃——例如发明织布机——又把群众推回到一种相对不成熟的状态，以致有可能，甚至有必要，建立某种形式的绝对领导。

“这个过程可以比作船只通过分成几段的船闸。当它最初进入时，该船所处水位与该段船闸的容量相比是相当低的，逐步灌水后，船只逐步升高，最后水位达到了最高度。但这种现象是一种错觉，因为下一段船闸还要高，升高过程还需重新开始。船闸四壁代表自然力的控制的客观状态，技术文明的客观状态。每段船闸中的水位代表群众政治成熟程度。把后者作为海拔绝对高度来衡量是没有意义的。重要的是某一段船闸内的相对高度水平。

“蒸气机的发明开始了一个急速的客观进步阶段，因此，也是一个同等急速的主观政治倒退阶段。工业时代在历史上仍是年轻的，在它的极其复杂的经济结构与群

众对它的了解之间，仍旧有很大的差距。因此，可以理解，在20世纪前半中各国政治上的相对成熟比公元前200年或封建时代结束时还低。

“社会主义理论的错误在于，它相信群众的觉悟水平是在不断稳步上升的。因此它在钟摆最近一次摆动的面前，在各国人民意识形态上的自我伤残的面前，束手无策。我们认为，群众的世界观适应情况的变化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可以逐年来衡量，而根据一切历史经验，以每百年来衡量更合适些。欧洲各国人民在精神上远远还没有消化掉蒸气机的后果。资本主义制度会在群众还没有了解它之前就崩溃。

“至于革命的祖国，那里的群众仍受任何地方的同样思想规律所支配。他们已经到了下一段较高的船闸，但是仍处在这一段里的最低水位。他们更不理解取代了原来经济制度的新制度。吃力的痛苦的上升工作，必须重新开始。也许需要好几代人的时间，人民才能了解他们自己用革命造成

的新的客观状态。

“但是，不到那个时候，民主政体是不可能的，个人得到的自由程度甚至比其他国家还少。我们的领袖有责任好象是在空虚的空间中进行统治一样。从典型的自由主义标准来衡量，这种情况并不令人愉快。然而，我们眼前出现的全部恐怖、虚伪和堕落不过是上述规律的可见的和不可避免的表现。只问怎么样而不问为什么的傻瓜和审美家活该倒霉。但是在目前这样群众相对不成熟时期，反对派也活该倒霉。

“在成熟时期，反对派的责任和作用是在诉诸群众。但在思想不成熟时期，只有蛊惑人心的政客才诉诸‘人民的最高判断’。在这种情况下，反对派有两个抉择：用政变来夺取政权，而不能指望群众的支持，或者在无声的绝望中让自己摔出秋千——那就是‘默默地去死’。

“还有第三种选择也同样一贯，在我们的国家里已发展成为一种制度：那就是，在没有希望实现自己的信念时，放弃和压

制自己的信念。由于我们所承认的唯一道德标准是社会效益标准，为了留在党内公开否认自己的信念显然是比唐·吉珂德式继续进行一场没有希望的斗争更加光荣。

“个人自尊心问题；对于某些自己痛骂自己的方式到处存在的偏见；个人的疲倦、厌恶和羞耻感——这一切都是要彻底连根带枝拔掉的……”

## 二

鲁巴肖夫在鲍格罗夫被处决和伊凡诺夫来访后第二天早晨军号响后马上开始写他的关于秋千的沉思。早饭送来以后，他只喝了一口咖啡，就让它凉在那里了。他的笔迹在过去几天内已慢慢潦草起来，这时都又显得坚定有劲了。字越写越小，圆浑的字体变得棱角分明。他在重读一遍时，发现了这一点变化。

上午十一点时，他又象往常那样被带去做操，因此得停下笔来。到了院子里以后，他给分了一个新伙伴一起转圈子，不再是原来的里普·凡·温克尔。这是一个瘦削的农民，穿着一双树皮鞋。院子

里没有见到里普·凡·温克尔，鲁巴肖夫这时才想起吃早饭时没有听到墙上敲“起来，你这人世间的可怜虫。”显然，那老头给带走了，只有上帝才知道带到了哪里去了。一只可怜的、憔悴的、去年的飞蛾，居然熬过了它预定的寿命，没有用处地活了下来，在不合时令的季节中出现，盲目地飞了几下，终于掉在一个角落里与灰尘为伍了。

那农民开始的时候沉默地跟着鲁巴肖夫走，一边斜眼看他。走了第一圈以后，他清了几次喉咙，又过了一圈，他忍不住开口了：

“我是D省来的。您到过那里吗？”

鲁巴肖夫作了否定答复。D省是东部的一个偏僻省份，他只有个模糊的概念。

“路确实很远，”那农民说：“你得骑骆驼才能到那里。您是政治犯吗？”

鲁巴肖夫承认了。那农民的树皮鞋的鞋底有一半已掉了，他的脚丫子光着，踩在积雪上。他的脖子很细，他谈话时不断点着脑袋，好象是在重复祷告的阿门似的。

“我也是个政治犯”，他说：“那就是，我是个反动派。他们说所有的反动派都要送走十年。您认为他们会把我送走十年吗？”

他点着头，一边斜着眼睛担心地瞅着圈子中央



站着的几个狱卒，他们在跺着脚，没有注意犯人。

“你干了什么？”鲁巴肖夫问。

“因为反对给孩子打针，他们揭发我是个反动派，”那农民说。“每年政府派工作组到我们那里去。两年前，政府送报纸给我们读，还有许多肖像。去年，政府送来一台脱谷机和一些牙刷。今年，政府送来带针头的小玻璃管给孩子们打针。有一个穿男人裤子的女人要挨个给孩子们打针。她到我家来时，我和老婆插上了门闩，暴露了我们是反动派。后来我们烧掉了所有的报纸和肖像，砸烂了脱谷机，一个月以后，他们就来把我们带走了。”

鲁巴肖夫喃喃地说了些什么，心里想的是自己关于自治的论文怎么往下写。他想起了他有一次曾经读到关于新几内亚土著的文章，他们在智力上与这农民处在同一水平，但生活在完全的社会和谐之中，拥有极其发达的民主制度。他们已达到了较低一段船闸的最高水位……

鲁巴肖夫身旁的农民把他的沉默看成是不赞成，就不响了。他的脚丫子已冻得发青，他不断地叹着气，听天由命，跟在鲁巴肖夫旁边绕圈子。

鲁巴肖夫一回到牢房就继续写作。他相信在“相对成熟规律”上已有了新发现，因此极其认真地写作着。午饭送来时，他刚写完。他吃了自己的一

份饭，满足地躺倒在床上。

他睡了一个小时，安静无梦，醒来时精神很爽。402号在敲墙，已有相当时候了。他显然感到鲁巴肖夫冷落了他。他问鲁巴肖夫转圈子时的新伙伴是谁，他是在窗口看到的。但鲁巴肖夫打断了他。他一边微笑，一边用夹鼻镜敲墙：

“我打算屈服了。”

他好奇地等待着反应。

很久没有回音。402号给惊呆了。过了整整一分钟才来了答复：

“我宁可吊死……”

鲁巴肖夫微笑一下，敲墙道：

“各听其便。”

他以为402号会勃然大怒，但敲墙声却很平静，好象是听天由命了：

“我本来以为你是个例外。你难道已一点尊严都不剩了？”

鲁巴肖夫手持夹鼻镜躺着，感到满足和平静。他敲道：

“咱们的尊严概念不同。”

402号敲得又快又明确：

“尊严就是为自己的信仰而生，为它而死。”

鲁巴肖夫同样快答复：

“尊严是要做个有用的人而不求虚荣。”

402号这次答复比以前声大、尖锐：

“尊严是体面——不是有用。”

“什么是体面？”鲁巴肖夫问，字母之间留出富裕的空间。他敲得越平静，对方越是恼火。

“你们这种人是永远不会懂得的”。402号回答。鲁巴肖夫耸耸肩：

“我们已用理性代替了体面。”

402号不再回答。

晚饭以前，鲁巴肖夫又读了一遍他写的东西。他作了一两处改动，以写给共和国公共检察官的信的形式，把它抄录了一份。他在最后关于反对派可以采取的行动方针抉择的几段底下划了线，在文件最后添上了下面这段结束语：

“本人尼·萨·鲁巴肖夫，前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前人民委员、前革命军第二师师长、人民敌人面前无畏革命勋章获得者，在考虑了上述理由后决定完全放弃本人的反对派态度和公开谴责本人的错误。”

### 三

鲁巴肖夫等待把他带到伊凡诺夫那里去已有两

天了。他原来以为他把屈服的文件交给老狱卒以后就会马上把他带去的。交出的那天正好是伊凡诺夫规定的期限期满的那一天。但是看来他们对他已经不是那么焦急了。也许伊凡诺夫正在研究他的“相对成熟理论”。更有可能的是，这个文件已经送到更高有关当局去审阅了。

鲁巴肖夫想到这会在中央委员会的“理论家”中间引起多大震惊而微笑了。在革命之前，也在其后的一个短时期里，在老领导在世的时候，“理论家”与“政治家”之间是不存在什么区别的。任何时刻要采取什么策略都是在公开讨论中从革命理论直接得出的。内战期间的战略行动，征收粮食，分配土地，发行新币，改组工厂——实际上，每一行政措施都是应用哲学的一个行为。曾经挂在伊凡诺夫办公室墙上的那张旧照片上标有号码的每个人，都比欧洲各大学里各专业的著名学者更懂法学、政治经济学、政治学。在内战期间历次召开的代表大会上所进行的讨论，其理论水平是历史上任何政治团体所没有达到过的。这些讨论象学术刊物上的论文，其不同是，讨论的结果关系到千百万人的生活和福利，革命的前途。

现在这些老卫兵都精疲力尽了。历史的逻辑是：政权越稳定，它就越僵化，为的是要防止革命

所释放出来的巨大力量掉转头来把革命自己冲垮。在代表大会上作理论探讨的时代过去了。伊凡诺夫墙上以前挂照片的地方出现了一块发白的地方。哲学上的放光发彩让位于一个思想贫乏的时期。革命的理论冻结为教条的崇拜，简单化的容易掌握的教义问答，第一号成为主持弥撒的大祭司。他的发言和文章，甚至文风，有了一种绝对正确的教义问答性质。它们分成问题和答复，把实际问题和事实加以粗暴的简单化，绝对化，令人叹服。第一号显然有应用“群众相对成熟规律”的本能……暴政的外行只能强迫他们的臣民闻令行动，第一号却教会他们奉命思想。

鲁巴肖夫想到今天的党的“理论家”们对他的信会有什么反应，不禁感到好玩。在实际情况下，这是最荒诞的异端邪说。学说创始人受到了批评，他们的话本来是金科玉律。一就是一，二就是二。甚至第一号这个神圣不可侵犯的人也放到历史的条件下来客观地加以对待。这些今天的不幸理论家们一定感到伤脑筋，他们的唯一本领就是把第一号的思想跳跃和突然改变方针打扮成最新的哲学阐发。

第一号有时常常喜欢对他的理论家巧施诡计。有一次他要求编辑党的经济刊物的专家委员会对美国工业危机作一分析。这需要几个月才能完成，最

后特刊出版了，其中根据第一号在上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论点，证明了(用大约三百多页篇幅)美国的繁荣只是虚假的繁荣，实际上，美国是处在萧条的低点，这只有靠革命胜利来克服。特刊出版的那一天，第一号接见了一个美国记者，一边吸烟斗，一边用下面这句简洁的话震惊了那个记者和全世界：

“美国的危机已经过去，商业恢复了正常。”

专家委员会的委员们准备遭到撤职，甚至可能逮捕，他们当夜写信，供认他们“提出反革命理论和错误分析的错误。”他们强调自己痛悔不已，保证公开承认错误。只有鲁巴肖夫的同代人艾萨科维奇——编辑委员会中唯一属于老一辈的——宁可开枪自杀。知情人后来说，第一号这样做唯一目的是要毁掉艾萨科维奇，他怀疑他有反对派倾向。

这整个事情是出小小的滑稽剧，鲁巴肖夫想。在这所谓“革命哲学”把戏的背后，不过是一种巩固独裁政权的手段。独裁政权虽然是个令人气馁的现象，但是似乎是历史的必要。把这滑稽戏看得太认真的人是要上当的，他只看到了台上的表现，而没有看到台后的机关。以前，革命的政策是在代表大会上公开决定的，如今是在幕后决定的，这也是群众相对成熟的法则的逻辑结果……

鲁巴肖夫真希望能在一个安静的图书馆里在绿

色的台灯下工作，在一个历史性的基础上建立起他的新理论。革命哲学最有成果的时候总是被放逐的时候，也就是两次政治活跃时期之间的强迫休息时期。他在牢房里来回踱步，想象在政治上被逐出教门后如何度过内心流放的两年。他的公开检讨会给他换来必要的喘息时间。屈服的外表形式无所谓，内容应该有尽可能多的“全怪我”和对第一号的绝对正确的信任的表白。这完全成了一个礼仪问题，一种拜占庭式的礼仪，这是出诸于有必要用庸俗化和无休止的重复，把每一句话都铭刻到群众心中去。凡是说成是对的东西必须金光灿灿，凡是说成是错的东西必须漆黑一团。政治声明得象庙会上俗气的木偶一样有色彩。

这些事情，402号是一点也不知道的，鲁巴肖夫想。他的狭隘的尊严概念属于另外一个时代。体面是什么？这是一定形式的习俗，仍受骑士比武的传统和规矩的约束。尊严的新概念应该不同：一心服务而不求虚荣，直到最后结果……

“宁可死也不辱自己”，402号这么宣布，可以想象他还在捻胡尖。这是个人虚荣心的典型表现。402号用单眼镜敲墙，而鲁巴肖夫用夹鼻镜。这就是全部的不同。如今在他看来重要的唯一事情是在图书馆里安心工作，建立他的新理论。这将需要好几年，

写出来的书是厚厚一本。但这是要了解民主制度史的第一个有用的线索，将对群众心理的钟摆运动作出说明。而在目前，这种钟摆运动特别明显，而经典的阶级斗争理论无法加以解释清楚。

鲁巴肖夫在牢房里迅速来回踱步，一边对自己微笑。只要他有时间发挥他的新理论，别的都不在乎。他的牙齿不痛了，他的头脑十分清醒，心情极其兴奋，甚至按耐不住，自从与伊凡诺夫夜半谈话和送走他的信以来已有两天了，但仍没有动静，在他被捕后的两周内他曾经觉得时间飞得太快，如今却慢如蜗牛。钟点分成为分、秒，他的工作时停时辍，每次都是因为缺乏历史文献而趋于停顿。他有时在窥视孔前站立整整一刻钟，希望能看到狱卒来带他去见伊凡诺夫。但是过道里阒无一人。电灯光仍象过去一样一直开着。

有时他希望伊凡诺夫自己会来，那么他的口供问题的整个手续就可以在他牢房中解决了，那就愉快多了。这次他就不会反对他带一瓶白兰地来了。他想象了谈话的细节，他们怎样一起起草“口供”的堂皇措辞，以及他们在一起工作时伊凡诺夫的讥刺味的俏皮话。鲁巴肖夫一边微笑，一边在牢房里来回漫步，每隔十分钟就看一会儿表。伊凡诺夫那天晚上不是答应第二天来带他去吗？



鲁巴肖夫越来越焦急不耐了。在与伊凡诺夫谈话后的第三天晚上，他睡不着觉。黑暗中他躺在床上，细心倾听监狱大楼里的每一细微响动，辗转反侧，被捕后第一次希望旁边有个温暖的女人肉体。他尽量想办法入睡，把呼吸调节得十分均匀，但反而更加烦躁了。他想同402号交谈，但极力抵制这一诱惑。自从“什么叫体面”问题以来，就再也没有听过402号了。

大约在午夜时分，他躺在黑暗中呆视着窗户上的破报纸睡不着已有三个小时了。他憋不住了，用手指关节敲起墙来。他热切地等待着，但墙上一片沉默。他再敲了几下等着，感到一阵羞愧的热血涌上了脑袋。402号仍不回答。然而可以肯定他在墙的那边一定也躺着睡不着，回忆着以前的冒险消磨时光。他曾经告诉过鲁巴肖夫，他不到半夜一、两点钟睡不着觉，因而又恢复了少年时代的习惯。

鲁巴肖夫躺在铺上，呆视着黑暗。他身下的草垫子已经压平了，毯子太暖和，使皮肤湿滋滋的很不好受，然而他一掀开毯子就打寒战。他已连续不知抽第七支还是第八支烟了，铺边地上到处尽是烟蒂。这时万籁俱寂，时间停滞了，化为没有形状的黑暗。鲁巴肖夫闭上眼睛，想象阿洛娃躺在身边，他所熟悉的乳房曲线高耸到黑暗里。他忘记了她已象鲍格罗

夫那样被拖过了过道。静寂之中仿佛有嗡嗡声和摇摆的感觉。被关在这个蜂窝般的牢狱里的其他二千人在做什么？他们的听不见的呼吸，他们的看不见的梦境，他们的受到抑制的恐惧和希望，这一切都仿佛使静寂膨胀了起来。如果历史可以计算的话，二千个人的噩梦加起来有多重？二千个人的没有满足的渴望的压力加起来有多重？如今他真的觉得闻到了阿洛娃姐妹式的香水味了。他盖着毯子的身上流着冷汗……牢房门被猛地推开了。过道上的电灯光刺着他的眼。

他看见进来两个穿制服、带手枪的军官，这是他以前所没有见过的。其中一个走近铺边。他身材高大，面容凶狠，声音粗哑，鲁巴肖夫听来觉得十分响。他命令鲁巴肖夫跟他走，没有解释到哪里去。

鲁巴肖夫在枕头下摸到了夹鼻眼镜戴上，从铺上起来。他在过道上同那个穿制服的大个子一起走时，感到象铅灌的一样累。那个大个子比他高出一个脑袋。另一个跟在他们后面。

鲁巴肖夫看了一眼表。早上二点钟，这说明他还是睡了一会儿。他们朝理发室那边走——也就是鲍格罗夫被带走的方向。第二个军官落在鲁巴肖夫后面三步，鲁巴肖夫很想回头过去，因为后脖子发痒，但他制止住了这个冲动。他想，他们毕竟不能

这样完全没有手续就把我干掉，但他并没有很大的自信。目前，这对他来说并不十分重要，他只希望越快越好。他想弄清楚自己究竟怕不怕，但是只意识到由于不回头看那背后的人而引起的身体上的不舒服。

他们过了理发室拐弯后，就看到了狭窄的楼梯。鲁巴肖夫斜眼看身旁的大个子，看他是不是会放慢脚步。他仍没有感到恐惧，只有感到好奇和不安。但他们走过了楼梯，他惊奇地发现自己双腿发软，得强自镇定。同时他发现自己的机械地用袖口擦夹鼻眼镜，显然他没有走到理发室就摘了下来，自己也不知道。他想，这一切都是骗局。在上面，你能自己欺骗自己，但是在下面，在肚子以下，你就心里明白。如果他们现在拷打我，我就什么都招认，但一到明天就翻案……

再走几步，“相对成熟理论”又回到他的脑际，还有他已决定屈服招供这件事。他感到松了很大的一口气，但同时他又惊奇地问自己怎么可能会完全忘掉了他在几天前的决定。那个大个子停了步，打开一扇门，自己站到边上。鲁巴肖夫看到一间同伊凡诺夫办公室相似的屋子，但光线特别强，很刺他的眼。对着门，坐在办公桌后的是格列金。

鲁巴肖夫背后的门关上了，格列金从一堆文件

中抬起头来。“请坐，”他用鲁巴肖夫在牢房里第一天同他争吵时听到过的那种干巴巴、没有色调的声音说。鲁巴肖夫也看清了格列金头颅上的疤痕。他的脸在阴影中，因为室内唯一的光线来自格列金转椅后的一盏铁架落地灯。那只瓦数特别大的灯泡发出的强烈的白光使鲁巴肖夫睁不开眼睛，因此过了几秒钟以后他才意识到有一个第三者在场——一个坐在屏风后小桌子旁的秘书，背朝着屋子。

鲁巴肖夫在格列金的办公桌对面唯一的一张椅子上坐下。这是一张没有扶手的椅子，坐着很不舒服。

“我奉命在伊凡诺夫政委不在的时候审查你，”格列金说。灯光刺眼，但是如果他侧过脸去，眼角的感觉仍不好受。何况，侧着脸谈话似乎滑稽可笑，也很尴尬。

“我愿意受伊凡诺夫的审查。”鲁巴肖夫说。

“预审官是上级指派的，”格列金说：“你有权发言，或者拒绝发言。根据你的情况，你拒绝发言就是等于否认你两天前写的表示愿意招供的表白，那么调查就自动告一结束。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我奉令将你的案件送回到有关当局，他们将对你作行政宣判。”

鲁巴肖夫把他的话很快地考虑了一下。伊凡诺

夫显然出了问题。突然被送走，开除，逮捕。也许因为有人记起了他以前同鲁巴肖夫的友谊。也许因为他在思想上超过别人，太聪明了，而且因为他对第一号的忠诚是根据逻辑的考虑而不是盲目信任。他太聪明了，他属于老派。格列金和他的方法属于新派……祝你平安，伊凡诺夫。鲁巴肖夫没有时间可怜你。他得很快思考对策，而灯光妨碍了他。他摘下夹鼻眼镜，眨巴着眼。他知道，没有眼镜他看出去象赤身裸体一样无能为力，而格列金的没有表情的眼睛把他脸上的每一变化都一览无遗。如果他继续沉默，他就输了。现在已没有退路了。格列金是个令人反感的人，但他代表新一代。老一代必须同它妥协，否则就要被它摧毁。没有别的选择。鲁巴肖夫突然感到老了，他从前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他从来没有想过他已年过五十。他把眼镜夹上，想正视格列金的眼光，但强烈的灯光使他眼睛流泪，他又摘了下来。

“我准备好要发言，”他说，想控制自己声音中的不快。“但条件是你停止耍诡计。把那耀眼的灯关了，用这办法去对付坏蛋，反革命分子吧。”

“你没有资格提条件。”格列金用平静的口气说：“我不能为你改变我屋子的灯光。你似乎不知道自己所处的地位，特别是你本人被控从事反革命活动，

在这过去的几年里，你两次在公开讲话中承认了。你以为这次你可以轻易逃脱，那你就错了。”

你这王八蛋，鲁巴肖夫心里想。你这穿制服的混帐王八蛋。他的脸红了。他自己感到脸红了，也知道格列金注意到了。这个格列金大概多大？顶多三十六、七，他参加内战时还是个青年，革命爆发时还是个孩子。这便是洪水以后才开始思想的一代。它没有传统，没有记忆同消失了的旧世界相联。这是生出来没有脐带的一代……然而它却有权利在它一边。你必须把自己的脐带拉掉，不让它同虚荣的尊严观念和旧世界虚伪面子有最后联系。尊严是要服务而不带虚荣心，不吝惜自己，直到最后的结果。

鲁巴肖夫的脾气慢慢缓和下来。他把夹鼻镜捏在手里，把脸转向格列金。他闭上眼睛，但更感到赤身裸体了，不过这不再使他不安了。在他闭上的眼皮后面是一片红。他从来没有这样强烈的孤单感。

“我愿做一切为党服务的事，”他说，话声中已不再粗哑。他仍闭着眼，“我请你详细说明控告的内容。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这么做。”

他听到而不是通过他眨巴的眼睛看到格列金僵硬的身子动了一下。他放在椅子把手上的袖口窸窣响了一下，他深深地呼吸了一口气，好象他的整个

身子放松了下来。鲁巴肖夫猜想，格列金是在经历他一生中的大胜利。让一个象鲁巴肖夫那样的人就范，意味着远大前程有了开端。而直到一分钟之前，格列金仍是胜负未卜——伊凡诺夫的下场是对他的警告。

鲁巴肖夫突然明白，他对格列金象格列金对他一样有权力。小伙子，我掐住了你的咽喉，他苦笑地想。我们互相掐住了对方的咽喉。要是我从秋千上摔下来，我把你也一起拖下来。鲁巴肖夫在格列金恢复了死板和正经、从文件堆中找材料时，曾经转着这个念头。接着他拒绝了这个诱惑，慢慢地闭上他刺痛的眼睛。你必须消除掉虚荣心的最后残余——自杀除了是虚荣心的颠倒形式以外还是什么呢？这个格列金当然认为靠他的手法，而不是伊凡诺夫的论据诱使他屈服，也许格列金也说服了上级相信这一点，这样造成了伊凡诺夫的垮台。王八蛋，鲁巴肖夫想，不过这一次没有生气。你是我们制造出来的只讲后果的穿制服的粗汉，现在刚开始的新时代的野蛮人。你不明白问题的所在。但是你一旦明白，你对我们就没有用处了……他注意到灯光更强烈了，鲁巴肖夫知道这种反光灯在审讯的时候可以改变强弱光度。他不得不把脑袋完全转过去，用手擦流泪的眼睛。你这粗汉，他又想。但就是这样

的一代粗汉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格列金开始宣读起诉书。他的单调的语音更令人生厌了。鲁巴肖夫侧着脑袋闭着眼睛听着。他决定把他的“招供”看作是手续而已，看作是一出荒谬的但是必要的滑稽戏，只有内行才能了解它的曲折的意义。但是格列金宣读的文件之荒谬超过了最糟糕的预期。格列金当真相信，他鲁巴肖夫策划了这些孩子气的阴谋？相信多年来他日夜考虑的是炸掉这所他同其他老卫兵们一起奠基的建筑？格列金当真相信，这些老卫兵们，头上标有数字的人，格列金少年时代的英雄突然都染上了恶疾，个个变得贪污腐化，一心只想破坏革命？这些伟大的政治策略家用的办法都象是从廉价侦探小说中学来的。

格列金单调地宣读着，没有语调上的抑扬顿挫，他的声音是迟到中年才学会识字的人的平板的读书声。他正读到所谓与一个外国代表谈判的一段，据说鲁巴肖夫在B国时期就开始了，目的是要用武力进行复辟，恢复旧政权。他提到了外国外交官的名字，还有会面的时间和地点。鲁巴肖夫现在听得比以前专心了。在他的记忆中闪过了一个不重要的小事，当时他马上给忘掉了，后来也再没有想起过。他马上估计了大致什么时间，正好与此相符。原来这就是要吊死他的绳索？鲁巴肖夫微笑了，他用



手帕擦了眼角的泪……

格列金一直念下去，态度僵硬，声调平板。他真的相信自己在读的东西？他没有意识到这文件内容的荒诞不经？现在他念到了鲁巴肖夫担任铝专卖局局长期间的活动。他念了一些说明这个匆忙建设起来的工业是多么的混乱的统计数字，工伤事故受害者的人数，由于材料缺陷而造成飞机坠毁的次数。这一切都是他，鲁巴肖夫的罪恶破坏所造成的后果。“罪恶”一词出现了好几次，夹在技术名词和统计数字之间。鲁巴肖夫忽然有这样的假设：格列金是疯了。这种逻辑与荒谬的混合使人想起了精神分裂症所引起的一种神经有条不紊的错乱。但是这个起诉书不是格列金起草的，他只是宣读一遍而已——或者当真相信，或者至少认为它是可信的……

鲁巴肖夫把脑袋转向坐在阴暗角落里的女速记员。她娇小、瘦削，戴眼镜。她正在安详地削铅笔，没有把头转过来。显然，她也认为格列金在念的荒诞不经的事是可信的。她仍很年轻，大概二十五、六，她也是洪水以后长大的。对这一代现代石器时代人，鲁巴肖夫的名字意味着什么？他坐在那里，坐在强烈得令他睁不开流泪的眼睛的灯光前，他们用没有声调的声音向他宣读，用没有表情的眼睛看他，冷淡得出奇，好象他是解剖台上的一个对象。

格列金读到了起诉书的最后一段。它包含了最重要的一项内容，阴谋刺杀第一号。伊凡诺夫在第一次提审时神秘地提到的X又出现了。原来他是第一号工作忙时送午饭来的餐厅的副经理。这种冷餐是第一号斯巴达式艰苦生活的一个内容，报上经常加以宣传。就是用这送饭的办法，X在鲁巴肖夫的煽动下要为第一号准备过早的夭亡。鲁巴肖夫闭着眼睛微笑，当他睁开眼睛时，格列金已经念完了，正在看着他。经过几秒钟的沉默，格列金用他的平板的声调说了下面的一句话，这话更象是说明，而不是提问：

“你听了起诉书，承认有罪。”

鲁巴肖夫想正眼看他的脸，但是不行，他只好闭上眼。他有一句挖苦的回答到了嘴边，但是结果却轻轻地说了下面的话，那瘦小的秘书得伸长脖子才听得见：

“我承认有罪，罪在不了解政府政策的万不得已，罪在因此而持有反对派的观点。我承认有罪，罪在凭借一时感情冲动，因此陷于与历史必要性相矛盾的地位。我让我的耳朵倾听被牺牲者的哀号，因此对证明有必要牺牲他们的论据充耳不闻。我承认有罪，罪在把有罪和无辜的问题置于有用和有害问题之上。最后，我承认有罪，罪在把个人置于人

类之上……”

鲁巴肖夫停了一下，又想睁开眼睛。他的脑袋避开灯光，侧向秘书的角落。她刚刚记完他说的话。他相信从她的侧影中看到了嘲弄的冷笑。

“我知道，”鲁巴肖夫继续说：“我的错误如果付诸实践，就会对革命造成致命危险。在历史的重要转折关头每一个反对都带着分裂党的种子，因此也带着内战的种子。人道主义的弱点和自由主义的民主，在群众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对革命来说就是自杀。然而我的反对派态度就是建立在对这些方法的向往上——表面上十分相宜，实际上是十分致命的。我要求对专政实行自由主义的改革，要求实行更广泛的民主，要求取消恐怖，放宽党的严密组织，我承认这些要求在目前情况下在客观上是有害的，因此是反革命性质的……”

他又停了下来，因为嗓子很干，声音发哑。他在寂静中听到秘书铅笔书写的窸窣声。他把头抬起了一些，眼睛闭着，又说下去：

“在这个意义上，而且也只是在这个意义上，你们可以把我叫做反革命分子。至于起诉书里所提出的荒谬的罪名，我与它们无关。”

“你说完了吗？”格列金问。

他的声音这么粗暴，使鲁巴肖夫惊异地看着他。

格列金在办公桌后处在灯光下的影子也是他一贯的一本正经的姿态。鲁巴肖夫一直要想找个简单的话来刻划格列金，如今找到了：“一本正经的粗暴。”

“你说的话并不是什么新东西，”格列金继续用他干巴巴的、嘶哑的声音说：“在你以前的两次供词中，第一次是两年前，第二次是十二个月以前，你都已公开承认，你的态度是‘客观上的反革命和反对人民的利益。’你两次都谦恭地要求党的原谅，宣誓忠于领导的政策。如今你想第三次玩弄这个把戏。你刚才说的话不过是烟幕弹。你承认你的‘反对派态度’，却否认作为反对派态度的逻辑结果的行为。我早已告诉过你，这一次你可不能这么便宜地逃过去了。”

格列金这段话来得突然也结束得突然。在接着的沉默中，鲁巴肖夫听到了办公桌后电灯中电流的嘶嘶声。同时，灯光又强了一度。

“我那个时候的声明，”鲁巴肖夫低着声说：“是为了策略上的缘故而做出的。你当然知道，有许多反对派政治家不得不做出这样的声明，以求留在党内。但是这次我有不同的目的……”

“也就是说，这次你是真诚的？”格列金问。他问得很快，他的一本正经的声音中不带讥刺。

“是的，”鲁巴肖夫安静地说。

“而以前你说谎？”

“就那么说吧，”鲁巴肖夫说。

“为了保命？”

“为了能够继续工作。”

“没有命就无法工作。所以，是为了保命？”

“就那么说吧。”

在格列金的问话和自己的回答的短暂间歇中，鲁巴肖夫只听见秘书的铅笔在纸上沙沙作响和电灯的电灯嘶嘶声。电灯发出炽烈的白光和热流使鲁巴肖夫不断擦额上渗出的汗珠。他竭力要想张开刺痛的眼睛，但一张一闭之间的时间距离越来越长了，他越来越感到要想瞌睡。当格列金在连续提问以后，稍有间歇，这时鲁巴肖夫感到自己的下巴已垂到胸口上了。格列金的下一个问题，使他猛烈一震，他又抬起头来，而有已睡了一觉的感觉，但时间长短无法判定。

“我再重复一遍，”格列金的声音在说：“你以前的悔过声明的目的是欺骗党，隐瞒你的真实意见，保全你的性命。”

“我已经承认过了，”鲁巴肖夫说。

“包括你公开同你的秘书阿洛娃划清界线，也是同样目的？”

鲁巴肖夫麻木地点点头。他的眼眶里的压力向

他右边脸颊的所有神经散布，他又感到了牙痛。

“你知道阿洛娃公民一再要求叫你当她辩护的主要证人？”

“他们告诉了我，”鲁巴肖夫说，牙更痛了。

“你无疑知道，你当时作的声明——这，你刚才承认是谎话，对于判决阿洛娃死刑是起了决定性作用的？”

“他们告诉了我。”

鲁巴肖夫感到他的整个右侧脸颊在抽搐。他的脑袋更加麻木沉重了，他费了很大的劲才不致使头沉到胸口上。格列金的声音钻进了他的耳鼓：

“因此阿洛娃有可能是无辜的？”

“有可能，”鲁巴肖夫说，他的舌上有一种血腥味和苦味，这是最后的一点点讽刺。

“……而因为你的 为了保全自己 性命的谎话而被处决？”

“大致就是这样，”鲁巴肖夫说。“你这王八蛋，”他满腔愤怒但又无可奈何地想。“当然，你说的，从根本意义上来说，是真实的。但我倒想要知道，我们两人究竟谁是更大的王八蛋。但是他掐住了我的脖子，我无法自卫，因为自己摔出秋千是不许可的。要是他肯让我睡觉，那就好了。如果他再这样折磨我下去，我就什么都收回，拒绝发言——那我就完

了，他也就完了。”

“……经过了这一切，你还要求宽大对待你？”格列金的声音在继续响，仍旧那么粗暴地一本正经，“你仍敢否认罪恶活动？经过了这一切，你还要求我们相信你？”

鲁巴肖夫放弃了保持脑袋挺直的努力。当然格列金不相信他是对的。即使他本人也迷失在有意的说谎和辩证的借口的迷宫里了，迷失在真实和幻觉的朦胧里了。最终的真理总是后退一步，只有用来为它服务的排在倒数第二的谎言仍旧看得见。而这最终的真理又迫使你不得不作这么大的病态的歪曲！他怎样才能使格列金相信，这一次他是真正真诚的，他已到了最后一站？当你唯一的愿望是好好睡一觉和悄然消失的时候，你总是得说服人家，说啊说的，不断争辩……

“我不要求什么，”鲁巴肖夫说，把脑袋痛苦地转向格列金声音来的方向，“除了再一次证明我对党的忠诚。”

“你只有一个证据可以提出来，”格列金的声音传来，“那就是完全的坦白。我们听够了你的‘反对派态度’和崇高的动机。我们要的是完全、公开坦白你的罪恶活动，这是那个态度的必然结果。你唯一还能对党服务的就是做为警告的榜样，用你自己的亲身

经验来向群众表明反对党的政策必然会导致什么后果。”

鲁巴肖夫想起第一号的冷餐。他的发炎的面部神经剧烈地抽搐，但疼痛已不那么难熬了，而只是一阵阵的迟钝麻木。他一想起第一号的冷餐，他脸部的肌肉就抽搐成怪样。

“我不能坦白我没有犯过的罪行，”他断然说。

“不，”格列金的声音响着，“你当然不能——”鲁巴肖夫第一次在那声音中听出了取笑的味道。

从那片刻起，鲁巴肖夫对于那次提审的记忆很模糊。“你当然不能”那句话由于语调特别始终留在他耳际。在那句话以后，他的记忆中有一段空隙，长度很难确定。后来他觉得自己大概是睡过去了，他甚至记得做了一个奇怪的愉快的梦。这大概只持续了几秒钟——在没有时间概念的一连串明亮的景色中，有着栽在父亲庄园车道两边的熟悉的白杨树，还有一种特别的白云，那是他幼时在树丛上空看到的。

他记得的下一件事就是屋子里出现了第三个人，格列金的声音在他头上嗡嗡作响——格列金一定是站了起来，在办公桌上向他俯身过来：

“我要你注意力集中……你认识这个人吗？”

鲁巴肖夫点点头。他马上认出了兔唇，虽然他



没有穿那件在院子里转圈时老是裹着他身子的雨衣，双肩也没有怕冷地耸着。鲁巴肖夫的脑海里迅速地闪过了一排熟悉的数字：2—3；1—1；4—3；1—5；3—2；2—4……“兔唇向你问候。”402号是在什么情况下向他发出这个信息的？

“你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认识他的？”

鲁巴肖夫费了好大的劲才说出声来；他的干燥发焦的舌头上仍有苦味。

“我几次在我的窗口里看到他在院子里散步。”

“你以前不认识他吗？”

兔唇站在门边，距鲁巴肖夫椅背几步远。反光灯的光完全直照在他身上。他原来蜡黄的脸白得象粉笔一样，他的鼻子很尖，上唇兔裂，露出了牙龈。他垂着双手站在那里。鲁巴肖夫如今背着灯光，看到他就象舞台脚光打在上面的幽灵一样。又有一排数字闪过鲁巴肖夫的记忆：“4—5；3—5；4—3；……”——“昨天受刑。”几乎在同一时候，他无法抓住的一个记忆的影子闪过他的脑海——这个记忆是：在他进404号牢房以前很久，曾经见过这不成人样的家伙的活着的原版。

“我记不确切了，”他迟疑地回答格列金的问题。“如今我在近处看到了他，我记得仿佛在什么地方见到过他。”

话还没有说完，鲁巴肖夫就后悔这话还是不说为好。他迫切希望格列金会给他几分钟时间镇定下来。格列金象连珠炮似的迅速提问使他想起一只猛鹰连续啄着俘获物的形象。

“你最后一次是在哪里见到这个人的？你的记忆过人在党内是有名的。”

鲁巴肖夫沉默不语。他苦苦思索，但是想不起在什么地方见过这强烈灯光下的幽灵。这个人下唇颤动，但兔唇不动，他伸舌头舔着上唇断裂处的红肉。他的目光在鲁巴肖夫和格列金之间来回转动。

秘书停止了书写。你能听到的只是电灯泡的均匀的嘶嘶声和格列金浆洗过的袖口的磨擦声。他向前俯身，手肘撑在椅子把手上问：

“你拒绝回答？”

“我记不得了，”鲁巴肖夫说。

“很好，”格列金说。他再向前俯一些，好象是用他全身的重量来对兔唇：

“你可以不可以帮助鲁巴肖夫公民的一些记忆？你最后一次是在哪里见到他的？”

兔唇的脸变得更苍白了。他的眼光在秘书身上逡巡了一会儿，她的存在显然他是刚发现，但他的眼光马上又转开了，似乎在逃避和寻找一个安身之处。他又用舌头舔舔上唇，一口气匆匆地说：

“我是被鲁巴肖夫公民教唆来用毒药毁掉党的领袖的。”

开初，鲁巴肖夫只是感到惊异，这个不成人样的骸骨身上怎么会发出这么深沉、动听的声音。他的声音似乎是他身上唯一完整的東西，同他的外表形成古怪的对比。他说的内容，鲁巴肖夫过了几秒钟以后才明白。自从兔唇到场之后，他就预料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就察觉到了危险。但是如今他尤其意识到这一指控的荒诞不经。一会儿以后，他又听到了格列金的说话——这一次是在他背后，因为鲁巴肖夫刚才转过身来对着兔唇。格列金的声音有些恼火：

“我没有问你这个。我问你的是最后一次见到鲁巴肖夫公民是在什么地方。”

错了，鲁巴肖夫想。他不该强调那是个错误的答复。我是不会注意到的。他现在觉得他的头脑已清楚，处在一种兴奋的清醒状态。他想找个适当的比喻。他想，这个证人是个自动的手风琴，刚才奏错了调。兔唇的下一个答复甚至更加悦耳动听：

“我是在驻B国的贸易代表团的招待会后见到鲁巴肖夫公民的。他当时教唆我对党的领袖采取恐怖主义的阴谋。”

他在说话的时候，他惊恐的眼光找到了鲁巴肖

夫，就停在他那里了。鲁巴肖夫戴上夹鼻眼镜，带着十分强烈的好奇心回报他的注视。但是在那年轻人的眼光里，他没有看到要求原谅的祈祷，而是兄弟般的信任和毫无办法地受到拷打苦刑的人的无声的责备。先避开对方的眼光的是鲁巴肖夫。

他的背后又响起了格列金的声音，又是十分自信和粗暴：

“你能记得会见的日期吗？”

“我记得很清楚，”兔唇用他愉快得颇使人感到不自然的声音说，“那是革命二十周年纪念招待会以后。”

他的眼光仍盯住鲁巴肖夫的眼睛，好象在那里有他获救的最后一丝希望。鲁巴肖夫的脑海里浮起了一个记忆，开始时是朦朦胧胧的，后来比较清楚了。现在他终于知道这个兔唇是谁了。但这一发现，除了痛心的奇怪以外，并没有引起他的别的感觉。他把头转向格列金，在灯光下眨巴着眼，平静地

“日期是准确的。我起初没有认出基佛教授的儿子来，因为我只见过他一次——在他落入你们之手以前。你可以庆贺你们工作的成绩。”

“因此你承认你认识他，而且你在刚才说过的日期和场合见到过他？”

“我刚才已告诉你，”鲁巴肖夫疲乏地说。

兴奋的清醒状态已经消失，他的脑袋里又开始嗡嗡作响。“要是你马上告诉我他就是我不幸的朋友基佛的儿子，我早就认出来了。”

“在起诉书里有他的全名，”格列金说。

“我象别人一样只知道基佛教授的笔名。”

“这个细节并不重要，”格列金说。他又把全身转向兔唇，好象他要用他的体重越过他们两人之间的空间而把兔唇压垮似的。“你继续说吧。把会见的经过说出来。”

又错了，鲁巴肖夫想，尽管瞌睡难熬。这当然不是一个不重要的细节。要是我真的教唆过这个人进行这愚蠢的阴谋，我会一听到提示就记起他来的，不论有没有姓名。但是他太疲倦了，不想多费唇舌，进行这样长的解释。此外，他还得把脸转向灯光。而现在那样，他至少可以背对着格列金。

在他们谈他的身份的时候，兔唇在灯光的强烈照耀下低头站着，嘴唇颤动。鲁巴肖夫想起了他的老友和同志基佛，这位伟大的革命史学家。在那张代表大会会议桌的著名照片里，大家都留着胡须，头上有个画圈的号码，就象灵光似的，他坐在老领袖的左边。在历史问题上，他是他的顾问；他也是他的棋友，也许是他唯一的私人朋友。在“老头”死了以后，基佛由于比别人更了解他，奉命撰写他的传记。

他花了十年功夫，但命中注定永远不能出版了。因为关于革命情况的官方版本在这十年之内已发生了奇怪的变化，主要演员扮演的角色得改写，价值观的天平秤得加以修改。但是老基佛非常顽固，一点也不懂得第一号统治的新时代的内部辩证法……

“我父亲和我，”兔唇用他那不自然的唱歌般的声音继续说：“参加了国际人种学大会回国——我是陪他去开会的——到B国去一转，因为我的父亲要想见一下他的朋友鲁巴肖夫公民……”

鲁巴肖夫带着又好奇又悲哀的奇怪的复杂心情听着。到现在为止，他说的都是正确的。老基佛前来看他，因为需要倾吐心里的话，也是需要征求他的意见。他们一起过的那个晚上也许是老基佛一生中最后一次愉快的时光了。

“我们只能留一天，”兔唇继续说，他的目光盯在鲁巴肖夫的脸上好象要在那里找到力量和鼓励。“那天正好是庆祝革命的纪念日，因此我很确切地记得那日期。鲁巴肖夫公民整天忙碌着招待会的事，只能见我父亲几分钟。但是到晚上，使馆招待会结束后，他请我父亲到他住处去，我父亲让我陪去。鲁巴肖夫公民有点累了，他换了睡袍，但他很热情地欢迎了我们。他在桌上摆出了葡萄酒、白兰地和糕点，在拥抱了我父亲后用这些话欢迎他：‘这是最

后一批莫希干人的告别晚会……”

在鲁巴肖夫的背后格列金的声音打断了他：

“你有没有马上注意到鲁巴肖夫打算把你灌醉，以便使你更容易供他驱使？”

鲁巴肖夫觉得兔唇的憔悴的脸上闪过一丝微笑。他第一次看出同他那天晚上见到的年轻人有轻微相象的地方。但是那表情马上消失了。兔唇眨巴着眼，舔舔他的裂唇。

“我觉得他相当可疑，但是我还没有识破他的诡计。”

王八蛋，鲁巴肖夫想，他们把你搞成什么啦？

……

“说下去，”格列金的声音嗡嗡响。

在被打断以后，兔唇过了几秒钟才重新安定下来。同时可以听到速记员在削铅笔。

“鲁巴肖夫和我父亲叙了一会儿旧。他们俩已有多年未见了。他们谈到革命前的日子，谈到我只耳闻过的一些老一代的人，谈到内战。他们常常用暗示谈话，我听不懂，而且对有些以往的事大笑，我也不懂。”

“喝得很醉了？”格列金问。

兔唇对着灯光无可奈何地眨巴着眼。鲁巴肖夫注意到他在谈话的时候身体不稳，好象站立不住

似的。

“我想是的，喝得不少，”兔唇继续说下去。“在过去几年中我还没有见到过父亲情绪这么好。”

“那是，”格列金的声音说：“发现你父亲的反革命活动前三个月，再过三个月他就因此被处决？”

兔唇舔着嘴唇，麻木地瞪着灯，没有说话。鲁巴肖夫在突然冲动之下，向格列金转过身来，但是由于光线强烈，他闭上了眼，又慢慢地转了回去，用袖口擦一擦眼镜。秘书的铅笔在纸上停止了。这时又听见了格列金的声音：

“那时你已参加了你父亲的反革命活动了吗？”

兔唇舔着嘴唇。

“是的，”他说。

“你知道鲁巴肖夫与你父亲持同一观点？”

“是的。”

“报告那次谈话的主要内容。不重要的可以不提。”

兔唇如今反扣着双手，肩膀靠墙。

“过了一-会儿，我父亲和鲁巴肖夫的话题转到了当前。他们用贬低的口气谈到党内当前情况，谈到领导方法。鲁巴肖夫和我父亲把领袖只叫做‘第一号’。鲁巴肖夫说，只要第一号的大屁股坐在党的上面，下面的空气就再也无法呼吸了。因此他愿意



在国外工作。”

格列金转向鲁巴肖夫：

“这是你第一次向党的领袖表示效忠之前不久？”

鲁巴肖夫向灯光侧过一半身子。“不错，”他说。

“鲁巴肖夫在那天晚上提到过他打算这么表白的意图？”格列金问兔唇。

“提到过。我父亲因此责备鲁巴肖夫，他说他对他感到失望。鲁巴肖夫大笑，叫我父亲是老糊涂，唐·吉河德。他说，重要的是坚持到最后，等待适当时机。”

“他这话是什么意思：‘等待适当时机’？”

年轻人的眼光又在寻找鲁巴肖夫的脸，带着一种绝望的和几乎求情的表情。鲁巴肖夫有了这种荒谬的想法，怀疑他是不是要从墙边过来吻他的前额。他觉得这个想法好笑，这时他听到那悦耳的声音回答：

“那就是党的领袖被免去职务的时机。”

格列金没有放过鲁巴肖夫的微笑，讥讽地问：“这些事情似乎使你好笑？”

“也许，”鲁巴肖夫说，又闭上眼睛。

格列金整一整袖口，继续问兔唇：

“这样鲁巴肖夫谈到把党的领袖免除职务的时

机。这怎么样才能实现呢？”

“我父亲认为终有一天杯子会溢出来，党会撤消他或者强迫他辞职。反对派必须宣传这个想法。”

“而鲁巴肖夫呢？”

“鲁巴肖夫笑我父亲，一再说他是个老糊涂，唐·吉诃德。然后他说第一号的出现不是偶然现象，而是人类一定特点的体现，那就是对自己的信念的绝对正确抱有绝对信任，他就是从中吸取力量来做到完全没有顾忌。因此他决不会自愿辞职，只有用暴力把他除掉。而且你也不能期望党对你有什么帮助，因为第一号把一切都控制在他手中，使得党的官僚机构成了他的帮凶，跟着他一起起伏，而且知道这一点。”

尽管他很瞌睡，鲁巴肖夫发现这个年轻人很准确地保持了原话。他本人已不再记得谈话的细节了，但是他并不怀疑兔唇的忠实的重述。他从夹鼻眼镜后面以一种新发生的兴趣来看年轻的基佛。

格列金的声音又响了：

“这样鲁巴肖夫强调对第一号，也就是说对党的领袖用暴力的必要？”

兔唇点头。

“而他的论点，再加上大量饮酒，给你一个非常强烈的印象？”

年轻的基佛没有马上回答。接着他说，声音比以前略低：

“我几乎什么也没有喝。但他说的每一句话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鲁巴肖夫低下了头。他心中忽生怀疑，这对他几乎象肉体剧痛一样，使他忘掉了其他一切。是不是有这可能，这个不幸的青年事实上是从他自己的——鲁巴肖夫的思路得出结论的？他站在他面前，在反光灯的照耀下，成了他自己的逻辑的后果化身？

格列金没有让他想完这个念头。他的声音又响了：

“……在这准备性的理论以后就作了行动的直接教唆？”

兔唇沉默了。他对着灯光眨巴眼睛。

格列金等了几秒钟。鲁巴肖夫也无意中抬起了头。几秒钟过去了，你只能听到电灯的嘶嘶声。这时格列金的声音又响了，甚至更加一本正经，没有色调：

“你的记忆是不是需要帮一下？”

格列金有意很随便地说这句话，但兔唇仿佛给抽了一鞭似的哆嗦了一下。他舔舔嘴唇，眼光里露出了动物般的赤裸裸的恐怖。接着他的愉快悦耳的

声音又响了：

“教唆不是在那天晚上，而是第二天早上，在鲁巴肖夫公民和我单独见面的时候。”

鲁巴肖夫微笑了。把捏造的谈话推迟到第二天显然是格列金导演的一个妙招。要是在他儿子接受放毒指示的时候让老基佛高兴地在旁听着，即使说给石器时代的人听也是不大可信的……鲁巴肖夫忘记了刚才的震惊。他转过身去，在灯光下眨巴着眼睛问格列金：

“我想在对质时被告有权提问吧？”

“你有这权利，”格列金说。

鲁巴肖夫转过来对那年轻人。“据我记得，”他说，透过夹鼻镜看着他，“你和你父亲一起来看我时你刚在大学里结束学业？”

如今他第一次直接同兔唇说话，后者的脸上又恢复了希望、信任的脸色。他点点头。

“那么这没错，”鲁巴肖夫说：“我要是记忆仍不错的话，当时的打算是你到历史研究所里在你父亲下面工作。你去了没有？”

“去了，”兔唇答，经过片刻犹豫后又说：“一直到我父亲被捕。”

“我明白，”鲁巴肖夫说：“这件事使你不能再呆在研究所里，你得另谋生计……”他停下来，转向格

列金，继续说：

“……这证明在我和这个年轻人见面的时候，不论是他还是我，都没法预见到他未来的工作。因此教唆放毒杀人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事。”

秘书的铅笔突然停下。鲁巴肖夫不去看她也知道她停止了记录，抬起她的尖尖的耗子脸，望着格列金。兔唇也望着格列金，舔着他的上唇。他的眼光里露出来的，不是宽心，而只是惶惑和恐惧。鲁巴肖夫暂时的胜利感觉消失了。他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好象是破坏了一次庄重仪式的顺利进行。格列金的声音的确比平时更加冷酷，更加一本正经了：

“你还有别的问题吗？”

“目前就是这个，”鲁巴肖夫说。

“没有人说你的指示限于凶手使用毒药，”格列金平静地说：“你下令暗杀。暗杀的方法你留给执行者去决定。”他转向兔唇。“是不是？”

“是，”兔唇说，声音中有一点放了心。

鲁巴肖夫记得起诉书里明白无误地说“教唆放毒谋杀，”但他突然觉得这整个事情都无所谓了。不管这个年轻的迈可是不是真的作了这种疯狂的尝试，还是只计划做这种事情，不管这整个供词只是人为地硬栽给他的，还只是其中一部分，现在在鲁巴肖夫看来只是法律上的细节了，对他的罪名并

无影响。基本一点是，这个可怜虫是他的逻辑后果的肉体化身。如今角色颠倒过来了：不是格列金，而是鲁巴肖夫想用吹毛求疵的方法把一个很清楚的案件搅混。迄今为止在他听来是这么荒谬可笑的起诉书，事实上只不过是，在一个十分完善的逻辑链条中插入一些失掉的环节而已，尽管是用一种很笨拙的、粗糙的方式。

但是仍有一点，鲁巴肖夫认为对他是冤枉的。但是他已筋疲力尽，说不出话来了。

“你还有别的问题吗？”格列金问。

鲁巴肖夫摇摇头。

“你可以走了，”格列金对兔唇说。他按一下铃，进来了一个穿制服的狱卒把手铐给年轻的基佛铐上。在他被带走以前，兔唇在门口把头又一次转向鲁巴肖夫，就象他在院子里散步结束时一样。鲁巴肖夫感到了他的目光是一种压力。他摘下夹鼻眼镜，在袖口上擦着，避开了他的眼光。

兔唇走后，他几乎有些羡慕他。格列金的声音又开始刺他的耳朵，精确而且粗暴：

“你如今承认基佛的供词在基本要点上是符合事实的吧？”

鲁巴肖夫又转向灯光。他的耳际嗡嗡作响，灯光炽热，透过他的薄薄的眼皮发着红光。然而“在基

本要点上”这句话并没有逃过他的注意。格列金用这句话弥补了起诉书中的漏洞，使自己有可能把“教唆放毒谋杀”改为简单的“教唆谋杀。”

“在基本要点上——是的，”鲁巴肖夫说。

格列金的袖口又窸窣响了一下，甚至速记员也在椅子上动了一下。鲁巴肖夫知道他如今已说出了关键性的话，使他的承认有罪的口供落了实。这些石器时代的人怎么能懂得什么才是他鲁巴肖夫认为有罪的，什么才是他以他自己的标准叫做真实的？

“这灯光使你不舒服吗？”格列金忽然问。

鲁巴肖夫微笑了。格列金做的是现金交易。这就是石器时代的人的心态。然而，使人睁不开眼的灯光柔和一些以后，鲁巴肖夫感到松了一口气，甚至近乎感激。

虽然也要眨眼，但他如今能正面看格列金了。他又看到了他剃得光光的头颅上的大红疤。

“……只有一点我认为是基本的，”鲁巴肖夫说。

“那是？”格列金问，声音又僵硬、一本正经了。

我指的当然是同那个青年单独见面的事，这从来没有发生过，鲁巴肖夫想。这一点对“他”是重要的：把事情落实了，即使这落实得不清不白。但是，从他的观点来看，他可能是对的……

“对我是重要的一点，”他大声说：“是这个。不错，根据我当时所持有的信念，我谈到了有必要采取暴力行动。但我的意思这是指政治行动，不是个人恐怖活动。”

“因此你宁可内战？”格列金问。

“不。群众行动，”鲁巴肖夫说。

“你自己也明白，这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内战。你这么重视的就是这个区别吗？”

鲁巴肖夫没有回答。这的确是片刻之前似乎是十分重要的一点，如今他却觉得无所谓了。事实上，如果反对派只能够用内战的办法来取得对党的官僚机构及其庞大机器的胜利，为什么这个办法就比在第一号的冷餐中放毒更好呢？第一号的消失也许能使这个政权更快垮台而少流些血。政治谋杀在什么方面不如政治集体屠杀高尚？那个可怜的小伙子显然弄错了他的意思——但是那个小伙子的错误不是比他自己在过去几年中的行为更加有一贯性？

凡是反对独裁政权的人必须接受内战作为手段。凡是厌恶内战的人必须放弃反对，接受独裁政权。

这些简单的句子是他在很早很早以前同“温和派”论战时写的，如今自己成了谴责的对象。他觉得无法同格列金继续辩论。他的完全失败感使他感到



松了一口气。继续斗争的义务，责任的负担，从他身上卸了下来。原来的瞌睡又回来了。他感到脑中的嗡嗡只是微弱的回声了，有几秒钟的时间，他似乎觉得坐在办公桌后面的不是格列金，而是第一号，他的神情之中有一种奇怪的谅解的讥笑，这是鲁巴肖夫上次和他握手告别时他让鲁巴肖夫看到的。他在圣-约斯特、罗伯斯庇尔和他们十六个被砍头的同志所埋葬的埃朗西斯公墓门上看到的石刻铭文浮现在他的脑海。这只有几句话：

#### Dormir (安眠)

从这时开始，鲁巴肖夫的记忆又模糊了。他很可能第二次睡着了——睡了几分钟或几秒钟。但是这次他没有记得做过梦。他一定是格列金弄醒他在口供上签字的。格列金把钢笔递给他，鲁巴肖夫有些厌恶地发现钢笔刚从他口袋上摘下来还带着他的体温。速记员已停止记录了，屋子里沉寂一片。灯泡也停止嘶嘶响了，发出来的是一种正常的有些暗淡的光，因为窗外已露曙光。

鲁巴肖夫签了字。

他仍旧有宽心和轻松的感觉，但是他已忘了产生这种感觉的原因。然后，他在睡意朦胧之中读了

他承认教唆年轻的基佛谋害党的领袖的口供。他曾经有过这是一场荒诞不经的误会的感觉。他曾经有过把签名划掉、把口供撕掉的冲动。但是后来他又恢复了理智，他在袖口上擦了擦夹鼻眼镜，把那张纸交还给办公桌对面的格列金。

接下来他能记得的事是，他又走在过道里，由那个不知在什么时候之前把他带到格列金的办公室去的大个子警卫押送。他在半睡状态中经过了理发室和通地窖的楼梯。他想起了原来经过时的恐惧。他对自己觉得好笑，向着前面模糊地笑了一下。接着他听到牢房的门在他身后砰的关上，他坐落在铺上，心中有了一种全身痛快的感觉。他看见了窗外的灰色曙光，窗户上有着那张挡风的报纸，接着他就睡着了。

当他的牢门再度打开时，天还没有大亮。他睡了不到一小时。他起初以为是送早饭来。但是站在门口的不是老狱卒，而又是那个穿制服的大个子。鲁巴肖夫明白他得回到格列金那里去，提审将继续。

他在水盆前用凉水擦了擦额角和脖子，戴上夹鼻眼镜，又开始走上过道，经过理发室和地窖的楼梯，步履不稳，但他自己不知道。

#### 四

从这以后起，蒙在鲁巴肖夫记忆上的那层雾越来越厚了。后来他只能记得同格列金对话的个别片断，这次对话长达好几个日夜，中间只有一两小时短暂的间断。他甚至说不上到底有多少日夜，估计至少前后达一个星期。鲁巴肖夫曾经听说过这种在肉体上完全摧毁被告的方法，常常是由两三个预审官轮番进行持久不断的审讯。但是格列金的方法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从来不用人替换，因此对他自己的体力消耗不下于对鲁巴肖夫的消费。这样他就剥夺了鲁巴肖夫最后的心理上的安慰：被虐待者的受苦受难和受害者的道义上的优越感。

四十八小时以后，鲁巴肖夫已失去了昼夜感。经过了一小时的睡眠，大个子来推醒他后，他已不再能够断定窗外的灰光是晨曦还是薄暮。过道以及理发室、通地窖的楼梯和门上的门，都总是开着灯，电灯泡发出同样昏暗的光。在提审的时候要是窗户外渐渐发亮，格列金终于去关了灯，那就是早晨了。要是窗户外慢慢地暗了下来，格列金开了灯，那就是晚上。

如果鲁巴肖夫在提审的时候饿了，格列金就派人去给他送茶和夹肉面包来。但是他很少有胃口，

就是说，他有时饿得慌，但是面包放在他面前的时候，他却感到恶心。格列金从来没有在他面前吃过东西，鲁巴肖夫觉得要东西吃是丢脸的，为什么这样，他也说不清楚。在格列金面前，鲁巴肖夫觉得不论什么涉及人体功能的事情都是丢脸的，因为格列金从来没有显出过疲倦的样子，从来不打呵欠，从来不抽烟，似乎不吃也不喝，总是用同样一本正经的姿态坐在办公桌后，穿着同样的浆洗得笔挺的制服。鲁巴肖夫觉得最丢人的是要求允许他去解手。格列金会让值班的狱卒把他带到厕所去，一般是那个大个子，他就外面等。有一次鲁巴肖夫关着门在里面睡着了。从此之后，门总是半开着。

他在提审时的情况有时冷漠，有时清醒得象玻璃一样。不自然。只有一次他真的失去了知觉。他常常觉得快要失去知觉了，但是一种自尊感总是在最后一分钟把他救了出来。他就点一支烟，眨巴一下眼睛，提审就继续下去。

有时他自己也奇怪怎么能够坚持了下来。但是他知道，关于人的肉体抵抗能力，外行的意见把限度定得太低了。他们不知道弹性有多大。他曾经听到过有些犯人十五天到二十天不让睡觉，他们也坚持下来了。

在格列金第一次提审他，签了口供以后，他以

为事情就此了结。第二次提审时他就很清楚，这只是个开端。控告有七点，他现在还只承认了一点。他原来以为自己已把羞辱的酒喝尽了。如今他才发现，没有力量就象有力量一样有好多等级；失败可能象胜利一样令人头晕目眩；它的深度是没有底的。如今格列金一步一步地逼着他往下走。

他当然可以为自己把它弄得简单一些。他只要一古脑儿什么都签字，或者什么都否认，那么他就有安宁了。可是一种奇怪的、复杂的责任感使他没有向这个诱惑让步。鲁巴肖夫的一生都是被一个绝对观念所支配的，因此他只是在理论上知道有“诱惑”这回事。如今诱惑陪伴着他过了数不清的日日夜夜，伴着他摇摇晃晃地走过过道，伴着他在格列金的强烈灯光下：这诱惑是失败者的公墓上写的一个字：安眠吧。

这很难抵御，因为这是一种安静和平的诱惑；没有华丽的油漆，而且不是肉欲上的。它是无声的；它不用论据。所有的论据都在格列金的一边。这诱惑只是重复了理发员的纸条上写的几个字：“默默地死去。”

有时，在与透明的清醒状态交替的冷漠状态中，鲁巴肖夫的嘴唇在蠕动，可是格列金听不清他说的的是什么话。这时格列金会清一清他的喉咙，把袖口

拉直，鲁巴肖夫会在袖口上擦夹鼻眼镜，糊里糊涂地瞌睡地点着头。因为他已经把诱惑者看作就是那个他已经忘记掉的无声对手，他根本没有理由呆在这间屋子里：那个语法上的虚构……

“那么你否认曾经代表反对派同一个外国的代表谈判，以便在他们帮助下推翻现政权？你否认准备以出让领土为代价换取他们对你的计划的直接或间接的支持——也就是牺牲我国某些省份？”

是的，鲁巴肖夫否认这个控告。于是格列金向他重述了他与该外国外交官谈话的日期与场合——鲁巴肖夫这才想起那次小小的不重要的场面，在格列金宣读起诉书时就浮上了他的记忆。他十分困，头脑糊涂，看着格列金，心里知道把那次场面向他作解释是没有用的。那是在驻B国的使馆里举行的一次外交午餐以后发生的。鲁巴肖夫坐在某国使馆二等参赞，肥胖的冯·Z先生的旁边，就在几个月以前，鲁巴肖夫曾在那个国家被打掉了几颗牙齿。他们两人很有兴趣地谈着某种罕见的豚鼠，冯·Z先生的田庄和鲁巴肖夫父亲的田庄里都培育这种豚鼠。很有可能，他们两人的父亲在世时曾经交换过种样。

“你父亲的豚鼠后来怎么样了？”冯·Z先生问。

“在革命中给宰着吃了，”鲁巴肖夫说。

“我们的如今用来做人造油脂，”冯·Z先生悲哀地说。他毫不掩饰他对本国新政权的蔑视。他们没有把他撤职大概是出于疏忽。

“你同我处境相同，”他舒服地说，喝干了手中的饭后白兰地。“咱们都是落后于时代的人。豚鼠的豢养早已过时，咱们生活在无产者的时代。”

“但请不要忘了我站在无产者一边，”鲁巴肖夫含笑说。

“这不是我的意思。”冯·Z先生说：“严格地说，我也同意我们留黑胡子的家伙的纲领，只要他不那么尖声嘶叫。毕竟，人是只能因自己的信仰而钉在十字架上。”他们一起又坐了一会儿，喝了咖啡，到喝第二杯时，冯·Z先生说：“要是您在贵国再来一次革命，鲁巴肖夫先生，把第一号废掉，然后好好照顾豚鼠。”

“这是极不可能发生的，”鲁巴肖夫说，停了一会儿，他又补了一句：“……不过看来是您的朋友们在指望这样一件事情发生？”

“那当然罗，”冯·Z先生用同样随便的口气说：“听了你们上次审讯的报道，贵国一定发生了很奇怪的事。”

“那末，在您的朋友中间一定也想到了你们方面

在万一发生这极不可能发生的事时采取什么步骤？”

对于这个问题，冯·Z先生回答非常精确，几乎是象他早就在等待这个问题似的：“按兵不动。不过有个代价。”

他们当时是站在桌边，手中端着咖啡杯。“那么代价也已经决定了？”鲁巴肖夫问，自己觉得自己的轻松语调是有点做作的。

“当然，”冯·Z先生说。他提到了一个少数民族所居住的产麦省份的名字。接着他们相互告别……

鲁巴肖夫多年没有想到这次交谈了——至少没有有意识地想到它。在喝黑咖啡和白兰地时的闲谈——你怎么向格列金解释这是多么没有意义呢？鲁巴肖夫瞌睡地看看坐在办公桌对面的格列金，他象往常那样漠然没有表情。不，不可能向他解释清楚关于豚鼠的事的。这个格列金根本不懂豚鼠为何物。他从来没有同冯·Z先生一起喝过咖啡。鲁巴肖夫想起格列金在读起诉书时常常结巴，语调常常有错。他出身无产阶级，成年才学会读书写字。他永远理解不了以豚鼠为开始的谈话最后不知会以什么收场。

“那末你承认那次谈话是事实，”格列金说。

“那是完全无害的。”鲁巴肖夫疲倦地说，心里



明白格列金又把自己往下推了一步。

“它的无害就象，”格列金说：“你在用暴力除掉领袖的必要性问题上向年轻的基佛作纯理论探讨一样。”

鲁巴肖夫在袖口上擦擦夹鼻眼镜。那次谈话真的象他自己要相信的那样无害吗？当然，他没有“谈判”，也没有达成任何协议，那个心宽体胖的冯·Z先生根本没有正式权力这么做。整个事情顶多只能看成是外交界语言中所谓的“试探”。但是这样一种试探是他当时思想活动的逻辑锁链上的一个环节；何况，这是符合党的某些传统的。在革命爆发前不久，老领袖不是利用过同一国家的参谋总部才能回国领导革命胜利吗？他在后来不是在第一个和约中放弃了某些领土作为不受干涉的代价吗？“老头牺牲空间换取时间，”鲁巴肖夫的一个聪明朋友曾说。那次已经忘掉的“无害”的谈话与锁链这么合适，使鲁巴肖夫如今很难不从格列金的眼光来看待它。就是这个读起文件来结结巴巴的格列金，他的脑筋使起来也同样不灵活，却能够得出简单易解的结论——也许正是因为他不懂什么叫豚鼠。……不过，格列金是怎么知道这次谈话的呢？不是偶然在旁听到——这是不大可能的——就是那个心宽体胖的冯·Z是个奸细——天知道他是为了什么原因。以前这

样的事情常常发生。他们对鲁巴肖夫布置了圈套——按照格列金和第一号的原始心态布置的圈套。而他，鲁巴肖夫却一步踏了进去……

“既然你这么了解我同冯·Z先生的谈话，”鲁巴肖夫说：“你一定也知道这是没有后果意义的。”

“当然，”格列金说。“这是由于我们及时逮捕了你，并在全中国摧毁了反对派。要不然，叛国企图就会有结果。”

对此他能答复什么呢？说什么这反正不会导致严重后果，如果不是为了别的原因，仅仅因为他鲁巴肖夫年纪已经太大，精力已经不足，无法象党的传统所要求的那样，或者象格列金要是处在他的地位那样采取实际行动？说什么所谓反对派的全部活动不过是老年人的喋喋空谈，因为整个老卫兵一代已经象他一样精疲力尽？力尽是因为多年的非法斗争，潮湿的监狱牢房而造成的，他们在这两者之间消耗了一半青春。精疲是因为几十年来，为了要控制自己的实际恐惧——大家都没有说出口，但是都得独自对付——而神经长期处于紧张状态。还有那多年的流放生活，尖锐的党内派系斗争，斗争手段的无情。还有那不断的失败，以及最后胜利所造成的意志涣散。他能说，对第一号独裁从来没有形成积极组织反对，这一直不过是些空谈，无益的玩火，

因为老卫兵这一代已献出了他们的一切力量，已经被挤干了最后一滴精神卡路里；就象埃朗西斯公墓里的死者一样只有一个希望：安眠和等待后代来为他们平反？

他能回答这个巍然不动的石器时代人什么呢？说他什么都是对的，只有一点根本错误：认为坐在他前面的仍是以前那个鲁巴肖夫，而其实这只是他的影子？说整个事情不过是——不是为了他已做的行动，而是为了他没有做的行动而惩罚他？“人只能因自己的信仰而被钉上十字架，”这是那位心宽体胖的冯·Z先生说的……

鲁巴肖夫在签了口供，给带回牢房去酣睡，以待下次折磨开始之前，向格列金提出了一个问题。这同正在谈的问题无关，但是鲁巴肖夫知道，每签一次口供，格列金就好说话一些——格列金是做现款交易的。鲁巴肖夫问的与伊凡诺夫的命运有关。

“伊凡诺夫公民已遭逮捕，”格列金说。

“可以知道原因吗？”鲁巴肖夫问。

“伊凡诺夫公民对你的案件的审查工作不力，在私人谈话中对起诉书的充分有根据表示了怀疑。”

“要是他真的不能相信呢？”鲁巴肖夫问。“也许他对我的看法太好了。”

“在这样情况下，”格列金说：“他应该中止审

查，正式报告有关当局，说你是无辜的。”

格列金是在开他玩笑吗？他看上去象以往一样，始终那么一本正经，没有表情。

下一次鲁巴肖夫又低头站在这一天的纪录面前，手中握着格列金的尚有体温的钢笔，速记员已经离开了房间时，他问道：

“我可以向你再提一个问题吗？”

他一边说，一边看着格列金头颅上的大疤。

“他们说你是主张采取激烈方法的——所谓‘硬方法’。你为什么不对我施加身体上的直接压力？”

“你是说用刑，”格列金若无其事地说：“你知道，这是我国刑法所禁止的。”

他停了下来。鲁巴肖夫刚刚签完了字。

“何况，”格列金继续说，“有一类被告在压力下招供，但公开审判时又翻供。你属于坚韧的那一类。你在公开审判时招供在政治上的实用价值在于它的自愿性质。”

这是格列金第一次谈到公开审判。但是在他跟在大个子背后拖着疲乏的步子在过道上走回去时，鲁巴肖夫想的不是这个前景，而是“你属于坚韧的那一类”这句话。尽管有违他的本意，这句话使他充满了愉快的自我满足。

我变得年老昏聩而又稚气十足了，他在铺上躺下时想。然而这种愉快的感觉一直维持到他入睡。

他每一次在经过坚韧的争论之后，签了新口供，回来躺到床上时，总已精疲力尽，然而奇怪地有一种满足的感觉，明知在一个小时，顶多两个小时之内他又会被推醒——每次鲁巴肖夫只有一个希望：格列金开恩一次，让他睡一觉，恢复神志清醒。他知道在斗争到最后结果之前，到一切就绪之前，这个愿望是不可能实现的。而且他也知道，每次新的较量的结果是新的失败，最后结果是什么已没有什么疑问了。既然如此，他为什么还要继续折磨自己，让自己受折磨，而不放弃这场失败已成定局的战斗，从此长眠不醒呢？死的想法很早以前就失掉了形而上学的性质；它有一种温暖、诱人、人体上的意义——那就是睡觉。然而一种特别的、扭曲的责任感迫使他保持清醒，把失败的战斗进行到底——尽管这只是一场同风车进行的战斗。继续战斗到格列金迫伴下最后一级阶梯，而在眨巴的眼睛下，起诉书中模糊的地方如今都点句分明、笔划齐全。他得把这条路走到尽头。只有到那时，当他睁着眼睛进入黑暗时，他才争取到了长眠不醒、没有人再来打扰的权利。

在这日夜不断的期间，格列金身上也发生了一种变化。这变化不大，但是鲁巴肖夫的发红的眼睛没有放过它。格列金一直到最后都是在办公桌旁的落地灯阴影里正襟危坐，面无表情，衣服笔挺。但是慢慢地，他的声音中的粗暴腔调消失了，正如他一点点地减少灯光的强度一样，一直到最后恢复正常。他从来不笑，鲁巴肖夫心里想，石器时代的人究竟会不会笑。他的声音也没有表达任何感情变化的能力。但是有一次，鲁巴肖夫在连续谈了几小时后发现香烟抽完了，自己并不吸烟的格列金从口袋中掏出一盒来，递给办公桌对面的鲁巴肖夫。

在某一点上，鲁巴肖夫甚至也取得了一次胜利。那是控诉书里说他破坏铝专卖的一点。在他已经招认的全部罪行中，这个罪名并不重要，但是鲁巴肖夫象在重要的问题上一样坚决地进行斗争。那天晚上他们几乎通宵相对而坐。鲁巴肖夫逐点驳斥了一切罪证和单方面的数字。他的声音因为疲劳过度已经僵硬不清了，但是他列举了在他的麻木的脑袋中象奇迹般跳出来的数字和日期。而格列金一直不能再找到一个出发点来展开逻辑的推论。因为在他们第二、三次的交锋中，他们之间已有了没有明言的协议：如果格列金能证明指控罪名的根据是正确的，即使这一根据不过具有逻辑的抽象的性质，他就有

权自由插进缺少的细节，就象鲁巴肖夫所说的“补全笔划”。他们无意识地已习惯了这种游戏规则，两人都不再对鲁巴肖夫实际采取的行动和由于他所持有的观点而可能采取的行动加以区别。他们逐渐丧失了对外表与现实、逻辑虚构与事实的感觉。鲁巴肖夫偶尔在头脑难得清醒的时候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这时就有从奇怪的酒醉状态中醒来的感觉。而格列金则似乎从来没有意识到。

快到早晨的时候，鲁巴肖夫在铝专卖局破坏问题上还没有退让，格列金的声音有了一种神经质的味道——就象开始的时候兔唇给了错误的答复的时候一样。他把灯光的亮度增强了，这样的事已很久没有发生了，但是他看到鲁巴肖夫讥刺的笑容，又把它放低了。他又提出了几个问题，但没有结果，最后他说：

“因此你坚决否认在交托给你的工业中进行过任何破坏行为——或者甚至策划过这种行为？”

鲁巴肖夫点一点头——睡意朦胧地要想知道下一步是什么。格列金转身对速记员说：

“写上：预审官建议这一罪名因缺乏证据取消。”

鲁巴肖夫马上点燃一支烟来掩饰他的孩子气的胜利感觉。他头一次赢了格列金。当然，这不过是一场失败的战斗中一次可怜的局部小胜，但是毕竟

是胜利。自从上次有过这样的感觉以来，他已有好多月、好多年没有这种感觉了。……格列金把当天记录从速记员手中拿过来后，就打发她走了，这是按照他们最近养成的惯例。

他们单独留下后，鲁巴肖夫站起来要在文件上签字，格列金把钢笔递给他时说：

“根据经验，工业破坏是反对派为政府制造困难和在工人中间制造不满的最有效办法。你为什么这么顽固地坚持你没有使用——或者打算使用——这一办法？”

“因为这在技术上是荒诞不经的，”鲁巴肖夫说，“而且老是用‘破坏分子’来吓唬人，造成人人揭发的瘟疫，使我恶心。”

长远没有过的胜利感觉使鲁巴肖夫精神百倍，说话也比平时大声了。

“如果你认为破坏完全是虚构，那么你认为我国工业状况令人不满意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计件工资太低、劳动条件太差、纪律太严，”鲁巴肖夫说：“我知道专卖局有几起案件，工人因疲劳过度而造成了一些小疏忽，却被当作破坏者枪毙。迟到两分钟就要被开除，身份证上盖上了印，以后便到处找不到工作。”

格列金用他平时没有表情的眼睛看着鲁巴肖



夫，用他平时没有表情的声音问他：

“你小时候有过表吗？”

鲁巴肖夫惊异地望着他。石器时代的人的性格中最显著的特点是他的全然没有幽默感，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从来不开玩笑。

“你不想回答我的问题吗？”格列金问。

“当然想回答。”鲁巴肖夫说，更加惊异了。

“你几岁的时候家里给了你表？”

“我记不清了，”鲁巴肖夫说：“大概八、九岁吧。”

“我，”格列金仍用他惯常的那种一本正经口气说：“是十六岁的时候才知道一小时分成60分。在我的村里，农民们要到城里去，他们日出时就到火车站去，在候车室躺下，一直睡到火车开来，一般都是中午，有时晚上或第二天早上才回来。有些农民如今在工厂里做工了。例如，我的村子里如今有世界上最大的钢轨厂。头一年，工头们在一炉钢出炉之前躺下来睡觉，后来就被开除了。在所有其他国家里，农民得化一、两百年的时间才培养出工业精确的习惯和操纵机器的能力。而在这里，他们才只有十年。如果我们为了小事而不开除他们，不枪毙他们，那么全国生产就会停顿下来，农民们就会在工厂院子里躺下睡觉，一直睡到屋顶上、烟囱上长

出野草来，一切恢复原来的样子。去年英国曼彻斯特来了一个妇女代表团。我们给她们看了一切，后来她们写文章愤慨地说，曼彻斯特的纺织工人决不会容忍这样的待遇。据我所知，曼彻斯特的纺织工业已有两百年的历史。我还知道两百年前刚开始的时候那里的工人的待遇是怎样的。你，鲁巴肖夫同志，刚才使用了曼彻斯特妇女代表团用过的同样论据。当然，你比那些妇女有知识。因此，真奇怪你用了同样的论据。不过话得说回来，你同她们有共同点：你是很小的时候就有了表……”

鲁巴肖夫不说什么，以新的兴趣看着格列金。这是什么？石器时代人从壳里出来了？但是格列金僵直地坐在那里，面无表情。

“也许，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你是对的，”鲁巴肖夫说：“不过，这是你开始同我讨论这个问题的。你刚才已经这么令人信服地解释了工业生产出现困难的自然原因，那么再为此寻找替罪羊有什么用处呢？”

“经验教导我们，”格列金说：“对于所有困难复杂的事情，必须给群众一个简单易懂的解释。根据我对历史的了解，我认为人类没有替罪羊是不行的。我认为在任何时代这都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制度。你的朋友伊凡诺夫教我，这有宗教上的根源。据我

记得，他解释说这个名词本身来自希伯莱人的习惯，他们一年向上帝奉献一只羔羊，承担了他们所有的罪。”格列金停了一会儿，拉直了袖口。“此外，在历史上也有自愿当替罪羊的例子。在你得到表的年龄，我听到村里的教士教诲我说，耶稣基督自称羔羊，把一切罪过都承担了过去。我始终不懂，如果有人宣称他为了人类作牺牲，这怎么能够帮助人类。可是两千年以来，人们认为这是很自然的。”

鲁巴肖夫看着格列金。他的目的是什么？这次谈话的目的是什么？这个石器时代人是徜徉在什么迷宫里？

“不管怎么样，”鲁巴肖夫说：“把真相告诉人民更符合我们的原则，而不是让全世界充斥破坏分子和坏蛋。”

“要是有人告诉我村子里的人说，”格列金说：“尽管发生了革命有了工厂，他们仍旧很笨，很落后，这对他们是不起作用的。要是有人告诉他们说，他们是劳动英雄，比美国人还有效率，所有坏事都是破坏分子和坏蛋干的，这至少还有些效果。对人类有用的东西才是真话，有害的是谎话。在党为成人夜校出版的历史大纲里，强调在头几个世纪中基督教实现了人类的客观进步。耶稣自称是上帝的儿子，一个处女的儿子，不论这是不是真话，随便

哪个有头脑的人都不会深究。据说这是象征性的，但是农民把它当作是事实。我们有同样的权利创造有用的象征让农民当作事实。”

“你的道理，”鲁巴肖夫说：“有时使我想起来伊凡诺夫的论点。”

“伊凡诺夫公民，”格列金说：“象你一样，属于旧知识分子；同他谈话，可以学到一些历史知识，而这是没有正规上学而错过的。区别在于我用这个知识来为党服务，而伊凡诺夫公民过去却是个犬儒派。”

“过去却是……？”鲁巴肖夫问，摘下眼镜。

“伊凡诺夫公民，”格列金用没有表情的眼光看着他：“已于昨天晚上根据行政决定被枪决了。”

在那次谈话以后，格列金让鲁巴肖夫足足睡了两个小时。鲁巴肖夫在回牢房的路上心里奇怪，伊凡诺夫的死讯为什么没有给他更大的震惊。它只造成了他原来取得小胜以后的快感消失而已，却使他又感到疲倦和瞌睡了。显然，他已达到了一种不会产生任何比较深沉感情的状态。反正，甚至在他获知伊凡诺夫的死讯之前，他就对自己的那种无聊的胜利感觉感到可耻了。格列金的性格对他产生了这样的威力，即使是他的胜利也变成了失败。格列金

巍然不动地没有表情地坐在那里，成了那个全靠鲁巴肖夫和伊凡诺夫那样的人们才得以存在的国家的残暴化身。用他们的血肉所产生的血肉有了独立的存在，而且变得麻木不仁，没有知觉了。格列金不是自认是伊凡诺夫和旧知识分子的精神上的继承者吗？鲁巴肖夫向自己重复了一百遍：格列金和新石器时代人不过是在完成那些头上标有号码的一代人的工作。同样的主义在他们的嘴里变得那么没有人性，仿佛仅仅是由于气候上的原因。在伊凡诺夫用那同样的论据的时候，他的声音里尚有过去所留下的、那个已经消失的世界的记忆所留下的调子。你可以否定自己的童年，但你无法抹去它。伊凡诺夫一直到最后都拖着过去，这就使他说的话有了那种又轻松又悲哀的调子。因此格列金叫他是犬儒派。格列金一流的人没有东西要抹去，他们不需要否定过去，因为他们没有过去。他们生下来时没有脐带，没有轻松，没有悲哀。

## 五

尼·萨·鲁巴肖夫日记片断：

“……我们凭什么权利在退出舞台时

以这样的优越感看不起格列金之流？石器时代的人初次出现在地球上时，人猿中间一定发生过哄笑。高度文明的人猿姿态优美地在树枝之间跳来跳去，而石器时代人却是粗野的。困在地面上的。人猿和平，满足，生活复杂有趣，或者一边捉蚤子一边进行哲学沉思，而石器时代人心情阴郁地在地球上行走，挥着棍棒。人猿在树顶上好玩地看着他们，向他们扔果实。有时他们一阵惊恐，因为他们吃水果，小心培育植物，而石器时代人吃生肉，杀动物和同类。他砍掉本来是一直立在那里的树木，搬动本来是一动不动的石块，违反丛林的一切法则和传统。他是粗野的、残忍的、没有动物的尊严。从高度有教化的人猿的观点来看，是历史的一次野蛮的倒退。最后残存的猩猩一看到人就仍会翘起他们的鼻子……”

## 六

过了五、六天后，发生了一件事：鲁巴肖夫在

审讯时晕了过去。他们刚刚进行到了起诉书的结论部分：鲁巴肖夫行动的动机问题。起诉书把动机定为“反革命心理”，并且随便地提到他为一个敌对的外国服务，仿佛这是不言自明的。鲁巴肖夫对这最后一点提法进行了最后的斗争。对话从凌晨一直进行到九、十点钟，这时鲁巴肖夫从椅子上滑下来，躺倒在地，当时并不是争论很激烈的时候。

几分钟以后他醒过来时，他看到医生的只有几根绒毛的脑袋俯在他上面，从一只瓶里把水泼在他脸上，一边揉着他的太阳穴。鲁巴肖夫闻到了医生的呼吸，是薄荷夹着黄油面包的味道，使他感到恶心要吐。医生嗓门很尖，一边咒骂，一边建议把鲁巴肖夫抬出去呼吸一些新鲜空气。格列金一直毫无表情地看着这场面。他按了铃，叫他们把地毯打扫干净。然后他让他们把鲁巴肖夫带回他的牢房。几分钟后，老狱卒来带他到院子里活动一下身子。

开始几分钟，鲁巴肖夫感到好象被刺骨的新鲜空气所陶醉了。他发现双肺吸进氧气，就象舌颚在喝清凉的饮料一样。阳光惨淡然而清新，正好是上午十<sup>四</sup>一点钟，这是不知多久以前他一般给带来放风的时间，那时他这漫长的昏昏沉沉的日日夜夜还没有开始。他以前没有充分欣赏这件美事，真是愚蠢。为什么我就不能干脆地活着，呼吸新鲜空气，在雪

地上散步，让脸上感到阳光的温暖呢？为什么不能摆脱掉格列金屋子里的噩梦，刺人的灯光，这场令人毛骨悚然的演出——就象别人一样的那么生活？

由于这是他平时的放风时间，他又有那个穿树皮鞋的瘦削的农民在他转圈子时作伴。那个农民斜眼看着略微有些摇晃地走在他身边的鲁巴肖夫，清了清喉咙，一边又看一眼那边的狱卒：

“很久没有见到您了。您看上去是病了，好象您支持不了多久了。他们说就要打仗了。”

鲁巴肖夫没有说话。他抑制着心头想捧起一些雪把它捏成雪球的冲动。前面二十步的地方的两个犯人在两排低低的积雪中间跺着脚。他们高度相仿，都穿灰色大衣，嘴里吐着雾气。

“很快就是播种季节了，”农民说：“雪化了以后，可以赶羊上山了。得花三天时间才能把羊赶上山。以前，那地方所有村子都在同一天赶羊上山。太阳刚出就上路，到处是羊，道上、田里，头一天全村出动。您一辈子恐怕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么多的羊，这么多的狗跟着，这么多的尘土，这么多的羊叫狗吠……上帝的母亲，这真是快乐……”

鲁巴肖夫抬起脸对着太阳。阳光仍很惨淡，但空气中已有一些温热。他看着鸟儿飞翔盘旋，就在机关炮楼的顶上。



农民的哼哼唧唧一般的话声仍在继续：

“就象今天这样的日子，你可以闻到空气中化雪的滋味。请您扶着我。咱们俩日子不会太久了。他们打垮了咱们，因为咱们是反动派，因为咱们过的快活日子不再回来了……”

“那时候你真的很快活？”鲁巴肖夫问。但是那农民只低声说了些什么，听不清，他的喉结一上一下好几次。鲁巴肖夫从侧面看着他。过了一会儿他说：

“你记得圣经中那一段沙漠里的部落开始叫喊：让我们选个队长，让我们回到埃及去吗？”

农民热切地点着头，但不理解。……这时他们给带回到大楼里去了。

新鲜空气的效果消失了，沉重的昏睡感，头晕和恶心又回来了。在进门之前，鲁巴肖夫弯腰，捏起一团雪，擦在前额和发炎的眼皮上。

他没有象他所希望的那样被带回牢房。而是直接带到格列金的屋子里。格列金坐在办公桌后，姿态就象鲁巴肖夫给带走的时候那样——多久以前了？他看上去好象在鲁巴肖夫不在的时候没有动过。窗帘给拉了起来，灯仍开着。时间在这间屋子里停止了，就象一潭死水一样。鲁巴肖夫在格列金的对

面再坐下来时，他的眼光看到了地毯上一摊湿的地方。他记起来自己曾经呕吐过。原来是这样，离开他出去才一个小时。

“我想你现在好过一些了吧，”格列金说：“咱们刚才正进行到你的反革命活动的动机这个最后的问题。”

他有些奇怪地看着鲁巴肖夫搁在椅子扶手上的右手，手掌里仍捏着一小团残雪。鲁巴肖夫跟着他的眼光，他微笑一下，把手抬到灯下。他们两人一起看着他掌心中这一小团雪在灯光的热度下融化。

“动机问题是最后一个问题，”格列金说：“你在这个问题上签了字以后，咱们互相就没事了。”

灯光比刚才又强烈了一些。鲁巴肖夫不得不眨巴眼睛。

“……那时你就可以休息了，”格列金说。

鲁巴肖夫伸手去摸太阳穴，刚才擦雪留下的凉意已经消失了。格列金的话中最后一个词“休息”仍悬在室内的静寂之中。休息和睡觉。让我们选一个队长，回到埃及的土地上去……他在夹鼻眼镜的背后向格列金拼命地眨巴着眼睛：

“你同我一样明白我的动机，”他说：“你知道我的行动不是出于‘反革命心理’，也不是为一个外

国服务。我的思想和行动都是根据我的信念和良心。”

格列金从他抽屉里抽出一份档案。他翻了一遍，抽出一张，用单调的声音念道：

“……对我们来说，主观诚意问题是无关重要的。凡是错误的人都必须付出代价；凡是正确的人都可以得到赦免。这是我们的法则……”。这是你被捕后不久在日记中写的。”

鲁巴肖夫在闭着的眼皮下感到了灯光的熟悉的闪动。从格列金的嘴里听到他想过和写过的句子，有了一种奇怪的赤身裸体的感觉——好象是忏悔，只是说给不知名的教士听的忏悔，却给录在唱片上，如今用嘶哑的声音重放出来。

格列金又从档案中取出另外一张纸来，但只念了其中一句，没有表情的眼光仍盯着鲁巴肖夫：

“尊严，就是为党服务而不求虚荣，直至最后结果。”

鲁巴肖夫想对着他凝视。

“我不明白，”他说：“在党员不得不在全世界面前俯伏在尘土之中的时候，怎么能为党服务。我已经在你要我签字的一切文件上签了字。我承认执行一个错误的客观上有害的政策。你觉得这还不够吗？”

他戴上了夹鼻眼镜，无可奈何地向灯光的后面眨巴着眼睛，然后用疲倦的粗哑的声音说：

“毕竟，尼·萨·鲁巴肖夫的名字本身也是党的历史的一部分。你把它踩在污泥里，你也抹黑了革命的历史。”

“对此，我也可以用你自己写的话来回答。你写道：

“有必要把每句话用重复和简化的办法敲进群众的脑袋。凡是说成对的东西必须金光灿灿，凡是说成错的东西必须漆黑一团。为了让群众接受，政治的事情必须象庙会上俗气的木偶一样有色彩。”

鲁巴肖夫沉默了。过一会儿他说：

“原来这就是你的目的：要我在你们的木偶剧中演坏蛋的角色——吼叫，磨牙，吐舌头——而且是自愿的。至少，丹东和他的朋友们是给免了这耻辱的。”

“你在审讯时的供词将是你为党的最后一次服务。”

鲁巴肖夫没有回答。他闭着眼睛，在灯光下休息，就象阳光下的一个疲倦的人睡者一样。但是他逃脱不了格列金的说话声。

“你的丹东和国民大会，”他在说：“比起我们干的来只是一场影子戏而已。我读过这方面的书：这

些人物戴着扑了粉的假发辫子，口口声声说的是他们的个人名誉。对他们来说，以高贵姿态死去是唯一重要的事，不管这姿态是有好处的，还是有害的。”

鲁巴肖夫没有说话。他的耳际翁翁作响。格列金的声音在他的头顶上，在他的四面八方，它无情地敲打着他的剧痛的头颅。

“你知道我们干的是做什么？”格列金继续说：“这是历史上的第一次，一场革命不仅征服了权力而且掌有了权力。我们使我们的国家成了新时代的堡垒。它占据全世界六分之一的面积，十分之一的人口。”

格列金的说话声如今在鲁巴肖夫的背后。他已站了起来，在屋子里来回踱步。这是第一次发生这样的事。他每走一步，靴子就嘎吱作响，他的浆洗得笔挺的制服也窸窣地作响，可以慢慢闻到汗臭与皮革混在一起的酸味。

“我们相信我们的革命在我国胜利以后，全世界都会群起效法。但结果却是一阵反动的浪潮，有吞噬我们的危险。党内有两个潮流。一个潮流是冒险分子组成的，他们要拿我们已赢得的东西去冒险，促进世界革命。你属于这一潮流。我们认为这一潮流是危险的，已经把它消灭掉了。”

鲁巴肖夫要抬起头来说什么。格列金的脚步声

在他的头颅里回响。他太疲倦了，他就让自己坐在那里，闭上眼睛。

“党的领袖，”格列金的声音继续说，“有更远大的目光，更坚韧的策略。他认识到一切取决于熬过全世界反动时期，保卫住堡垒。他认识到，这可能需要十年，也许二十年，甚至五十年的时间，全世界才会发生新的革命浪潮。在那以前，我们是孤立的。在那以前，我们只有一个任务：不要灭亡。”

鲁巴肖夫的记忆中隐隐约约浮起了一句话：“革命者的责任是保全自己的生命。”这话是谁说的？他自己？伊凡诺夫？就是根据这个原则，他牺牲了阿洛娃。可是这把他引导到了哪里呢？

“……不要灭亡，”格列金的声音响着：“堡垒必须守住，不计代价，不计牺牲。党的领袖认识到这个原则，目光清晰，无出其右，而且不断地应用这个原则。‘国际’的政策必须从属于我国国家的政策。谁不了解这个必要性，就必须消灭谁。我们在欧洲的最优秀代理人都不得不成批的从肉体上被清算掉。当堡垒的利益有这需要的时候，我们不惜摧毁我们在国外的自己的组织。为了要镇压不合时宜的革命运动，我们不惜同反动国家的警察合作。为了要保全堡垒，我们不惜背叛我们的朋友而同敌人妥协。这是历史交给我们——第一次胜利的革命的

代表——的任务。近视者、审美家、道德家是不知道的。但革命的领袖了解，一切都取决于一点：能够坚持得更久。”

格列金的踱步停了下来。他停在鲁巴肖夫的椅子后。他的剃得光光的头颅上的疤痕冒着汗。他喘着气，用手帕擦去汗珠，由于打破了原来的矜持态度似乎有些不好意思。他又在书桌后坐了下来，拉直了袖子。他把灯光放低了一些，继续用他平常没有表情的声音说：

“党的路线是明确规定好的。党的策略是根据为了实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毫无例外，一切手段——的原则决定的。根据这个原则，公共检察官将需要你的性命，鲁巴肖夫公民。

“你的一派，鲁巴肖夫公民，已经被击败和摧毁了。你要分裂党，尽管你一定知道党的分裂意味着内战。你知道农民中间的不满，他们还没有学会理解加在他们身上的牺牲的意义。在可能几个月以后就会发生的战争中，这样的暗流可能导致灾难。因此党有必要团结一致。党必须象从一个模子里浇铸出来的一样——必须有盲目的纪律和绝对的信任。你和你的朋友，鲁巴肖夫公民，在党内制造了裂缝。如果你是真诚悔改，你就必须帮助我们弥合这一裂缝。我已经告诉过你，这是党所需要于你的最后一

次效力。

“你的任务很简单。这是你自己定的：把对的镀金，把错的抹黑。反对派的政策是错误的。因此你的任务是使得反对派受到蔑视，使得群众明白，反对是犯罪，反对派的领袖都是罪犯。这是群众能够理解的简单语言。要是你开始谈你的复杂动机，你只会在他们中间造成混乱。鲁巴肖夫公民，你的任务是避免引起同情和怜悯。对反对派的同情和怜悯，是对国家的危险。

“鲁巴肖夫同志，我希望你了解党为你规定的任务。”

自从他们相识以来，这是格列金第一次叫鲁巴肖夫“同志”。鲁巴肖夫马上抬起头。他感到全身一阵热流，他毫无办法控制。他在戴上夹鼻镜时，下巴微微颤动。

“我了解。”

“请注意，”格列金继续说：“党对你并没有提出任何报酬的允诺。有的被告在肉体的压力下听话。有的是因为答应保全他们的脑袋——或者他们落入我们手中成了人质的亲属的脑袋。对你，鲁巴肖夫同志，我们不打算进行交易，我们什么都不允诺。”

“我了解，”鲁巴肖夫重复说。

格列金看了一眼档案。



“你的日记中有一段话使我很有印象，”他继续说：“你写道：‘我的思想和行动是由于我必须如此。如果我是正确的，我没有什么可以后悔的，如果我错了，我愿付出代价。’”

他从档案中抬起头来，正面看着鲁巴肖夫：

“你错了，你得付出代价，鲁巴肖夫同志。党只答应一件事情：在胜利以后，在不会起有害作用的时候，秘密档案的材料将会公布。那时全世界会了解这场木偶双簧戏的背景是什么。我们现在得按照历史教科书来表演……”

他迟疑了几秒钟，拉直袖口，有些尴尬地结束时，头上的疤痕发红了：

“到了那时，你和你们老一代的一些朋友就会得到你们今天得不到的同情和怜悯。”

他一边说，一边把准备好的文件推给鲁巴肖夫，在旁边放了他的钢笔。鲁巴肖夫站了起来，不自然地笑道：

“我一直不知道石器时代的人动了感情时会是怎么样的。如今我知道了。”

“我不懂，”格列金说，他也站了起来。

鲁巴肖夫在口供上签了字，他在里面承认出于反革命动机和为外国服务而犯了罪。他抬起头来时，他的眼光落在墙上挂的第一号的肖像上，他再一次

看到了多年前第一号同他告别时的心照不宣的讽刺表情——那个悲哀的犬儒主义的眼色从那无所不在的肖像中向人类凝视着。

“你不懂没有关系，”鲁巴肖夫说：“有些事情只有老一代的人，伊凡诺夫、鲁巴肖夫、基佛之流才懂。这已经结束了。”

“我会下令叫他们在审判以前不去打扰你，”格列金略停一会儿说，又是死板地和精确地说这话的。鲁巴肖夫的微笑使他有些恼火。“你还有别的具体要求吗？”

“睡觉，”鲁巴肖夫说。他站在门口，站在大个子狱卒旁边，由于夹鼻镜和胡须显得矮小、年老，和无足轻重。

“我会下令不许打扰你睡觉，”格列金说。

鲁巴肖夫走后关上门时，他又回到办公桌后，一动不动地坐了一会儿。然后按铃叫秘书。

她坐下在她往常坐的角落里。“我祝贺您成功，格列金同志，”她说。

格列金把灯光亮度降到正常。

“这个，”他看一眼灯说：“加上缺乏睡眠和体力耗尽。这完全是体质问题。”

## 语法虚构

没有道路就别给我们指出目标。  
因为世界上的目的和手段有千丝  
万缕的关系，  
你动了这个也就改了那个；  
每条不同的道路都使你看到其他  
的目的。

费尔迪南·拉萨尔<sup>①</sup>：  
《弗朗兹·冯·锡金根》

“问及他是否认罪，被告鲁巴肖夫口齿清楚答称‘是的’。对于公共检察官的第一个问题，即被告是否做了反革命的代理人，他又低声答‘是’……”

看门人瓦西里的女儿慢慢地读着，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分开。她把报纸铺在桌上，用手指指着一行

---

<sup>①</sup> 拉萨尔(1825—1864)，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建人，马克思的学生。

行的铅字，还不时地抚摸整理自己的花帕头巾。

“……问及他要不要请律师为他辩护，被告宣称他放弃这个权利。法庭随即宣读起诉书……”看门的瓦西里躺在床上，面对着墙。维拉·瓦西里奥夫娜弄不清她父亲究竟在听她读报，还是睡着了。有时他喃喃自语。她知道不用理他，她每晚大声读报已成习惯，“为了受教育，”尽管有时在工厂里下班以后她还要参加小组会议，回家很晚。

“……起诉书说文献证据和被告鲁巴肖夫在初步调查时的供词已证明犯有起诉书中所列各项罪行。对于庭长所提他对初步调查的进行情况是否有意见的问题，被告作了否定答复，并称他是根据个人自由意愿招供的，诚恳悔过他的反革命罪行……”

看门的瓦西里没有动。在床头，就在他的头上，挂着第一号的肖像。旁边是一根生锈的铁钉，突出在墙上，不久以前这里挂的是鲁巴肖夫当游击队长时的照片。瓦西里的手机械地在摸他床垫里的一个空洞，那是他瞒着女儿藏圣经的地方。在鲁巴肖夫被捕后不久，女儿就发现了，把它丢掉了，这也是为受教育。

“……在检察官的要求下，被告鲁巴肖夫接着交代他怎么从反对党的路线演变成为一个反革命分子和祖国的叛徒。在注意听审的旁听者前面，被告发

言如下：‘法官公民，我现在来解释一下是什么原因使我在预审官和您，我国司法代表面前认输。我的情况向您表明，对党的路线哪怕只有丝毫的背离都会不可避免地成为反革命的匪徒。我们反对派的斗争的必然结果是我们在泥淖中越陷越深。我愿意向您交代我是怎么堕落的，对于那些在这关键时刻仍旧动摇和对党的领导以及党的路线的正确性仍暗中有怀疑的人们，这是一个警告。我如今身败名裂，死亡在即，愿意向您交代一个叛徒的可耻堕落，作为对我国千百万人的教训和可耻榜样……’”

看门的瓦西里在床上翻了个身，把脸埋在床垫里。在他的眼前是留着胡须的游击队长鲁巴肖夫的照片，他即使身临绝境也知道痛快骂一句，不论是上帝还是人都很能欣赏。“身败名裂，死亡在即……”瓦西里呻吟了一声。圣经不在了，但他默记了许多章节。

“……至此，公共检察官打断了被告的话，向他提出了几个关于鲁巴肖夫前秘书阿洛娃公民的问题，后者正因叛国活动被处决。从被告鲁巴肖夫的答复来看，被告当时因党的高度警惕而走投无路，便把自己的罪责推在阿洛娃身上，以求保全自己的脑袋，同时又可继续不光彩的活动。尼·萨·鲁巴肖夫以厚颜无耻若无其事的态度公开承认了这一滔天

罪行。对于检察官公民的话‘你显然毫无道德观念，’被告面带讽刺笑容答称：‘显然’。他的行为引起了旁听席上纷纷自发的愤怒和蔑视，但庭长公民迅予制止。有一次，这种革命的正义感为哄笑所代替，那是被告打断对他罪行的揭发的时候，他要求暂停片刻，因为他‘牙痛难熬’。庭长立即答允他的请求，轻蔑地耸了一下肩，命令审讯暂停五分钟，充分表现了革命司法的正确态度。”

看门的瓦西里仰天躺着，想着鲁巴肖夫从外国人那里获救后在各种凯旋大会上的情景，他拄着拐杖站在红旗装饰的主席台上，微笑着在袖口擦眼镜。这时台下的欢呼声和口号声从未间断。

“士兵们把他带走，进了叫做长官府的大厅；他们叫来了整个乐队。他们给他披上紫袍，用芦苇拍他的脑袋，向他吐唾沫，跪在他前面向他礼拜。”

“您在叽哩咕噜说些什么呀？”女儿问。

“你别管，”老瓦西里说，又转向墙壁。他伸手去摸床垫中的空洞，但那里是空的。他头顶墙上的钉子上也是空的。当他女儿从墙上取下鲁巴肖夫的像片丢在垃圾箱里时，他没有抗议——他年纪太大了，无法忍受蹲牢的羞辱。

女儿中断了读报，把煤油炉放在桌上准备做茶。门房里一阵煤油味。“您刚才在听我读报吗？”女儿

问。

瓦西里恭顺地转过头来：“我都听到了，”他说。

“您如今明白了，”维拉·瓦西里奥夫娜把煤油灌到炉膛里。“他自己说的，他是个叛徒。如果不是，他自己不会说的。我们厂里开了会，通过了决议，要大家签名。”

“你懂得很多，”瓦西里叹口气说。

维拉·瓦西里奥夫娜很快地看他一眼，结果使他又把头转向墙壁一面。每次她那么奇怪地看他一眼时，瓦西里总是想起了他有碍维拉·瓦西里奥夫娜，她要想独占这间门房。三星期以前，她和厂里的一个初级技工已登记结婚，但他们没有房子。那小伙子同另外两个同事合住，要房管局分给你房子得等好几年。

煤油炉终于点燃了。维拉·瓦西里奥夫娜把水壶放到上面。

“支部书记向我们宣读了决议。其中写着我们要无情地处决叛徒。不论是谁，凡是对他们表示同情，本人就是叛徒，必须予以揭发，”她有意用一种若无其事的口气解释。“工人们必须保持警惕。我们每人发了一份决议征集签名。”

维拉·瓦西里奥夫娜从衬衣里取出一张稍微折

皱的纸，放在桌上铺平。瓦西里如今仰躺着，头顶上生锈的铁钉突出在墙上。他向那张放在煤油炉旁的纸瞄了一眼，又很快把头转开。

“于是他说：我告诉你，彼得，公鸡今天不会啼了，在这以前，你当三次否认你认识我……”

水壶里的水开始嘶嘶响了。老瓦西里露出一一种狡猾的表情：

“参加过内战的也得签名吗？”

女儿站在水壶前面，头上包着花头巾。“谁都不用，”她说，目光仍是那么特别。“工厂里的人当然都知道他住在这幢房子里。支部书记会后问我您是不是一直是他的朋友，您是不是与他常常交谈。”

老瓦西里猛地坐了起来。这样做引起了一阵咳嗽，他的细细的布满瘰子的头颈上青筋毕露。

女儿在桌子边上放了两只茶杯，从一只纸口袋中倒一些茶叶末到杯子里。“您在嘀咕什么？”

“把那张东西给我，”老瓦西里说。

女儿递给他。“要我念一遍吗？这样可以知道里面说些什么。”

“不用，”老瓦西里说，在上面签了名。“我不想知道。现在把茶端给我吧。”

女儿把茶杯递给他。瓦西里的嘴唇在蠕动。他一边小口小口地啜着淡黄色的茶，一边在喃喃自



语。

喝完茶后，女儿继续读报。被告鲁巴肖夫和基佛的审讯快要结束。关于谋刺党的领袖的罪名的辩护引起了旁听席上的愤怒风暴，不断地有人叫喊“把这些疯狗杀了！”公共检察官的最后问题是关于被告的动机，对此似乎已经垮了的鲁巴肖夫用疲倦的声音拖拖拉拉地回答：

“我只能说我们反对派既然决定把推翻祖国的革命政府作为我们的罪恶目标，因此曾经使用过符合我们目的的各种方法，这些方法同那个目标一样卑鄙邪恶。”

维拉·瓦西里奥夫娜推开椅子。“真叫人恶心，”她说：“他趴在地上爬的样子真叫你要吐。”

她把报纸放开，开始收拾煤油炉和碗碟。瓦西里看着她。热茶使他有了勇气。他在床上坐起来。

“别以为你懂得，”他说：“他说这些话时心里怎么想只有天知道。党教你们大家要机灵，但是谁太机灵就会不知羞耻。你耸肩也没有用，”他生气地继续说。“如今这世界上聪明和正派成了死对头，不论是谁，站在这一边，就必须放弃另一边。一个人想了太多没有好处。因此这么写着‘你们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再多说便是出于那邪恶者。’”

他躺了下去，转开了头，不想见到他女儿的脸

色。他很久没有这样勇敢地同他女儿唱反调了。她一旦心中决定要把这屋子弄到手给她自己和她丈夫，什么都可能发生。在这世界上，你得机灵一些——否则的话，你上了年纪还可能进监牢，或者在桥下冻着睡觉。就是这样：或者你的行为很聪明，或者你的行为很正派：两者不可得兼。

“我现在把最后部分念给您听，”女儿说。

公共检察官结束了他对鲁巴肖夫的盘问。在这以后，又一次提审被告基佛。他极其详尽地重复了以前关于谋杀的交代。“……庭上问被告鲁巴肖夫是否有问题要问基佛，因为他有此权利，鲁巴肖夫答称他放弃这个权利。至此审问告一结束，法庭宣布休庭。法庭复庭后，公共检察官公民开始总结发言……”

老瓦西里没有听公共检察官的发言。他又转向墙壁睡觉了。他后来不知道睡了多久，女儿给油灯添了多少次油，她的手指指到了一栏的结尾又重新开始新的一栏有多少次。他醒来时公共检察官发言结束，要求判处死刑。也许女儿在读到最后时改变了口气，也许她停下来歇口气，反正，在她读到公共检察官的最后一句话时，瓦西里醒了过来，那句话是用黑体字印刷的：

“我要求把这些疯狗全部枪决。”

接着允许被告说最后的话。

“……被告基佛向法官请求考虑到他年纪还轻，饶他一命。他再一次承认他的罪行卑鄙无耻，想把全部责任推在教唆犯鲁巴肖夫身上。他激动之下，说话口吃，引起旁听席上哄笑，但被庭长公民迅速制止。接着允许鲁巴肖夫说话。……”

报纸记者生动地描述了被告鲁巴肖夫“以热切的眼光扫向旁听席，但没有找到一张同情的脸，于是颓丧地低下头。”

鲁巴肖夫最后的话很短。它加强了他在法院的表现造成的不愉快印象。

“庭长公民，”被告鲁巴肖夫说：“我在这里作我一生中最后一次的发言。反对派被打败，摧毁了。如果今天我问自己，‘我为什么而死？’我面对的是绝对的空虚。如果一个人死时不后悔，不同党和运动和解的话，那么他的死是没有目的。因此，在我最后时刻的门坎上，我向国家，向群众，向全体人民跪下双膝。政治把戏、讨论和阴谋都已结束了。我们在检察官公民要求把我们判处死刑之前，在政治上早已死了。让失败者见鬼去吧，历史已把他们踏为尘埃。法官公民，我对你们只有一个辩解：我现在这么做并不容易。虚荣心和我残存的自尊心向我低语，叫我默默地去死，什么也不要说；或者以一

种高贵的姿态去死，临死唱一曲慷慨的悲歌，把心中的话都兜出来，向你的起诉人挑战。对于一个老叛逆来说，这样做会更容易一些，但是我克服了这一诱惑。至此我的任务已经完成。我已付了代价，我同历史的帐已经结清。请求您宽恕将是嘲笑。我没有别的要说了。”

“……经过短暂的讨论后，庭长宣读判决书。最高革命法院根据被告各项罪名判决对被告处以极刑：枪决处死，没收个人财产。”

老瓦西里看着头上的生锈铁钉。他喃喃说：

“你就完了。阿门。”

说完，他又向墙转了过去。

## 二

如今一切都过去了。鲁巴肖夫知道，不到午夜他就不再存在了。

他在牢房里踱步，在闹哄哄的开庭审判之后，他就回到了牢房。六步半到窗口，六步半回来。当他站在离窗口的第三块黑石砖上静静听时，四面白灰墙中间只有静寂来迎接他，好象是从一口深井中来的一样。他仍不懂为什么突然这么寂静，不论里面还是外面。但是他知道再也没有东西能破坏这宁静了。

回顾起来，他甚至能够想起这幸福的宁静是在什么时刻降临到他身上的。那是在庭上，在他作最后发言之前。他原来以为已经把自我意识和虚荣心的最后残余统统都从他的意识中消除殆尽了，但是在那时刻，当他的眼光在旁听席上的脸孔中寻找，而只发现冷漠和嘲笑时，他最后一次被寻求同情的愿望所左右。他感到寒冷，因此需要用自己的话来为自己取暖。他受到了极大的诱惑，要谈谈他的过去，要挣扎一次，撕破伊凡诺夫和格列金套在他头上的网，要象丹东一样向控告他的人叫喊：“你们糟塌了我的一生。但愿我的生命能再起来向你们挑战……”唉，他是多么熟悉丹东在革命法庭上的发言呀。他能够逐字逐句背出来。他小的时候就背诵过它：“你们要把共和国扼杀在血泊之中。自由的脚步成为墓石必须继续多久？暴政已经出现；她已揭去面纱，抬着头，在我们的尸体上踏过去。”

这些话在他的舌尖燃烧。但是诱惑只存在刹那之间；接着，他作了最后发言，沉默的钟笼罩了他。他发现已经太晚了。

回到原路上去已经太晚了，再次踩在自己的脚印上已经太晚了。说话不能改变任何东西。

对他们都是太晚了。当他们在世界上作最后一次出场的时刻来到时，没有一个能把被告席变成讲

坛，没有一个能够向全世界展示真相，把控告扔还到法官身上，象丹东那样。

有的是因为肉体恐惧而缄默，象兔唇那样；有的希望保全脑袋；有的至少从格列金之流的魔爪下救了妻子儿女。他们之中最优秀的保持了缄默，为了对党作最后一次的效力，让自己当作替罪羊一样牺牲——而且，甚至最优秀的人也各有一个阿洛娃压在他们的良心上。他们陷在自己的过去中太深了，陷进了他们自己布置的罗网里，根据他们自己的法则，歪曲伦理和歪曲逻辑；他们都是有罪的，尽管不是他们控告自己的罪行。他们没有退路。他们从舞台上走下场是严格地按照他们自己的奇怪游戏规则进行的。公众并不期望他们临死唱一曲慷慨悲歌。他们得按照教科书规定的那么行动，他们的角色是半夜的狼叫……

如今这都过去了。他对此已没有什么可以做的了。他不用在同狼群一起嚎叫了。他已付了代价，他的帐已结清。他是一个失去了自己影子的人，解脱了一切羁绊。他什么思想都要达到它的最后结果，并且自始至终按照它采取行动。他余下的时间是属于那个沉默的伙伴的，后者的领域是在逻辑思想结束的地方开始。他称这个沉默的伙伴为“语法虚构”，因为对第一人称单数始终感到不好意思，这种不好

意思感觉是党在信徒中间所反复灌输的。

鲁巴肖夫在与406号隔开的墙前止了步。但从里普·凡·温克尔走了以后，那间牢房一直空着。他摘了夹鼻眼镜，偷偷地看了一眼周围，就敲起墙来：

“2—4……”

他象孩子似的不好意思地听着，接着又敲：

“2—4……”

他听着，又敲了几下同样的信号。墙壁沉默着。他还从来没有自觉地敲过“我”字。也许以后也永远不会了。他听着。敲墙声消失了，没有回答。

他继续在牢房里踱步。自从沉默的钟笼罩了他以后，他一直在想几个问题，趁现在还来得及的时候找到答案。这些问题很简单，有关受苦，或者更确切地说，有关有意义的受苦与无意义的受苦的区别的问题。显然，只有不可避免的这种受苦是有意的；这就是，生根于生物学的天数中的受苦。另一方面，所有有社会根源的受苦都是偶然的，因此是没有意义的。革命的唯一目标是消除没有意义的受苦。但结果是，要消除第二种受苦只有以第一种受苦总数的暂时大量增加为代价才能做到。因此，如今的问题是：这样的手术是有理由的吗？显然是有理由的，如果你指抽象的“人类”；但是，应用到单数，应用到“2—4”信号，应用到有血有肉有皮有骨的真正的

人，这个原则却导致了荒谬。小孩的时候，他曾相信，为党工作，他会找到所有这种问题的答案。工作持续了四十年，从一开始他就忘记了他为之从事这项工作的那个问题。如今四十年过去了，他回到了童年时代的迷惑。党取走了他所能贡献的一切，但从来没有给他答复。沉默的伙伴也然，他的奇迹般的名字鲁巴肖夫曾在空牢的墙上敲击。他对直接的问题充耳不闻，不论这些问题是多么紧急迫切。

但是还有途径可以接近他。有时他会出人意料地回答一个调子，或者甚至一个调子的记忆，圣母画像的合抱的手的记忆，或是童年时代某一场面的记忆。就象拨了一下调音叉一样，会有回响的震动，一旦开始这样，就会造成神秘派称之为“狂喜”和圣徒称之为“沉思”的状态。最伟大和最清醒的现代心理学家承认这种状态是事实，称它为“海洋感觉。”的确，一个人的性格就象海洋中的一粒盐一样融解了，但同时，无垠的海洋似乎包含在这粒盐中。这粒盐不再能在空间和时间里找到。这是一种状态，在这一状态中，思想失去了方向，开始循环旋转，象指北针在北极磁场一样，一直到它脱离了轴心，在空间中自由飞翔，象夜空里的一束光，一直到所有的思想和所有的知觉，甚至痛苦和欢乐本身，也只是同一道光线中的光谱，在意识的多棱镜中解体。



鲁巴肖夫在牢房中漫步。在从前，他会不好意思地停止这种孩子气的沉思。如今他不再不好意思了。在死亡中，形而上学的东西成了真实的东西。他在窗前止步，前额靠在窗玻璃上。在机关炮塔顶上，可以看到一片蓝天。蓝天很淡，使他想起了幼时他躺在父亲花园里的草地上看着白杨树枝在空中轻轻摇摆时看到的头上的蓝色。显然，甚至一片蓝天也会引起“海洋状态。”他曾经读到，根据天体物理学的最新发现，世界是无限量的大——尽管空间没有边界，它是自己包容自己的，就象一个球体的表面一样。他一直无法理解这个，但如今他感到有迫切的要了解的欲望。他现在也想起了他是在那里读到这个的：在他第一次在德国被捕的时候，同志们偷偷地送进牢房一张非法印刷的党报。在上面是三栏关于一家纺纱厂罢工的报道，在最后，好象是作为补白，用小号铅字印着关于宇宙是无限的发现，下面一半已被撕去了。他从来没有弄清楚撕去的一半中写的是什麼。

鲁巴肖夫站在窗前，用夹鼻眼镜敲着空墙。小时候他曾真的想学天文学，可是后来四十年他却在于别的。公共检察官为什么不问他：“鲁巴肖夫被告，谈谈无限怎么样？”他会无法回答的——而在那里，正是他犯罪的真正根源……还会有一个更大的

根源吗？

他当时也是一个人在牢房里，由于受了最后一次拷打，所有的关节都痛，但在读了报上的那个报道后，却处身在一种奇怪的兴高采烈的状态中——“海洋感觉”使他忘记了一切。后来，他为自己感到羞耻。党不赞许这种状态。它称之为小资产阶级神秘主义，象牙塔里的避难所。它称之为“逃避任务”，“背弃阶级斗争”。“海洋感觉”是反革命的。

因为在一场斗争中，你必须把双脚牢牢地站稳在地球上。党教导你怎样做到这一点。无限是政治上可疑的一个量，“我”是可疑的一个质。党不承认它的存在。个人的定义是：一百万群体除以一百万。

党否认个人的自由意志——同时它要求他自愿的牺牲。它否认他在两个抉择前选择其一的能力——同时它要求他始终选择其中一个正确的。它否认他区别善恶的能力——同时又病态地谈什么罪行和背叛。个人站在经济的天数的标志下，是一座钟中间的一个轮子，这座钟已上了发条，要永远地走下去，不能停止，不受影响——而党却要求轮子要反叛那座钟，改变它的进程。什么地方有了一个计算错误；方程式不能求得解决。

四十年来他一直同经济的天数进行斗争。这是

人类的核心弊端，正在扩散到内脏的癌症。正是在那里，你必须动手术，以后才会有痊愈的过程。其他都是外行话、浪漫主义、卖狗皮膏药。你无法用虔诚的说教来治愈一个人的致命的疾病。唯一解决办法是外科医生的手术刀和他的冷静的计算。但不论刀用在哪儿，旧创口上会出现新伤。结果，方程式仍没有能够解决。

四十年来他一直严格地按照他的教派的誓言，也就是党的誓言生活。他坚持逻辑计算的规律。他从意识上用理性的酸烧掉了不讲逻辑的旧道德的残余。他避开了沉默的伙伴的诱惑，用尽自己的力量同“海洋感觉”作斗争。结果他到了哪里？无可指摘的真理的前提，导致这样一个完全荒谬的结果；伊凡诺夫的和格列金的不可辩驳的推论把他直接带进了公开审判这场古怪阴森的把戏。也许，一个人是不适宜把一切思想都想到它的逻辑的结论的。

鲁巴肖夫通过铁窗看到机关炮塔顶上的一片蓝天。回顾过去，他如今仿佛觉得四十年来他是在东奔西突——纯理性的东奔西突。也许一个人不宜完全摆脱旧的束缚，摆脱“你不得”和“你不可”的约束，不宜让他直奔目标。

蓝色逐渐变成了红色，暮霭降临了。在塔楼上空一群黑色的鸟儿飞翔盘旋，慢慢地鼓动着翅膀。

不，方程式没有解决。把人类的眼光引到目标上，把一把刀放在他手中，显然是不够的；让他试验刀是不合适的。目前他还太年轻，笨手笨脚的。在伟大的试验场，在革命的祖国，在自由的堡垒里他胡乱干了些什么呀！格列金用堡垒必须保护的原则来辩解一切。但是在堡垒里面是什么样子？不，你不能用混凝土建设天堂。堡垒必须保留，但它对世界已没有意义，也不是榜样。第一号的政权玷污了社会国家的理想，甚至象一些中世纪的教皇玷污基督教帝国的理想一样。革命的旗帜降了半旗。

鲁巴肖夫在牢房里踱步。周围很静，天快黑了。他们不用多久就会来带他了。在方程式里有个地方错了——不，在整个思想的数学体系中有个地方错了。他早已略有所察觉，自从理查德事件和圣母像以后，但总是不敢向自己充分承认。也许革命来得太早，流产的婴儿有着可怕的畸形的四肢。也许整个事情在时机上是个错误。罗马文明早在公元前一世纪时似乎也濒临末日，象我们的文明一样已腐烂到了骨髓。当时，也有最优秀的人认为时间已经成熟可以进行一次大变革。然而那个疲惫的旧世界又坚持了五百年。历史的脉搏跳动得很慢。人按年计，历史按世代计。也许今天仍是第二个创造日。他是多么希望能够活着建立群众相对成熟的理论

呀！……

牢房里很静。鲁巴肖夫只听见自己落在石砖地上的脚步声。六步半到牢门，他们得从那里进来带他，六步半到窗口，窗外黑夜已经降临。不久一切就过去了。但是当他问自己，你究竟是为什么而死时，他找不到答复。

这是体系中的一个错误。也许这个错误就在他迄今为止仍认为是无可争辩的原则上，他就是为了这个原则牺牲了别人，自己也遭到了牺牲，这个原则就是，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就是这句话杀死了革命的许多同仁，使他们都东奔西突。他有一次在日记中写了什么？“我们抛弃了一切传统，我们唯一的指导原则是后果逻辑。我们航行没有伦理压舱物。”

也许邪恶的核心是在那里。也许人类不宜没有压舱物就航行。也许理性本身是有缺陷的指北针，把你引向这样一个迂回曲折的航道，以致最后目标也消失在浓雾中了。

也许现在就要降临大黑暗时代。

也许后来，很久以后的后来，新的运动会兴起——有新的旗帜，新的精神，对经济天数和“海洋感觉”两者都有了解。也许新的政党的党员会穿僧袍，教导大家只有手段的纯洁才能证明目的正当。

也许他们会教导，一个人等于是一百万除以一百万的定义是错误的，会提出一种以乘法为基础的新的算学：一百万个人的结合产生了一个新的实体，这个实体不再是一群乌合之众，而是会产生一种觉悟和一种自己的个性，在无限但是自限的空间中，有一种“海洋感觉”增加了一百万倍。

鲁巴肖夫中止踱步，留心倾听。过道那边传来了发闷的打鼓声。

### 三

鼓声响着，仿佛是风从远处送来一样；它仍很远，但是慢慢地近了。鲁巴肖夫没有动。他站在地上的双腿已不听他的意志指挥。他感觉到地球的地心吸力慢慢地侵上了他的双腿。他退三步回到窗前，眼睛始终不离窥视孔。他深深地呼吸，点了一支烟。他听到床边墙上有敲击声：

“他们在带兔唇。他向你问候。”

他的双腿的沉重感消失了。他走到门前，开始用双手的掌心很快地有节奏地敲门。把消息传给406号已经没有用了。那间牢房空着。联系在那儿断了。他敲着鼓，把眼睛贴在窥视孔上。

在过道里，昏暗的灯象往常一样开着。他也象往常那样看到对面401号到407号的门。鼓声渐响。

脚步声临近，缓慢地，拖拉地，你可以清楚地听到它们落在地上的声音。突然，兔唇出现在窥视孔的视野里了。他站在那里，双唇微颤，就象他站在格列金屋子里的弧光灯前一样。他的双手反铐在背后，扭曲得厉害。他看不见窥视孔后鲁巴肖夫的眼睛，却用他的盲目的寻觅的眼珠看着那门，好象最后得救的希望是在那门后。这时宣布了一个命令，兔唇乖乖地转身要走。后面跟上来那个系手枪皮带的穿制服的大个子。他们在鲁巴肖夫的视野中消失了，一个跟着一个。

鼓声渐弱，一切恢复寂静。从床边墙上传来敲击声：

“他表现不错……”

自从鲁巴肖夫告诉402号他要屈服的那一天起，他们互相之间没有说过话。402号继续：

“你大约还有十分钟。你觉得怎样？”

鲁巴肖夫知道402号开始谈话为的是让他等候时好过些。他很感激。他坐下在床边敲墙：

“我希望早已结束……”

“你不会露出害怕的，”402号敲墙。“我们知道你是个硬汉子……”他停下来，接着又迅速重复敲最后几个字“硬汉子”……他显然是不想让谈话中断。

“你仍记得‘象香槟酒杯一样的乳房’吗？哈——哈！”

硬汉子……”

鲁巴肖夫听了一会儿过道上有没有响动。没有。402号似乎猜到了他的思想，因为他马上又敲：

“别听它。他们来时我会及时告诉你的……要是他们赦免了你，你想干什么？”

鲁巴肖夫想了一想。然后他敲道：

“研究天文学。”

“哈——哈！”402号表示：“也许我也是如此。人们说其他星球也许也有人住。请允许我给你一个忠告。”

“请，”鲁巴肖夫回答，有些意外。

“不过别不高兴。这是一个军人的技术性建议。轻松一下你的膀胱。在这种情况下总是这样好。精神坚强，但肉体软弱。哈——哈！”

鲁巴肖夫不禁笑了，听他的话去了便桶。他然后回到床上敲墙：

“谢谢。这个主意好极了。你的前途如何？”

402号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敲道，不过比平时慢一些：

“还有十八年。不完全是，只有6530天……”他停下来，又说：

“我真的羡慕你。”接着又停了一会儿：“你想吧，还有6530个晚上没有女人。”



鲁巴肖夫不答。然后他敲：

“但是你可以读书，学习……”

“没有这脑子，”402号答。接着敲得很响很急：  
“他们来了……”

他停了下来，过了几秒钟，又敲：

“真可惜。咱们正谈得高兴……”

鲁巴肖夫下床站了起来。他想了一会儿，然后敲：

“你帮了我大忙。谢谢。”

钥匙在门锁里转动。门被打开了。外面站着那个穿制服的大个子和一个官员。那官员叫了鲁巴肖夫的名字，从一个文件上抽出一张纸来。他们把他的双臂拧到背后，铐上手铐时，他听见402号匆忙地在敲：

“我羡慕你。我羡慕你。别了。”

在外面的过道上，鼓声又响了。鼓声一直陪伴他们到理发室门口。鲁巴肖夫知道在每扇铁门后面都有一只眼睛从窥视孔里看他，但是他没有向左或向右转头。手铐紧铐着他的双手，那个大个子把螺丝拧得太紧了，而且在把他的手臂拉到背后去时拧了他的手臂，现在他感到很痛。

前面出现了地窖的楼梯。鲁巴肖夫放慢了脚步。那官员在楼梯口上停了步。他个子很小，眼珠微

微鼓出。他问：

“你有别的要求吗？”

“没有，”鲁巴肖夫说，开始在楼梯上往下走。那官员仍站在上面，鼓出的眼珠往下瞧着他。

楼梯很窄，灯光很暗。鲁巴肖夫得很小心才不至于摔倒，因为他没有扶手可以扶。鼓声停止了。他听见穿制服的那个在他三步以后跟着往下走。

楼梯转成螺旋形。鲁巴肖夫向前俯着可以看得清楚些，他的夹鼻眼镜掉了下来，落在他下面两步阶梯的地上。它蹦着又往下掉，一直落在楼梯尽头的地上。鲁巴肖夫迟疑地停了一下，然后摸索着下了楼梯。他听见背后的人弯下腰，捡起了破眼镜塞在他兜里，但是他没有回头。

他如今几乎象瞎子一般，但脚下踩的倒是坚实的地。他走进了一条长过道，墙壁模模糊糊，他看不到尽头。穿制服的人总是落后他三步。鲁巴肖夫感觉到他脖子后的眼光，但没有转过头去。他小心地一步一步往前踩。

他觉得好象他们在这过道里已经走了好几分钟了。仍旧没有事情发生。也许那个穿制服的从手枪套中取出手枪时他会听到。这样，在这以前仍有时间，他仍是安全的。还是后面那个人象牙医那样，在弯着腰看病人时把拔牙用具藏在袖子里？鲁巴肖夫想

不去想这个，想些别的，但他得集中全部注意力防止自己转过头去。

奇怪的是，在开庭后幸福的寂静包围他的时刻起，他的牙痛停止了，也许脓肿就是在那时破了头。他对他们怎么说的？“我在国家，群众，全体人民面前跪下双膝……”那又怎么样？这些群众，这些人民后来怎么啦？四十年来他们用威胁和允诺，用幻想的恐怖和幻想的酬报把人民赶过沙漠。但是许诺的乐土在哪里？

流浪的人类真的有这样一个目的地吗？这是个他想在还来得及的时候得到答复的问题。摩西也没有让进入这个许诺的乐土。但是让他从山顶上看到了它，就在他的脚下。这样，在自己的眼前确实看到了自己的目的地，死也就容易了。他，尼古拉斯·萨尔曼诺维奇·鲁巴肖夫却没有给带到山顶上，他的眼睛不论朝哪儿望去，都看不到什么，除了沙漠和夜晚的黑暗。

他的后脑受了沉重的一击。他等待已久了，但是仍没有防备。他感到自己的双腿发软，身子旋转了半个圈。他一边倒下时，一边想这是多么富于戏剧性，但是我没有感觉。他蜷缩在地上，脸颊贴在冰凉的石砖地上。天黑了，海把他带走，颠簸在夜间的海面上。记忆在他脑际闪过，象萦绕在水面上

的一道道的雾。

外面，有人在敲前门，他梦见他们来逮捕他；  
但是他在什么国家？

他作了一次努力，想把手臂伸进睡袍的袖子里。  
但是挂在床头看着他的，是谁的彩色肖像？

是第一号，还是另一个——带着讥讽笑容的他，  
还是呆滞地凝视的他？

一个没有形状的人影俯在他身上，他闻到了手枪套的新皮革味。但是那个人影的袖上和肩上佩的是  
是什么徽章——它以谁的名义举起手枪的黑黝黝的枪膛？

第二下摧毁性的打击落在他的耳朵上。接着一切寂静无声。又是海和海涛声。一阵波浪涌来把他慢慢托起。这是永恒的一耸，它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来，又继续安详地向前逝去。

# 艳阳天下的阴影

——译后记

董乐山

英籍匈牙利作家阿瑟·库斯勒1941年震撼世界的名著《中午的黑暗》到今天才向中国读者介绍，从时间上来说，晚了快整整半个世纪。但是也许正是由于这时间上的差距，使我们具有了历史的眼光，能够撇开武断的盲从的偏见，比较冷静地来回顾一下这半个世纪的既往，从而作出比较客观的独立的判断，而不必有政治上的顾虑。历史，确实是最公正的法官。

五十年前正是全世界舆论因为苏共的大规模清洗而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眼看着一个接着一个、一批接着一批的老布尔什维克被揭露为叛徒、奸细和间谍而遭到逮捕、审讯和处决，这不论在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和外部都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而尤其使

人不可理解的是，这些曾经叱咤风云、称雄一时的老革命家，在公开的法庭上，个个成了泄气的皮球一般，或者痛哭流涕，或者垂头丧气，承认了自己犯有在外人看来是荒诞不经的罪行。每个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都不禁要问：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们真的象起诉书中所说的和他们自己所承认的那样，犯了这些令人难以置信的荒唐罪行，还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险恶手段压垮了这些“用特殊材料”做成的坚强战士？世界上又有什么力量能把这些在沙皇的监狱里、在西伯利亚流放中仍能坚贞不屈的革命家变成这样令人鄙视的可怜虫呢？这成了百思不得其解的一个谜。

就在这个时候，曾经是德国共产党员，参加过第三国际活动的英籍匈牙利作家阿瑟·库斯勒推出了这部震撼人心的力作《中午的黑暗》，尽管这是一部虚构小说，但是由于它在一定程度上解答了上述这个谜，因此它的出版立即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销路甚旺，成为文化思想界的一件大事。

自不待言，它所引起的反响是毁誉参半的。但是不论是赞誉者称道它，还是反对者攻击它，他们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他们都把它看成是一部“反共”的作品。这就注定了它在运动内部的命运，尽管它在世界上其他国家一版再版，并且译成多种

文字（仅在美国，从1941年起到1979年止，精装本和平装本一共印了26次，还作为经典名著收入《现代文库》），它在社会主义国家却是一部禁书，很少有人提到它，更不用说翻译和出版了。

但是，《中午的黑暗》是一部反共作品吗？要作这样的断言，必须先来看看这部作品写的究竟是什么，以及如果说它反对什么的话，它反对的究竟是什么？

## 二

《中午的黑暗》写的是膺共产国际之命，在欧洲各资本主义国家从事秘密革命领导活动的一个老布尔什维克，在斯大林开始党内大清洗之后，开始对苏共党内的不正常现象产生了怀疑，特别是因为革命的目的与手段的矛盾，使他的革命良心深深感到不安和自责，从而招致斯大林的猜忌，以致被捕入狱，经过疲劳轰炸式的狱中审讯后，终于精神崩溃，承认了莫须有的罪名，最后被处决的故事。

当然在书中，作者并没有明指共产国际或者斯大林其人，仅以“国际”和“第一号”相称。但是这两个名称指的是什么，作者并不隐讳，读者也很明白。仅从这点来看，在第三国际还被视为世界革命运动的神经中枢，而不是斯大林个人所操纵的工具的时

代,在斯大林还被视为马列主义的坚定捍卫者、而不是专制暴君的时代,在千千万万遭到他无情迫害和清洗的老布尔什维克还被视为叛徒、奸细、间谍、破坏分子的时代,把《中午的黑暗》视为“反共”作品,自然是天经地义的事。

但是自从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初步揭露了斯大林的暴行之后,特别是又时过三十年苏共最近披露了基洛夫被刺真相和为布哈林平反等一系列澄清历史面目的措施之后,应该可以清楚地看出,在斯大林个人独裁下,不论是在第三国际还是苏共本身,马列主义政党的原则已经遭到了践踏和破坏,由此而带来了共产主义运动的扭曲和畸变,但这并不是运动本身的应有素质。如果说《中午的黑暗》揭露和声讨这种扭曲和畸变现象是“反共”,那无异是承认这种扭曲和畸变是共产主义运动的本色。任何一个曾经对这个运动的目标抱有崇高理想并为之奉献一生的人不论从思想上或者感情上都是不能接受的。

不可否认,阿瑟·库斯勒揭露和声讨的固然是这种扭曲和畸变,但是由于他没有象我们那么幸运得到时间的恩赐,能够具有我们的历史眼光,因而他本人并不象我们那样能够把这种扭曲和畸变同运动本身划清界线。也许是由于他陷在其中太深而不



能自拔，也许是由于这种扭曲和畸变的包围是太令人窒息而使他感到幻灭和绝望，他终于在1938年脱离了从他懂事起就投身的运动。历史上，每逢斯大林政策发生突然的变更，这样因幻灭而脱离运动的事例是不不少的，有的转向，有的沉沦，但是从库斯勒后来仍旧积极参加西班牙内战，同佛朗哥法西斯军队坚决作战以至被俘下狱来看，他仍是一个抱有崇高人类理想的斗士。因此，如果说，他在《中午的黑暗》中也象一般人一样把扭曲和畸变看作是运动本身，那是历史使然，不是他的过错，任何人在当时是不可能有这样清醒的眼光的。

### 三

革命的崇高目的和所采取的手段的矛盾，是《中午的黑暗》的主题，也是折磨着书中主人公、老布尔什维克鲁巴肖夫的革命的良心的矛盾，当然也是折磨着作者库斯勒自己的矛盾。

库斯勒或在卷首或在章首引用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政治权术家马基亚维利、法国革命家圣-约斯特、中世纪凡尔登主教狄德里希·冯·尼海姆的话，最好不过地一语道破了这部作品的中心思想：“凡是建立了独裁政权而不杀布鲁图者，或者建立了共和政体而不杀布鲁图之子者，都只能统治一个很短的

时候”（马基亚维利），“没有人能毫无内疚地进行统治”（圣-约斯特），“在教会的存在遭到威胁的时候，它就可以不受道德戒律的约束。为了统一的“目的，一切手段均可使用，甚至包括诡诈、背信、暴力、贿赂、监狱、死亡。因为一切秩序都是为了群体，个人必须为了公共利益作出牺牲”（冯·尼海姆）。

从历史上来看，不论中外古今，政治素来是被认为为了达到目的而可以不讲信义，不择手段的肮脏勾当，自从人类生活中出现阶级社会以来就是如此。整个人类历史就是一部背信弃义的历史。但是到了以消灭阶级为己任的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以后，无产阶级仍旧是要继承封建统治者和资产阶级的政治衣钵，还是改弦更张、弃旧图新，彻底改变政治的内涵和手段呢？

从过去一百年的历史来看，这个问题似乎没有解决，也许在许许多多革命家的思想中，这个问题还没有很认真地思索过。即使有思索的话，多半也是用“对敌人还讲什么信义”或“为了革命的目的”的堂皇借口原谅了自己本来是会感到内疚的行为，甚至为之辩护，而把怀疑者看作是不切实际的书呆子或甚至怀疑他的忠诚。鲁巴肖夫在国外执行使命的时候就是这样教训哪怕是稍有不同意见的怀

疑者：“历史不知有什么顾忌和犹豫。它永恒地、不犯错误地流向前面的目标，每次转折都留下它夹带的污泥和淹死的尸体。历史知道自己的进程，它不会犯错误。对历史没有绝对信任的人，不配留在党的队伍内。”如果说鲁巴肖夫在开始还是十分自信地说这番话的话，在以后的使命中，他自己也产生了怀疑，并进行了反思。他在狱中日记中写道：“据说第一号有马基亚维利的《君主论》为他的永久同榻共枕人。他理该如此；自此以后，关于政治伦理的规则就再也没有人说过真正重要的话。我们是第一个以20世纪的革命伦理取代19世纪自由主义的‘费厄泼赖’[光明正大]伦理的人。在这一点上我们也是正确的。按照打板球的规则进行革命是荒谬的。在历史的喘息时间里，政治可以相对的光明正大；但是在历史重要转折关头，除了以前的规则以外就不可能有别的规则，那就是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他又写道：“对我们来说，诚意问题是无关重要的。错的必须付出代价，对的可以得到赦免。……历史教训我们，谎言常常比真理对它更有用。”

就是这样一些反思，痛苦地折磨着这个老革命家，使他一方面机械地执行在他认为是不讲政治伦理规则的命令，甚至为了自保而毫无内疚地眼看着

自己心爱的秘书阿洛娃遭到逮捕和清算而不加援救（尽管这是根本做不到的）；另一方面他又在苦苦思索着这个使他的革命良心片刻不得安宁的政治伦理问题。接二连三的逮捕和清算已使他在思想上精神上隐隐地意识到自己的不可避免的下场：象原来到处挂在墙上的一张合影中的元老们一样，“这些曾经改变了世界进程的脑袋，几乎个个都吃了子弹，有的在前额，有的在后脖。”

#### 四

究竟是什么力量打垮了鲁巴肖夫的精神，摧毁了他的意志？不是单独禁闭和疲劳轰炸般的审讯，更不是肉体的苦刑。而是鲁巴肖夫陷在其中而无法自拔的目的与手段的矛盾和由此而产生的诡辩的逻辑。崇高目的的大前提，使鲁巴肖夫这个二十世纪的革命家象喝了“迷魂汤”（巴金语）一样那么愚昧和盲目，不敢同权术政治公开决裂，更不用说挑战了，深恐这样会对最终的目标产生不利的分裂，因此而发生内战，造成千百万人头落地。殊不知妥协、默认为和屈服所带来的后果如果说不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话，也不比假设中的分裂后果差多少：据苏联的报道，到1938年为止，有上千万的人遭到迫害，约有一百七十万个家庭被流放（《瞭望》1988年13

期)。这样大规模的清洗对苏联国力和革命事业本身所造成的损害，已有历史证明，毋庸我们多说了。

然而鲁巴肖夫和其他老革命家仍默默地、顺从地接受了种种横加的莫须有的荒谬罪名，毫无抵抗地，甚至心甘情愿地走上刑场，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他们虽然对目的与手段的关系产生了怀疑，但是始终摆脱不了这个恶圈，因而认为自己是在为了最终的崇高目的，作出最后的贡献和必要的牺牲，包括牺牲自己的生命和名誉在内。这种心态，没有比我国左翼老作家聂绀弩在北大荒劳改因吸烟不慎引起火灾时说的话更能清楚生动地说明的了：“火，我确实没有放。但如果党要我承认是我放的，如果承认了对工作有利，我可以承认。”（《瞭望》1988年10期。）有人认为这是快人快语，值得击赏；也许还有人认为这是大无畏的气概。但是这话里面包含着何等苍凉和深刻的革命者的悲剧！

鲁巴肖夫甚至比聂绀弩还更进一步，从诡辩的逻辑中寻找主动承认“放火”的理论。这就是他的“相对成熟的理论，”他认为“只有群众觉悟水平赶上客观状态的时候，才能实现民主，不论是用和平的手段还是暴力的手段。每次历史阶段的发展，总是把群众抛在后面，使他们处在相对不成熟的状态，这就有可能和有必要出现某种形式的绝对领袖的领

导，而人民往往需要好几代人的时间才能认识到自己用革命的手段所创造的新状态，在此以前，民主政体是不可能的。我们眼前出现的全部恐怖、虚伪和堕落不过是上述这个规律不可避免的看得见的表现。在群众成熟的时候，反对派的责任和作用是在诉诸群众。在他们不成熟的时候，只有蛊惑人心者才诉诸‘人民的最高判断’。在这样的情况下，反对派只有两条路可以抉择：发动政变夺权，而不能得到群众的支持，或者在无声的绝望中听任命运的摆布——‘默默地去死’。”

尽管有同狱囚友用递纸条的通讯办法，劝告鲁巴肖夫采取“默默地去死”的道路。但是鲁巴肖夫根据他的诡辩的逻辑而采取了第三条道路：“在没有可能实现自己的信念的时候，要否认和压制自己的信念。由于社会效益这个道德标准是我们承认的唯一道德标准，为了留在党内而公开否认自己的信念显然比唐·吉珂德似的继续进行没有希望的斗争更加高尚。个人自尊问题，个人的厌恶感和羞耻感——都要连根拔掉。”

这就是导致鲁巴肖夫最后终于屈服的原因，他在公开审判的法庭上丧失了个人尊严，毫无厌恶感和羞耻感地承认了检察官对他提出的从事叛国和破坏活动的控告，并且声称他是出于自己的自由意

志，痛悔自己的反革命罪行而作出交代。可悲的是，尽管他竭力迎合检察官的要求，主动现身说法，表明任何人若稍一背离路线，稍有怀疑，最终必将堕落成为一个反革命分子的必然结果，以此作为全国人民汲取的教训，但是等待他的仍是死刑的判决，是监狱地下室里的脑后一枪。政治就是那么无情。

## 五

与所有传统的小说不同，《中午的黑暗》是一部理念小说。作为吸引读者的手段的，不是故事情节的铺陈，人物性格的刻画，而是主人公的内心的自省和反思，他与提审员的论辩，他的几乎是宿命的悲剧性格，而这一切都是从人类有史以来目的与手段的不可解决的矛盾所产生和决定的。书中写得最精彩的章节当推三次提审时所进行的论辩，与一般政治小说不同，这种理念的论辩不仅毫不枯燥，而且悬念迭出，因此甚至比情节的跌宕更惊心动魄，扣人心弦。这是《中午的黑暗》为什么历经半个世纪而仍畅销不衰的一个原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阿瑟·库斯勒无愧是个悬念大师。我们只要读一下小说开首的第二节主人公被捕的一段梦境与现实的交织的描写就行了：它这样紧紧地吸引住你，使你仿佛也陷身于这场可怖的无法自拔的梦魇之